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81 期 2022 年第 4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何 伟

本期责任编辑 曾建梅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 P4



闽江静静地流淌

# P10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老福州

# P26

福州刺史趣谈



## 在线读城

- |             |             |
|-------------|-------------|
| 4 汪征鲁       | 闽江静静地流淌     |
| 6 李楚翘       | 福州撷拾        |
| 10 安 静（奥地利） |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老福州 |
| 14 付秀宏      | 盛夏荷香        |

## 八闽文脉

- |        |         |
|--------|---------|
| 17 卢美松 | 七闽人师阮弥之 |
| 21 吴秀仲 | 四十八年赶考路 |
| 26 大 路 | 福州刺史趣谈  |

## 榕垣春秋

- |        |         |
|--------|---------|
| 32 冯 涛 | 鼓屏路口的秘密 |
| 37 张 茜 | 水塘上的二落厝 |

## 船政之光

- |        |              |
|--------|--------------|
| 41 涧 水 | 风从山谷吹过       |
|        | ——记池贞铨和他的同伴们 |

## 闽都世家

- |        |         |
|--------|---------|
| 47 郑珊珊 | 沧桑世变话涛园 |
|--------|---------|

Contents

# P41



风从山谷吹过

# P61



乌山有祠祭壮愍

# P80

阳桃树在诉说



52 于丹

漫长的告别

——纪念罗孝建先生

58 郑和

黄培松家族后人与徐悲鸿

## 左海风流

61 危砖黄

乌山有祠祭壮愍

66 鹿野

走近洪业先生

73 洪松生

洪业在抗日战争中

## 红色记忆

75 林思翔

秋阳下的银杏树

## 福地风采

80 林朝晖

阳桃树在诉说

86 陈家恬

共同守护中华秋沙鸭

89 苏静

连江石马岩题刻之谜

92 吴恒之

晋安寻“福”

封面 何伟

黄岐半岛（摄影）

封二 黄河清

虾（国画）

封三 郭勋安

赵继杰题应天府书院联（书法）

封底 沈正镐

脱胎荷叶瓶（漆器）

## 闽江静静地流淌

汪征鲁

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江水静静地流淌，那不仅仅是江流，那是岁月。

这次，南平市延平区政府发起《闽江航运史》的撰写，我作为顾问侧身其间，得以有机会再一次考察闽江，礼赞之情油然而生。

闽江全长 562 公里。然现在有些书籍认为，闽江仅指其上游建溪、富屯溪、沙溪至延平汇合后，由延平段至其下游连江县长门口入海处的长达 211 公里的干流。其实福建先人不是这样理解的。《闽书》卷 2《方域志·川》：“闽江，源出浙之龙泉，建之浦城、崇安，又合建、延、汀、邵及古田、闽清、永福大小诸溪之水，至此入海。大抵闽江承建、剑上游，谷狭川激，至马渚

山渐广而缓；至马头，则众流所汇，浩瀚无涯，统而名之曰闽江。所异者随地取名耳。”

闽江作为福建的母亲河，不仅在于其充沛的水量、其流域面积占福建土地的一半，更在于是福建历史上三次生民产生与置换的主要孔道。

第一次为福建生民的产生。福建最早的生民源自非洲的晚期智人。他们是在 7 至 5 万年前海退时期，沿着印度洋断续呈现的陆脊走出非洲，到达印度后又向中亚、中国西南部进发，一支进入福建，沿闽江而下，成为亮岛人、昙石山人的祖先，也就是福建最早的生民。

第二次为越族入闽的置换。战国晚期，越国为楚国所败，越族的主体陆续向闽地迁徙，其



众当在二十万人上下，建立了闽越国。而《山海经》所谓“闽在海中”的原住民闽族，其偏于沿海、海岛一隅，人数约几万，在越族入主闽的过程中，或继续向海外逸去，或为当时众多且具有更先进生产方式的越族所同化。司马迁作《史记·东越列传》，第一次提出了“闽越”这个概念，又把“闽越”称为“东越”，“闽”与“东”都是方位词，即闽地的越族、东方的越族，不能把“闽越”称为闽族与越族。太史公更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勾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矣。”显然，这里把越国与闽越国视为世系相承的一个国家。闽越国的后期与灭亡，正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他以当代人写当代史当是不刊之论。

越族入闽后，形成闽北与闽东即冶县两个聚集地，闽江无疑是二者交通的孔道。

第三次为中原汉族入闽的置换。东越王余善败亡后，汉武帝将整个闽越国臣民迁至淮河流域，闽地为之一空。当然也有少数越族成员逸入山林。自魏晋至两宋，由于北方战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原汉族入闽的大潮，其把中原地区的汉族社会原封不动地置换进福建地区。

当时，中原汉人有百分之八十由闽北入闽。其主要三条孔道：一为由闽浙交界的诸山口的关隘入闽，最著名的关口如浙江江山与福建浦城之间仙霞岭之枫岭关等，尔后落户于浦城、崇安、

建瓯等县；二为由江西鄱阳、铅山，再经崇安西北的分水关入闽，之后分居崇安、建阳、建瓯等县；三为由江西临川、黎川，越东兴岭，经光泽县西的杉关入闽，然后散居于光泽、邵武等县。之后又陆续沿闽江向中、下游地区迁徙，继而向南部迁徙。

闽江又是闽文化的坐标。中国最早的海洋文化昙石山文化、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严复为代表的侯官新学，都是闽文化最重要的篇章，都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以至世界的意义。它们又都是在闽江这个历史坐标上游移的最璀璨的星座。

闽江曾经是那样的湍急、自由、奔放；那样的清，那样的绿，那样的蓝。现在，她或者静止为湖泊，或者缓缓地流淌。闽江上修筑了不少大、中型水电站，如古田溪水电站、沙溪口水电站、水口水电站、大目溪水电站、玉山水电站、安砂水电站、池潭水电站、芦庵滩水电站，等等；其支流上的小水电站更是星罗棋布。每一个水电站，都筑坝截断了江流，形成了静静的湖泊；都大大减缓了下游的流速。闽江两岸，高楼鳞次栉比，簇拥着河道。闽江被彻底人化了。

闽江为其子女竭尽所能。赞叹之余，我又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我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花农为了满足士大夫的孤癖，为了钱，“绳天下之梅”，“以夭梅病梅为业”……

闽江静静地流淌。

# 福州 撷拾

李楚翘

郁达夫在《福州的西湖》一文中写到福州的气候，说一年中几乎4个月都处于半梦半醒的奇异状态：白天热得如烧似煮，令人五感尽失，陷入梦游似的失神；向晚凉风海上来，暑气四散，仰观星河又如做梦似的恍然。前一种状态显然是折磨，后一种境界他称为涅槃。

我无缘感受福州这令人涅槃的夏夜，只在12月终的严冬暂且逃离万物凋敝、风如砂纸的北国，一头扎进平行宇宙里那片如梦的浓绿，感受

来自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湿润与慷慨。

对福州的最早印象，来自初中时读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中年的段小楼被发配到福州去劳改。浩荡的闽江下游，塞满“牛鬼蛇神”的卡车，吃不惯的腥甜，待开垦的硬地……这是北方人在地理与心理上皆无法想象的南荒穷境，是失落的霸王渡江前的最后一座牢笼。

李碧华笔下的福州，是衬在段小楼悲剧生活后的一块惨淡幕布，着色不多，只是强调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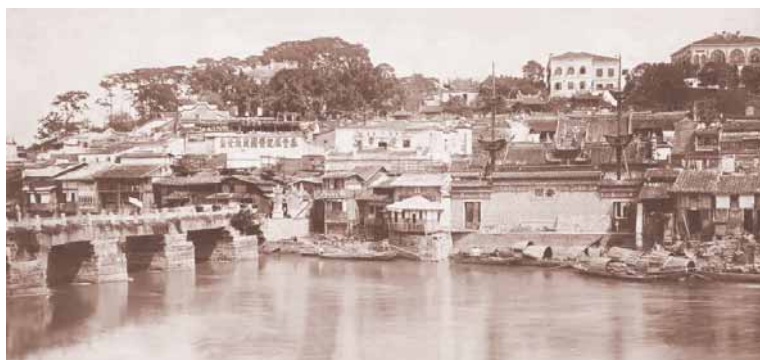
福州西湖夜景

“苦”字。文中提到两种当地食物：肉燕和鸡老酒，都带着作者惯用的漂亮而狠毒的隐喻——那将整块好猪肉一砧一砧捶打成泥的肉燕，那将整只活鸡吊入酒中化酿而成的鸡老酒，都有一种不近人情的怪异与血腥。

这印象到了高二高三时方有改观——因开始沉迷郁达夫，从他寓居福州几年中所作的散文里发现了新的色彩，亦得出一个并未查证而只出自直觉的判断：李碧华写福州故事前做的功课，大抵只是读了郁达夫1936年所著的《饮食男女在福州》一篇而已。

《饮食男女在福州》确实是篇妙文，才情与爱意俱在。如写福州人嗜甜，以至牙齿多坏，戏园子里的名角和台下看客一咧嘴都是满口金光。再如写福州女子的白皙与爱美，晴日的仓前山如美妇人行游之画廊，处处红霞香雾，而笔锋一转带出烟花行当的暗无天日，及乡土妇人“三把刀”银头饰背后的血难史，也令读者感佩叹惋。

李碧华是笔带寒毒的冷面师太，郁达夫则是袖底生花的多情浪子，不唯对人，对城市也如此。他写大江南北乃至东洋西洋任一名都，都让读者觉得此地有情有趣而人物可敬可爱，非独美



福州烟台山旧影



福州城区旧貌



郁达夫在福州曾寓居过的刘家大院花厅

福州矣。因而，学生时代虽早早读过《记闽中风雅》《福州的西湖》等篇，对这座遥远南陲的省会城市依然无甚值得一书之感。

再往后，就是毕业那两年爱上宋史，连带喜欢残唐五代，说起南方十国诸君，从个人的感性主义偏爱而言，除却花醉霜寒一身梗的钱龙王，难忘的就是白马三郎王审知了。

说来也怪，在历史的场景中，闽国的存在感远不如南唐吴越诸强邻，只因白马三郎这个动人外号构建出的风流威猛的印象，配着闽地的丹山碧水，就足够让人垂爱了。

同为王氏，同为河南人，同为十国开国主君，王审知就是白马三郎、开闽圣王，王建就是贼王八——事实上闽国哪里能和西蜀相较呢？但民间口耳相传的文字在历史真实之外自行构建了一套认知，有朴素的爱恨与褒贬在。王审知是五代十国乱局里的配角玩家，却是闽地民间记忆的第一巨人。

对我们这些外省人而言，所能记忆的福建与福州城的历史，也是从王审知兄弟入闽开始的。那是大唐帝国倒塌的前夜，这支由河南光州乡民组成的黄巢余部为躲避另一支余部的追杀，被迫离开熟悉的战场，越过长江，一路不回头地南行，或许是天命，也或许是无力的选择，最终进入这片遥远的山海之境。

历史圈有个梗，叫“古来兵家不争之地”，形容南宋以前的福建真贴切。作为九州大地的尽头，去国离乡的终极，在长久的中古史岁月里，

这里以荒僻但安全的素面成为来自北方与中原的逃难者最后的收容所，并留下他们余生哀乐的痕迹。王审知有的是先例可循——500年前中原八姓避难入闽，泉州城畔的巨流以“晋江”之名传世，正是南渡衣冠们对那永远失落的故土的呼唤。

同是天涯沦落人，以溃兵身份流浪到大地尽头的王审知兄弟不曾像古代士大夫那样哀唱乡愁。当中原大陆再次陷入礼崩乐坏的绝境，他们要在新的家园建立新的秩序，真正改变自己及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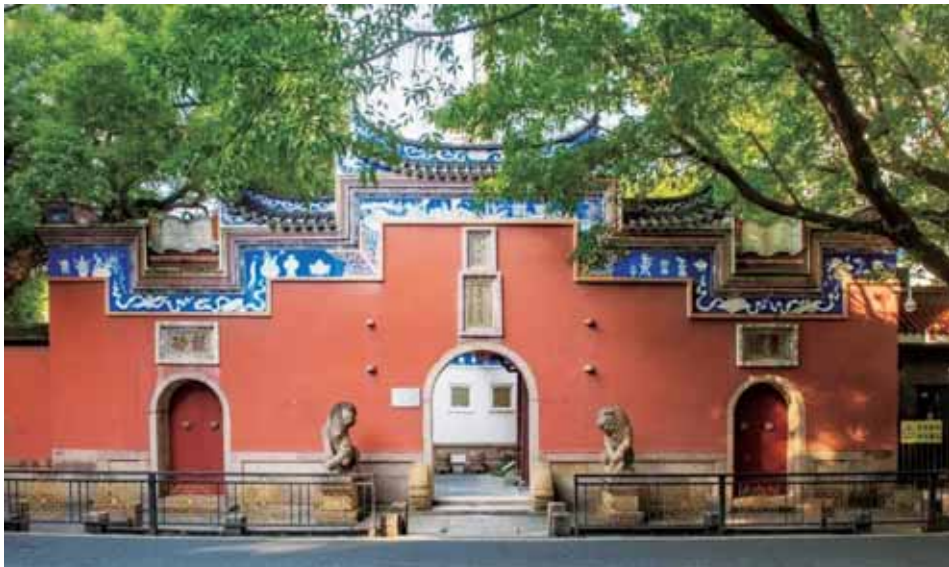
南安兵变后，王氏兄弟杀死原先的军队首领，带着这支两万人的队伍，在接下来的七年中逐步占据了福建全境，并得到中枢王朝的正式册封。七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但对于他身后的千秋万岁而言却是再渺小不过。

福州城的忠懿闽王祠内，至今立着唐哀帝赐给王审知的德政碑。这块五米高的黑石从大唐灭亡那年一直立到今天，和王审知那句名垂青史的“宁做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一样，是以这片边缘土地为舞台演绎生发的故事而又第一次被中原视角看见与认可的凭证。

在以大一统为尊的历史叙事中，那些短命割据政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来福州这匆匆一趟，让我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知。

王审知治闽30年，放在五代十国的历史大局里，是众多个倏忽兴亡之一；而五代十国之于整个中华史，更是短暂晦暗不起眼的过渡时段。但这不起眼中的不起眼，却完成了它之前那些巍





福州忠懿闽王祠



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

巍天朝煌煌大帝所不能及的事——从0到1赋予一个被遗忘的地区以历史记忆，并且，在没有大一统的时代，为一方百姓创造相对的安定与文明，并带领他们走入全新的时代。

这个创造记忆的过程，一定不止像史书记载的那样平和美好，一定伴随着斗争和杀戮。但我们也看到，在王审知的白马踏上闽地之前，由天可汗的子孙管辖的福建五州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落后姿态而存在，这种落后包括政治与民生，不然闽南百姓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恳求这支来自陌生北方的溃兵去除掉自己的父母官？

当然，读史的经验让我有理由怀疑，这个泉州耆旧请义军杀刺史的故事，也许是王氏兄弟在闽南站稳脚跟后编造的，毕竟攻取泉州作为入闽第一仗，需要一个听上去不像是主动侵略的理由。

不过，这样的分辨已经不重要了。从1200

年前到今天，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始终以真挚感恩的心情将白马圣王开闽、治闽的故事一代代传给后人，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福州的别称叫榕城，大街小巷都生长着深碧参天的榕树。初到此地的游客如我，往往惊叹于那些过分纠结的树干与阴湿古怪的长须，竟有如此奇异的生长姿态。

看着这些榕树，就像看到这座城市的历史，每一枝节的生长都是很多种原因的结果，从挣扎与分裂中垂下、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须蔓，供后人追索攀缘。

但对于行走其中的人来说，这些纠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棵榕树最终都会长出盛大而慷慨的树冠，纵然落花流水春去也，亦能庇众生于骤雨与烈日。

##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老福州

安 静（奥地利）

一踏入南后街，伊里奇的眼睛就不够用了——眼前这组明清风格的建筑群，有 200 多座古厝，亭台楼阁镂空精雕，匠奇艺高榫接而成，巷巷连贯坊坊相通，黑色和赭红相间的墙体，神秘庄重，高大含蓄。黑灰白的底色下，清晨的阳光慢慢爬上深深的庭院、盘曲的回廊和园林、小巧的天井……老伊高大的身躯迅速被东方神韵所淹没。

老伊是我丈夫，奥地利人，全名阿尔弗雷

德·伊里奇。2008 年我们在福州登记结婚，蜜月之旅就始于这座被称为“海滨邹鲁”的历史文化古城的中心——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中国现存唯一的坊巷格局的建筑群，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纵横交错的坊巷，浓缩了福州民居的特色，也浓缩了福州的文化内涵。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半部写于此。这里曾是晚清思想解放的烽火台，走出过民族英雄林则徐，黄花岗烈士林觉民，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等一



批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人物。可我无法将这份长长的名单罗列出来，因为这些文史知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太费解了。

但建筑本身会说话。伊里奇爱极了散发着闽越古城民居特色的雕梁画栋、飞檐翘壁、泥塑彩绘、水榭戏台，以及那些精巧的石刻柱础、台阶门框、花座柱杆。曲里拐弯的逼仄小巷，让他想起了自己居住的奥地利老城萨尔茨堡，那里也陌巷深深几许，闹市之中不失古韵，老街迂回婉转，曲径通幽，从粮食胡同的莫扎特故居，经犹太巷穿进莫扎特广场，再转向捕鸟人巴巴基诺广场。雪雨迷蒙之时，撑着伞彳亍于凹凸凸凸的石头路，循着嘚嘚的马蹄声，一回眸，呀，马车上高鼻深眼的佳人，傲然擦肩而过……

正痴想着，一阵微风吹过，铃铛形的蓝花楹轻晃，紫色花雨漫天纷飞，簌簌花瓣落在发梢。穿街过巷累了，我们就到榕树下的餐馆点了海蛎饼、芋粿、锅边、肉松等福州小吃，慢慢享用茉莉花茶，一边欣赏抑扬顿挫的闽剧、伢唱，一边

细数这座“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百年风流。小巷清静，古榕垂髯，我们从一位依姆手里买了几串茉莉花环挂在项上，恍惚间，一下就遁入缓慢悠闲的旧时光。

较之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欧洲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很少很浅。老伊每当看到古人模样的雕像，便问：“这是孔夫子吗？”我大笑，原来他所知道的中国文化人就只这位孔圣人啊！所以马上带他去见识真正的孔夫子——朱紫坊街区圣庙路的孔庙，白墙黛瓦，马鞍形风火山墙，是福州最大的文庙，充分体现了闽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过了孔庙就是朱紫坊，因南宋通奉大夫朱敏功四兄弟皆登仕门，一家朱紫盈门而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之题诗：“红纱笼灯过斜桥，复观晕飞插斗杓。人在画楼犹未睡，满堤明月五更潮。”这里住过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基础的萨镇冰、方伯谦等名将，有“海军巷”的雅称。

我曾在朱紫坊住过几年，旧居边有一小祠，



香火缭绕，老伊好奇地点燃一炷蜡烛供上，问其来历，我娓娓道来：此为罗山曾公祠，供奉明代的“监狱之神”曾扬立。他任典狱长的时候，仁慈宽怀，百姓感其仁义，奉之为神明，塑像立祠祀；而建祠纪念狱神，世上罕见。

这个掌故令老伊羡慕：“原来你曾住在这样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啊？”我很得意：“你以为就你们奥匈帝国有文化啊？我们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单这个朱紫坊，就有1100多年的历史！”曾是古护城河的安泰河边，从前酒肆笙歌，炊烟袅袅，“两岸人烟绣错，舟楫云排”，才子佳人隔岸调情，荔枝换绛桃……但老伊不敢相信，眼前这狭小的安泰河，以前人们竟可以在此淘米洗菜捣衣？很遗憾，由于城市发展，河道变窄，许多功能丧失了。

20世纪90年代，我的寓所正位于花园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府宅一隅。夏夜若听到噗噗的声音，早起定能见到地上些许杌果，带着露水在晨光中金灿灿地一闪一闪，拾起来用衣角擦擦，削去皮，猛咬一口，肉质鲜嫩，果饱汁溢，满口余甘。院里有棵桂花树，秋月朦胧之时，花影憧憧，奇香馥郁——我猜想她的芳华一定酝酿自明朝。冬日夜凉似水，冷月如钩，闭上眼，似乎便可见相府家的女眷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或吹箫抚琴，愁眉紧锁，或研墨作画，巧笑倩兮，或吟风弄月，且歌且舞。

这听起来诗意盎然的老房子，其实更似属于女鬼的聊斋，我住的时候，破败失修，屋顶漏

水，砖瓦坍塌，光线阴暗，天井被缠绕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从裂缝中长出青草的破墙苔藓斑驳，下雨时唱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戴着斗笠做饭洗衣。有一回，几户人家的电饭煲等厨具突然莫名丢失，不免生出无尽联想……这样阴森可怖的老宅，绝没有转朱阁低绮户的清雅，那滴滴答答的漏雨声，更像是孤魂怨鬼寂寞萧瑟流不完的伤心泪，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旅欧若干年后，我和老伊重返福州，看到安泰河经过综合治理，荡去污浊，莺转鸟啼，芳郁碧翠，重新成为榕城版的“小秦淮河”，这位酷爱清洁的老外松了一口气。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福州在“最干净城市”榜单中排名全国第七，成为内地唯一上榜的省会城市。

这回，老伊在朱紫坊的“破店”大快朵颐了福州版的“东坡肉”猪蹄髈，肥而不腻，色泽红亮，肉烂汁浓，味醇香糯。德国有一道著名的菜肴“德国咸猪手”，其实就是蹄髈，但跟破店蹄髈哪能比呢！福州名菜佛跳墙，和尚都忍不住翻墙来偷吃！嗯，再来一碗鱼丸吧，鱼肉做的外皮，包着肉馅，汤里撒些胡椒粉浇点米醋，有点辣有点酸；津泰路上的手工肉燕作坊，如同艺术创作，工匠们手起槌落肉泥翻飞，令人叫绝。

我们兴致勃勃地登于山访白塔、敬威公祠，行乌山观乌塔、品道观。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有着“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美誉的上下杭，水水相连，桥桥相通，触动了老伊的威尼斯情结，而城外的“福州碑林”鼓山摩崖石刻，更



让他深深领略了象形文字的艺术魅力；弥漫着古刹钟声的涌泉寺和西禅寺，让他看到除了尖顶洋葱顶、哥特式、巴洛克教堂之外东方寺庙建筑的独特风韵；在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马尾，他煞有介事地和石雕长辫子海军士兵一起操作炮筒“开炮”。

如此仍不过瘾，见海滩有渔人拉网，他也凑过去，饶有兴趣地捞起一尾大肥鱼。忽然，船舱里传来渔家小孩的琅琅书声：

老福州，老福州，柳舞草飞，月门花窗；

山中有城，城里有山；森灵晕染，古韵古香；

瓜肥果甜，披红抹绿；派江吻海，闽水悠长。

老伊入神地听着，手一滑，鱼咚地跳入水中。

正是晚霞夕照时。

那次度完假，我们就回欧洲了，后又被新冠疫情困住。何时能归？不得而知。老伊暂时只能在美好的记忆中回味福州了。

前不久，世界遗产大会在榕召开，勾起了他对福州的思念。听说我住过的老宅已经翻新改造为融古典和现代风格于一体的网红咖啡店，他好想回“虎纠”“卡溜”。我脑补了这个情景，不禁哑然失笑：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穿着汉服和木屐，绕过龙墙榕和美人靠，踢踢踏踏地踩着青石板，在镶着碎石贝壳的旧墙角下，拾几只杌果，到古厝打卡，品喱芋泥麻薯融入拿铁的别样口感；参观始建于宋代的美蓉园里的花园假山、水池雪洞，触摸古人的生活，再买几件福州特色的漆工艺品……福州，已然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中国，已然是他的第二祖国。

我着实被感动了。没想到，远方那座以“古”闻名的城市，它的古塔、古屋、古物、古桥、古巷、古风里，竟深藏着一位奥地利绅士的浓浓乡愁。

# 盛夏荷香

付秀宏

舟行迢迢情不尽，风吹荷塘香万家。几处楼台依碧树，谁家人面映荷花。在盛夏荷香里，与采莲女子荡一叶轻舟，游走起一片片涟漪，是多么美好！耳朵里听的，是女子银铃般的声音；眼睛里看的，是那些引为知己的荷；鼻子里闻的，不用说是荷花荷叶香的气息。

暑气蒸蒸，荷香袅袅。在南国福州，众多的公园里，到处都植有荷花。而这一处荷田，面积甚广，拿“接天莲叶无穷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从第一眼瞥见荷花，到与它告别，我不愿发出一点儿声响，来弹破这宁静。我默默冥想：盛夏里的荷塘，是如此宁静而又热烈，是那样明朗而又缥缈。在凌波荷田中，忽然惊起一滩鸥鹭，那当是李清照《如梦令》词里的境界。

荷生，则境生；境生，则孕香。所谓“青莲开，则净土在”，即是此道。荷花圆圆的大叶，上生蜡质毛丛，遇水不会濡湿。雷雨过，水滴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像“走盘珠”似的。荷花大而好看，那荷花颜色之鲜润，真像才从池子里捞出来，有着迷人的清香。尤其晨时，它的大叶与有清香的荷花一并舒展，见了使人清凉。

季羨林在《清塘荷韵》里说，中国人少有不

爱荷花的，他自己在夏季每天总要到池塘边上去看几次。看得久了，他悟到荷即便在严冬的冰下也没停止运动，历经三四年工夫，从几片勇敢的叶瓣跃出水面，到许多叶片接踵而至，再到荷花满塘。离季老住所不远的燕园的荷花，不但红色浓，且花瓣多，每朵花能开出十六个莲瓣。莲花红艳耀目地高高凌驾于莲叶上，迎风弄姿，睥睨一切。

“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这正是‘池花对影落’的境界。”

季老爱煞了盛夏荷花，白天不过瘾，晚上纳凉也不落场。眼睛看、心里算，每日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沓沓晃晃，开了将近一千朵呢。“有一夜，天空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



西湖公园荷花池



茶亭公园荷香

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它一入水，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月亮的倒影被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原形。”

我本人也十分爱荷花，常站在荷塘边观赏，感觉荷是清凉的，风是清凉的，月也是清凉的。丝丝缕缕的荷香，好像会说话，与谁说呢？心香一瓣付知音，花朵曲线玲珑地裹着身体，片片皎白优雅地呈给心上人。那出自肺腑的心声喃喃在耳，一股股的适意流入四肢百骸。“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相到薰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绿油油的荷叶里，簇簇荷花烂漫地开，透着盛夏的味道。正值采莲季，密集的荷荡里，三五小船在高过人头的荷叶下摇桨穿行，一条船上有三两个年轻女子，她们有的在采摘莲蓬，有的在品尝清甜的莲子，有的折荷叶帽戴在头上。微风徐徐拂过，风里携着芬芳的荷香，氤氲在万亩塘上。

人浸在荷香中，荷香似乎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心神与荷香几乎凝作一体了，如水乳相融般，有说不出的沉醉。望向远处，一座吊桥在两山之间，悠悠自在。阳光照荷塘水面，如银鱼跳动，恰是“暮临碧山下，船随佳人归”的况味。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荷香就这样款款走来，又走去；人走，月也走，最后藏身于一朵朵荷蕊里。

福州暑季的大地，热得像个蒸笼，让人有些心烦，但来到荷塘旁散步，却是一派神清气爽。在荷塘边柳下长椅悄悄坐下，长鸣的蝉儿暂歇了歌唱，微风习习水波不兴之间，悠然嗅着丝丝缕缕的荷香。荷香是夏的极致，与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一样，盛夏荷香的一帧帧形色、神态——就是美的极致。

荷塘风景，最突出的是得“香”。荷箭叶碧，超然出尘，荷香是仲夏夜的眼睛，就如同金甲虫飞在5月的花丛里。月光清极，塘里的水静静地流着，荷梗擎着碧绿的荷叶，好像睡了，此



赏荷人



金山公园

时荷花的香气似有似无地飘着。与荷香知己似的脉脉相对，我不说话，她也无语，无声胜似有声，像是荷香也在凝神听我的心跳。

葱白淡然释，绯红笑颜启。羞怯又欲止，无辩是天籁。入神间，突感盛夏之好，良宵无苦，壁钟有情。因荷香之勇，始洞见自己心相；因荷香之智，方授得心胸盛大。静默属于永恒，荷香犹如心念。犹花在叶间蹁跹而起，蜻蜓、蜜蜂在荷花角头和花蕊来与不来，都觉得恬淡惬意。

盛夏是荷花的洋洋帝国，从荷花之相到荷香之味，一如檐下的雨滴，渐渐可辨，蔚成一阕特异的音乐。花儿从苞房一点点打开，到露出白嫩嫩、红扑扑的脸颊，愈发泼辣大胆起来。这般情形，多像桐油香的油纸伞错过了雨天——就无所谓伞了一般，荷花笑着、闹着，赶趟儿似一拨一拨涌来。

微闭眼帘，陶醉在如此曼妙的意境里，久久不愿醒来。吸一吸鼻子，花香裹着叶香，一漾一漾的香气——从花、叶间不断升起、交融、飘

荡，把人的肺腑都搅酥了。试想，一个有情怀的人，一旦错过了荷花季，错过了与恣意绽放的荷花对视的时光，心中难免会有一股说不清的惆怅。

盛夏之时，朵朵荷花，亭亭净植于水上，盈盈欲语；田田荷叶，匍匐联袂在水中，结成一片，挨挨挤挤。荷清新脱俗，不为诱惑而拂去心性，一派淡然从容。听一莲农说，荷花虽姣，但盛夏的荷叶千万莫折。折了荷叶，塘水就会灌进荷茎，荷根就会烂掉。因荷叶是荷田的保护神，须入秋后去折才不伤根本。那时的荷叶，只消晒上几天太阳，便有一股浓郁的清香。

恍然间才懂，荷花有荷花的宿命，碧叶有碧叶的因果，人有人的心觉和理性。世间万物，都有着各自的信仰和使命。一念荷香，一季莲实。一剪闲云一溪月，一程山水一年华。一世浮生一刹那，一脉荷香一烟霞。一个人、一塘荷，一帘梦、一段情。有时，荷香就是这样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心绪才如此波澜不惊。



# 七闽人师阮弥之

卢美松

阮弥之的名字至今已少有人提起，因为他从江左（江苏南京）来闽担任昌国（即晋安）郡守已是距今将近 1600 年前的往事。他的生平事迹早已隐入历史的深处，鲜为人知。但若说到福州乃至福建的教育发展历史，这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在福建卒后，朝廷为之立庙奉祀，且题匾曰“七闽人师”，表彰他开闽地文教之先河的贡献，也是对他个人治绩的历史定位，是对福建教育历史的客观记录。

福建古称“七闽”，这不是行政区划的定数，而是出自上古周代朝廷在闽“所服国数也”。也即当时闽人所立七个方国（部族）全数臣服周王朝，福建地区归入周朝版图。当时闽族人分布的范围包括闽中地区周边的浙南、粤东和赣东南地区。所以乾隆时福建官员为重建的“忠惠阮公祠”题匾，又称阮弥之为“闽瓯师表”，因闽北、浙南在汉初为东瓯国地，闽瓯之称体现了人们对前古时代闽中地域范围的历史记忆。“昌国



阮弥之像

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教之稼穡，兴学校。”这表明晋宋之时瓯闽地区初受中原王朝管辖，尚缺少文明教化。正因为如此，阮弥之入闽主政昌国郡，其教化治绩更显难能可贵，他应是闽中文教始祖。

谱载阮氏是伏羲氏之后，阮谿伯之胤，皋陶伯益之裔。商代受封，建立阮国于泾渭（今甘肃泾川），东周迁陈留郡（今河南尉氏县），甘于隐逸，蔚为望族。为“建安七子”阮瑀，“竹



阮公祠



阮公祠正门“八闽奉旨第一祠”碑

林七贤”阮籍、阮咸之后。阮氏被称为“中州士族”“南渡世家”，因有习儒的传统与重教的门风。阮氏入闽始于南朝刘宋。阮弥之任昌国郡守是在受任交州刺史的第二年即南朝元嘉二年（425），这可能是他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站。他以仁心行惠政，史籍记载他的政绩比较简略，但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应该说他的文教绩效具有首倡之功，其兴农业绩的开创意义甚巨。

史志记载，阮弥之治闽业绩首先在于劝农。如《闽县乡土志》载，“弥之教稼穡”，并称“弥之入闽兴学，在虞愿、李椅、常袞诸人之前”。又说他“盖首劝民农者，闽人食其德”。可见，此前闽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尚低，阮弥之是中原世家南渡江左，以先进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技术教导闽越土著，是福建有史记载劝民务农、学习先进稼穡方法的第一人，故称“首劝民农”，这也是福州地区从蛮荒走向开发、精耕细作的最早记载，为福建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居功至伟。

阮氏落籍闽中后，阮弥之率领族众开发住地钱屿墩周围大片农田；阮氏聚族而居，因而有阮洋之地名。

其次是《乌石山志》记载，当时“洞夷海寇为虐，弥之设方略御之”。这句话语焉不详，实指当时福建大部分地区还处在蛮荒状态。“洞（峒）夷”应指居住在福州周围山岩洞穴之中的闽越土著。“海寇”乃指晋末卢循起义失败后流落在闽海地区的“义民”，他们多改操水上生业，为“游艇子”，又称“泉郎”，有的流为寇盗。这些沿海地区的土著闽人，或“以渔猎山伐为业”，或从事捕捞采摘为生，尚少定居务农生活者。宋梁克家《三山志》记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迹郡邑，小离人迹即虎豹猿猱之墟。”这是南朝陈朝建立时，新设闽州以辖诸郡时的情景，可见福州地区开发之慢。阮弥之因势利导，施以教化，以武力平定动乱，以仁心劝导农耕，其化育夷越之功至伟，是继严高筑城之后功业载入闽



阮公祠内景

史的第二人。

当时，福州地区还是闽江口的一大港湾，周边由无数山峰环绕，闽江海湾内人口聚集，各营生业。经历千百年漫长岁月，沧海桑田的自然变迁，让“闽在海中”的江口海湾内，由泥沙淤积而逐渐在山丘周围形成洲地平陆、荒原草甸。传说阮弥之带领乡民开发百里沙洲，后来阮氏家族也就定居在福州东郊钟山（又名钱屿墩，俗称前屿）周围地方，前屿遂成他终老之地。由于阮弥之和后来继任晋安郡守的两位弟弟阮仁之和阮永之都曾任职晋安郡守，他们的后裔遂在今前屿附近开基创业。多年之后，其裔胤繁衍发展，许多人迁往福建各地乃至海外。据记载，琉球阮氏寻根到福州，其本为明初赐往的“闽人三十六姓”之一；越南阮氏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参加福州阮氏的祭祖活动。

再次，清郭柏苍《乌石山志》记载，阮弥之“兴学校，正风俗”。《闽县乡土志》载：“弥之

入闽兴学，在虞愿、李椅、常袞诸人之前。”阮弥之于乌石山南麓拓地 30 多亩，建房 20 多座，作为办学施教场所，延请江左阮氏文人及名士任教，传播中原文化，宣仁广义，正风俗，扬士风，倡文明，民风因之“丕变”。据《三山志》载，因他的教化，闽地从“俗未知学”做到“家有诗书，市无斗器”，开启了闽中的文明教化，民风市俗也随之改善。阮弥之治郡的教化成效影响全闽，闽中读书之风由此兴起，可见诗书教化确能移风易俗。闽中初现良风美俗，社会风化遍于市井。阮弥之歿后，世人即其地建“七闽人师庙”以祀之，诚为实至名归之褒扬。可惜，继阮弥之之后担任晋安郡守的两兄弟阮仁之（元嘉九年即 432 年任）、阮永之（元嘉十五年即 438 年任），却没有留下记载，成为历史的缺憾。

阮氏家族在历史上是衣冠士族，永嘉之乱中自河南陈留袁渝南迁至于江左，是为南迁世家之一。阮弥之三兄弟入闽为官，隋唐以后，阮氏后

裔逐步分散迁往闽中各地开基，如漳州、泉州，兴化、福宁、延平州府，福州的古田、长乐、罗源等县，福州东郊则集中在前屿、后屿、阮洋（俗称远洋）等地。根据琉球阮氏族谱记载，始祖阮国（号我莘），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出生于龙溪县，1594年后，多次往返中琉之间，1607年受朝廷批准入籍琉球，以士族身份居住久米村。其后裔不忘开基祖，坚持400多年祭祖活动，当代更组织“阮氏我华（即莘）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携带《阮氏家谱》寻根到漳州龙海角美，拜谒祖庙“世德堂”。同时，还访问了福州阮公祠、泉州阮氏祠堂、海澄（县）月港阮氏宗祠。

阮弥之的善治惠政闻于朝廷，宋文帝刘义隆特派朝臣袁渝到闽中考察，“覘其吏治”，“观察吏政，访求民隐。”阮弥之如实报告，“陈捐益上言”。经了解后，袁渝多次向朝廷汇报阮弥之的仁声惠政。皇帝十分高兴，想把阮弥之调回朝廷，委以重任，可是当地百姓“焚香遮留”，不让调走。阮弥之终于留下。但几年后因为同情社稷大臣檀道济被枉杀，阮弥之“竟叹息忘寝息，以忧卒”。可见他忠国为民，忧劳国事而忘身。朝廷得到他的死讯，随即下诏表彰，追赠资政大夫称号，并赐谥“忠惠”，赐祭葬并建庙，定春秋二季官祭。

阮弥之在任期间功绩卓著，但史载简略，归纳其事迹主要有：教民稼穡，垦荒屯粮；兴办学校，延师教学；端正士风，移风易俗；招安岛



阮公祠中门上额“钦赐葬祭忠惠阮公祠”勒石

民，化育夷越；绥靖闽疆，郡邑井然，闽中因之大治。听闻阮弥之死讯，各地男女百姓痛哭，颂其至德。史载“闽人食其德，立祠祀之”，并“塑像奉以为神”，在乌山南麓学社原址建庙，郡人奉匾曰“七闽人师”。同时在阮公衙署旁建忠惠庙敬祀之。明万历七年（1579），“七闽人师”庙毁坏。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赐帑下旨重建，遂移建于东郊归善里（今前屿村），福建宪台题赠“闽瓯师表”匾。这一题匾与最初“七闽人师”题匾都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阮弥之于闽中开辟文教鸿蒙治绩的评价和礼敬，寄托着闽人对阮弥之劝农兴学、教化百姓功业的永久思念。祠于道光年间遭飓风摧倒第三进，余下两进于光绪十九年（1893）重修，1994年再修。现占地面积575平方米。祠宇坐南向北，土木结构，前后三进，保留明代建筑风格。1995年公布为福州郊区文物保护单位。

## 四十八年赶考路

吴秀仲

连江人胡绍峰从15岁起读经，至63岁（虚岁）考中探花，前后历经48年，几乎将青春年华全耗在科举上了。只因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科举是他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独木桥。

科举从隋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结束，长达1300年。连江县一共出了367名进士，至今影响深远。

胡绍峰生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一生以

儒为业。想要达到进士这一高度，至少须经四级考试：以明清两朝为例，最低一级是童试，第二级是乡试，再就是会试，最后是殿试。

15岁那年，胡绍峰到云居山南麓静室寺读书。寺庙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清顺治五年（1648）重建，依山面海，环境清幽。这里离家不远，仅4.5公里，平时人迹罕至，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童试在县里举行，每三年举行两次，多在二



连江儒洋村



静室寺



胡绍峰像

月，由知县主持，一般考五场，分别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策论等，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至少要有4名同乡和1名秀才保举，方有资格。

雍正七年（1729），胡绍峰通过了县一级的童试，且位列头名，曰“县案首”。这一年他20岁，正是弱冠之年。可能你会觉得，短短5年就攀上了功名，看来考个秀才并不难嘛！其实，每次县试童生千数百人，只选拔十数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已属相当不易。君不见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终其一生，竟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

何谓“半个秀才”？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祀乐舞者，是为“侑生”，也称“乐舞生”。但童试不单单县试，还包括府试和院试！这一级别，都可以视作进士科前的预备性考试。所以说，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考到一等，当然幸运；要是考得不好，甚至要面临降级的风险，实

在令人后怕！想一想，经过这样一级级选拔，一层层淘汰，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后冒尖的岂非凤毛麟角？

府试由知府主持，院试由省里的提督学院（亦称学政）主持，故名。这两类考试也是三年两次，考试内容、报名手续等大体与县试相同。以院试为例，分正试一场，复试一场，试八股文与帖诗，并默写《圣谕广训》百数十字。揭晓称“出案”，录取者为“生员”。

通过以上种种考试，才是读书人进身之始，算得上正儿八经的“秀才”，意味着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可以有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使用刑等特权。但秀才也分等级的，一是才入学者，谓之附生，有附学生员之意；二是再按岁、科两试（指不同年份的考试），等第高者可补为增广生或廩膳生。增广生亦名增生，因于廩膳生外增额，故名。廩膳生亦名廩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廩”就是粮食的意思，相当于每个月领取奖学金。廩生与增生各有定额，据岁考、科试成绩递补。胡绍峰考中了秀才，自然要入泮进学，也就是进入县学，以备府试和院试。“泮”指县学宫，又称文庙，位于学前铺（今连江县文山路宏宙花园内）。连江县学始建于北宋嘉祐元年（1056），南宋绍兴七年（1137）移建，代有重修，先后有繡经阁、驾说堂、明伦堂、泮池、射圃等建筑物。大成殿是宋代标志性建筑，大梁高悬“万世师表”横匾，中塑孔子像，凸显尊师重教之礼。

从儒洋出发，尽是羊肠小道，路不远，约7公里，到县城去，须横渡敖江。从江南斗门塔下，乘船过渡，至荷山渡口，沿敖北防洪堤缓行，城东门就在不远处，城楼上题匾“海日奇观”赫然在目。穿过“印宾”门，再行一箭之地，便到了县学前。宫墙上嵌着一米见方楷书石刻的“仰之弥高”四个大字，一字一块，共四块，边门上又安着两块石匾，上书“江汉秋阳”“金声玉振”。宫门前，竖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青石碑。胡绍峰整肃衣冠，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叩响门环。

县学里设有山长1人，还设副山长、教授等。地方名儒定期聘来讲学，主要是讲经释义，质疑问难。县学允许形成不同的学派，鼓励共同讨论学问。不过入泮进学，形式大于内容，入学仪式后，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作为生员，基本上还是靠自学。每个月两次课考，成绩优异者能得到一分膏火银的奖励。

县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田，学田靠捐置。自宋嘉定二年（1261）以来，连江县先后有12名官员或士绅共献学田146.9亩，年载租（稻谷）15467公斤。明万历十三年（1585），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捐虎头山田80亩，为历代捐献学田最多的一次。田租的收入可供县学正常开支。自清雍正以来，县学逐步为官府掌握，由县衙提供经费。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15年过去了。乾隆九年（1744），胡绍峰35岁，由于岁考和科考两试均为优秀，补为廪膳生，邑中称为名士。这一

年，不仅深得知县吴元春赏识，而且喜结良缘。妻子是丹阳溪尾村林氏，是邑庠生林志虞的堂姐、邑庠生林大观的堂侄女。邑庠生，是指同县的秀才。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堪称人生快意之事。

可是胡绍峰并没有放松太久时间，他又开始精心准备，参加乡试。乡试在省里举行，每3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帝、皇后整寿（逢每一个十满岁）或非常庆祝之事加行的乡试，称恩科。

乡试考了15年，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名列副榜。副榜即在正榜（正式录取）之外，另取若干，可以入国子监肄业，有做官的资格，称副贡生。但胡绍峰没有止步不前，他咬紧牙关，继续参加乡试。

又过了11年，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恩科乡试，61岁了，终于中举！第一名称“解元”，而他是第35名，称“文魁”。中举，所谓被荐举之人，正式成为国家在编官员，可以在家宅或宗祠大堂挂匾或在门前竖旗杆了。全乡全族都跟着沾光！

能跻身这一行列，不可否认是一等一的人才，但也极有可能深受狭隘的程朱理学、迂腐的八股文所禁锢，真正的才华在每一次惶恐不安与战战兢兢中消磨殆尽了。

当胡绍峰艰难地爬上这一级台阶，他没有想得太多。这一年深秋，他早早起身，去北京赶考。尽管年过花甲，初心依旧。这一趟行程，并

不轻松，近 2000 公里，翻山越岭，舟车劳顿，费时两三个月，要赶在翌年二月前，到达礼部衙门。好在旅途费用是公家给的，所以叫“公车”。这是科考的第三级台阶——会试，又称“春闱”。

会试好比全国举人大集会，各省的举人和国子监的监生皆可应考，面对各路英雄大比拼，不仅仅靠实力说话，还要做全方位的攻略。此前乡试是恩科，这次会试也是“恩科”。考试分三场，考官由礼部提名，由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员担任。会试名额两三百人，考取率也不过百分之二三。中式者称“贡士”，俗称“出贡”，即贡献人才给皇帝，第一名称“会元”。各省录取贡生名额不一，依据到京应试人数、各省的大小及人口多少而酌定。

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胡绍峰取中贡士，真是旗开得胜，一炮打响！但他不敢轻狂，或许是已过了年少轻狂的岁月，他默默地回到旅馆，闭门读书。只因会试之后，还须于下个月应殿试。

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因考场设在奉天殿或文华殿而得名，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并亲发策问，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极大。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这场考试只用来排名次，通常都能上榜，不会有落第的意外发生。根据殿试成绩，将贡士分为三甲，通称进士。其中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由于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



儒洋探花府大门

称黄甲，也称金榜，民间俗称“金榜题名”。胡绍峰得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恩科（黄轩榜）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这一年是农历辛卯年，安徽人黄轩一举夺魁，名列榜首。数下来第三行，赫然写着“胡绍峰”。探花？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眼花了。探花！他创造了历史！他是连江县历史上唯一的探花郎。

连江县历史上先后出了三位科举甲榜人物。第一位是郑鉴，南宋淳熙元年（1174）以太学上舍生参加廷试名列榜首，授太学生，人称“两优释褐状元”，官至台州知府。第二位是赵恢，明宣德八年（1433）参加殿试，名列曹鼎榜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第三位就是胡绍峰。由于头甲三名被称作“鼎甲三元”，因此县志中合称“连江三鼎甲”。

新科进士取得出身后，虽然都将授予官职，但仍须应一次“朝考”，即再试于保和殿，并特派





探花府厅堂

大臣阅卷，按朝考成绩，结合殿试名次，由皇帝钦定授予何种官职。最优者入选翰林院，其次者分部任用为主事，又次者分别以知县任用，再次者任用为各州、府、县学的教官。这一次考试，只得了三甲第43名，起用教授。不过，担任什么官职，对于63岁高龄的胡绍峰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面带微笑，脑海里又浮现了琼林宴时的情景。按照惯例，殿试后，皇帝都要赐宴琼林苑，以示庆贺。赴宴时，同年多属青壮，他们见胡绍峰这个缺齿面皱的老探花，甚是可笑，而他倒也随缘不愠，笑而不语。宴罢，他挥笔赋诗一首：“宴罢琼林景物奢，红绫饼不碍残牙。座中多少人如玉，争向樽前笑插花。”古时男子插花是生活中的一种礼仪，是文人墨客追求雅致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修养。“探花”之名与簪花习俗密切相连，亦称“探花使”。在琼林宴上，簪花礼是最重要的程式，胡绍峰头上两鬓插金花，犹如众星拱月，荣耀无比。



厅堂内景

“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从出身寒门到平步青云，从半生潦倒到奢华盛宴，从无人问津到万众瞩目，胡绍峰品尝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直在负重前行，一刹那柳暗花明，怎不叫人笑中带泪，笑而自嘲呢？

任凭他人啧啧称赞也罢，羡慕不已也罢，争相戏弄也罢，体谅同情也罢，有什么好笑？他已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峰，尽管攀登的姿势一再被人取笑。尤为可敬的是，胡绍峰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幸运冲昏头脑，他面带微笑，与众同欢，以一种超乎常人的理智经受住了考验：在逆境中贵在坚持，在顺境中难得清醒！

曾经的凄风苦雨没有被辜负，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在手中，曾经一切的一切都值了！《儒林公议》中有这么一句话，很真实，也令人动容：“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 福州刺史趣谈

大 路

## 一、被嘲笑的福州刺史，究竟是谁

唐人张固《幽闲鼓吹》里有条笔记，不点名嘲笑了一把某位福州主官。是这么写的：

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即送妓。

——这事儿说起来很不体面。意思是某位福州主官，想要巴结贿赂宰相元载，于是买了十个美女（唐代的妓和今天的意思不一样，类似歌舞乐团里善于吹拉弹唱的女子），叫人带到京城长安去送礼。可送礼还得有门路，当时管用的门路就是宰相儿子元伯和。管事的人折腾了半年，还搭不上关系。再不送进去，美女可就老了。没办法，管事的只能在元伯和门外蹲点，终于发现有



《幽闲鼓吹》，张固 著

个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是经常能见到元伯和、并且很说得上话的，于是给康昆仑重重送了一笔礼金。立时三刻的，这批福建美女就给送进去了。

我们今天的福州人看着，当然不服气：唐代的福州主官不是“福州刺史”吗？高级点的带个

福建观察使的使职，哪来的“福州观察使”？这段子是瞎扯吧，说谁呢？！

不过话说回来，张固虽然生卒年不详，但我们知道他做过金部郎中，唐大中（847—860）后期，做过广西那一带的桂管观察使。能得到观察使这种重要使职的，至少是三品高官了。而要说《幽闲鼓吹》瞎扯，我们福州的老熟人纪晓岚也不同意。他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张固这本笔记“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意思是说这本唐人笔记里的内容虽然不多，但并不是瞎吹，基本上都是事实依据的。

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主编，清乾隆年间来过福州，做过福建提督学政。他这么一评价，倒是让我们不能不疑心：看起来含混的“福州观察使”，是作者故意手滑写错的吗？会不会是暗示这位主官的职衔必然是“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呢？另外，既然一开头就提到“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那么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段的——元载拜相，差不多是762年的事，770年诛杀权宦鱼朝恩之后权势达到顶点，到大历十二年（777），他自己因为专权贪腐才被赐死。那么，张固笔记里说的福州主官，可能就是这期间在福州任职的。

谁呢？

查一查史料，有三位。第一个是李承昭，任职时间761—771年；第二位是李椅，上任时间是772年；第三位是皇甫政，上任时间775年。

皇甫政只是福州刺史，没能当上福建观察使，暂时可以排除；李椅是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但他在福州人心目中非同小可，在任期间，他一心扑在福建的文教事业上，唐朝大散文家独孤及评价他在福建的功德“缦胡之纓，化为青衿”，是福建历史上青史留名、百世流芳的人物，而且是在任上去世的。贿赂元载这种事儿，跟他不可能搭边，直接排除。

现在，唯一的嫌疑人就是李承昭了。

## 二、李承昭时代的福州，有什么好处？

李承昭属于李唐宗室，没有考过科举，“门荫入仕”，最早是凭借他的宗室身份，直接当上了山南道采访使，加衔御史中丞。一出仕就是省部级，这是至德（756—758）年间的事。那几年大唐正陷在安史之乱里，756年安禄山称帝，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接着郭子仪和安庆绪拉锯大战，各有胜败，757年5月，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守南阳一年，城中食尽，溃围逃走——李承昭这个采访使，可也真不好做！采访使的职位，因为各地兵起，第二年五月就废除了，逐地改为观察处置使。758年，郭子仪大破安庆绪，760年李光弼破史思明，到761年，大唐才基本扭转局势，安史之乱进入尾声，朝廷开始收拾残局了。这一年，李承昭被任命为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

对于这个任命，李承昭还是很感激的，叫

笔杆子于邵写了篇《为福建李中丞谢上表》。这篇文章不长，今天还能在《文苑英华》卷585看到——

臣某言：臣以二月二十四日特奉渥恩，授臣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某月二十九日与中使某南北路分，即以今月某日至所部上讫。感戴逾涯，天增惧，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度材任器，论吏底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迭相沿袭，未之易也。伏惟皇帝陛下圣谟广运，光宅天下，德泽遐溢，苍生海隅。至若闽越都会，东南重镇。爰思俾义，宜者甚众。则中外咨谋，孰非俊选？岂臣薄劣，一无所取，超奖不次特稟宸衷，是以前表上陈，披肝布恳，自兹夙夜，不遑底宁，况今右武之状，方资辑睦，安人之切，又藉绥怀。贡赋不差于时，蛮夷得令安堵。惟是四者之备，皆臣之职分也。誓将克勤竭力，处约励心，日宣皇化，以展微诚。无任忘躯报国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这三百来字啥意思呢？开头说得授了这些官职，能让我去福建，真的是非常感激啊。福建福州是“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同僚中好多比我有资历的人都想去而不得，这样的好事居然落在我的头上，这对我实在是太优待了啊。所以我一定努力工作，第一保证准时上缴福建贡赋，第二要保得福建地方太平，以报答朝廷国家……

要是在唐朝初年派去福建，李承昭这么说大概就是虚伪或者反讽。隋朝管辖下的闽地，交到初唐政府手里的，只有登记在册的12420户。初唐时闽中就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地位和黔中、岭南差不多，是倒霉官员被贬才去的。这种地方也收不上多少赋税，贡品呢，按《三山志》说，“在唐，贡蕉布、海蛤、文扇、茶、橄榄”，就那么一点点很普通的土特产品。不过，经过百年发展，到开元年间，福建的统计数据达到109311户，比起隋末唐初，人口增加了八九倍，福州有31067户。

《唐六典》里对天下州府有过定位，“开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之外，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其余为六雄、十望、十紧，及上中下之差……凡户四万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为下州……”

福建一早就设立了中都督府，而福州按户数来算，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中州了。安史之乱，关中民不聊生，两京四辅几乎都是赤地千里。福建偏隅东南，反而在战争的旋涡之外生息繁衍，在和平中不断发展，越来越繁荣富饶。按《三山志》叙述，离都督府不远的虎节门外，“旧街东民居于沟外设店铺，中为廊，以便行者往来。”护城河外店铺林立，市面人气是很旺的。这时能够到福州任职，已经是宗室才能得到的优差了。

不但李承昭，他的继任者李椅，很可能也因为他是宗室才分得到福州。李椅调福州之前，那可是华州刺史。华州是当时的“四辅”（同州、



华州、岐州、辅州)之一，战略地位远远高于福州。但他为什么要从次中心的华州调到东南海隅的福州？降级了吗？未必。

户数可能就是关键答案。开元时华州户数是30787户，跟福州差不多，但级别远高于福州。到了元和，因为安史之乱的后续影响，华州人口几乎跌停，仅有1437户，差不多就剩个零头了。这时华州与福州哪个好？答案是明摆的。

为什么人口户数这么重要？

一个字：钱！

### 三、刺史留在福州的最大动力

李承昭从中央跑到福州地方任职，堂皇的理

由，除了那封谢表，还可以找出很多，但实实在在的动力，肯定是因为收入。

官员收入减少的最大原因，是战争。打仗是最耗钱的事，安史之乱还没结束，国家财政已经严重匮乏。对于个人最直接的影响，是官员的工资发不起了。

咱们现在看《贞观政要》，唐初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左右，可是到了玄宗开元末年，京官已有2620人，战乱中官员数也不减反增，到德宗贞元四年（788）是3076人。多了好几倍人数，怎么发工资？

李承昭到福州来之前，正是元载当家，元载在乾元年间再入户部侍郎、度支使（类似今天的财政部部长），改革了俸禄制。主要有三点：一、京官不给年禄，外官仅给半禄；二、京官不给俸料，外官仍给半料；三、京官给手力课，外官给白直、品子课。

不懂得什么是“禄”“俸”“课”不要紧，我们看得出来，就官员减薪这个事情上来说，京官最惨，能裁的工资奖金补贴都裁掉了，外官稍好，差不多只裁一半。这个减薪政策执行了近20年，到元载倒台才结束。之后是杨绾、常袞为相。杨绾、常袞上台后，为京官哭求皇帝，说“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意思是京城的官员都养不活自己了，要靠从外官手里借到钱才能存活下去，做京官的已经凄惨到这个地步了，救救大伙儿吧！于是，皇帝终于同意增加京官及京兆府县官月俸。话说，这位宰相常袞后来也到

福州来了，他原本因事被贬到潮州，幸亏不久他的学生上台，赶紧设法把他挪到比较好的福建来，做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那是公元780年的事。

穷京官当然都想外放。因为地方官的收入，可不止减剩的半薪。唐代的州郡收入，是可以把本州税收的相当一部分“留州”，用来发放地方官员的工资、日常办公费用的。按陈寅恪先生所说，“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以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

税收的基数，就是人口户数。中晚唐时期考核刺史，是要看当地人口户数的。《唐会要》卷69记录的唐宣宗846年敕书就有户数考核红线：“刺史交代之时，非因灾沴，大郡走失七百户以上、小郡走失五百户以上者，三年不得录用，兼不得更与治民官。增加一千户以上者，与超资迁改。仍令观察使审勘，诣实闻奏。”

意思是，州郡的人口绝不能少，只能增加。大郡少个700户、小郡少个500户，这地方官你就别当了。当然，要是能增加人口，比如1000户，超常提拔！

不管提不提，做刺史的，第一大任务就是收税。对当时的刺史来说，户数越多，税收肯定越高，自己的收入也越丰厚。

至于收入具体有多少，经过黄巢之乱以后，福建是没有这个资料了。但是现存的中晚唐文章里，有人剧透过收入。我们不妨来看看，自己来

类比推算一下。

剧透最多的人，是我们熟悉的著名诗人杜牧。

杜牧的诗，小学生都背过的，什么“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高中生也背过他的《阿房宫赋》，知道他的文集叫作《樊川文集》，“樊川”这两个字，就和他当刺史的收入有关。

宣宗大中三年（849），杜牧写了一封信给宰相，这封信的内容至今还看得到，叫作《上宰相求杭州启》。信的内容，是请求能够外派他到杭州去任刺史。

写信时的杜牧，人在京师长安，以司勋员外郎的本官担任史馆史官，这是很清贵的史馆使职，已经是比普通的京官好太多了。他自己也说现有的史官职是“史氏重职”，按理说该知足了，那为什么还要求外任？

杜牧很露骨地表示，杭州是个上州肥缺，“杭州大郡也，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之重，可以杀生而有厚禄。”我们现在看到《元和郡县图志》把杭州定为上州，“开元户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二”，元和户数是“五万一千二百七十六”，从元和二年（807）到写信的849年，中间过了40多年，没有大的战乱，人口也有可能发展到近10万，一年50万税钱，那可真是富得流油！

当然，这样的肥缺，估计是要抢破头，杜牧虽然是做过宰相的杜佑的亲孙子，也还是抢不过后台更牛的，杭州，轮不到他。

轮不到，那就继续求呗。第二年，杜牧写了三封信哀求宰相，这次他学得聪明了点，改求离杭州不远的湖州，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某一院家累，亦40口，狗为朱马，缁作由袍，其于妻儿，固宜穷饿。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

说我一家四十口人，都穷到饿肚子了，旧衣服都穿破了，马上就要妻离子散了，再不给我个外官做做，我一家也活不下去了……

湖州就在杭州隔邻，“元和户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七”，比杭州要少个万儿八千户，排排队可以轮到他，于是宰相松了口，杜牧得以外放湖州一年。

一年后回到京城长安，杜牧第一件事就是在长安城知名的风景区樊川盖起了房子。所以他的文集就叫《樊川文集》。杜牧的外甥裴延翰给《樊川文集》写序，说杜牧这个房子“……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吴兴就是湖州。你看，暴露了吧，一年的俸钱就能在都城最好的地段盖起一个带大园林的大别墅。

也不止杜牧是这样的，“求外放”是中晚唐官员的普遍行为，比如身为左领军将军的李皋，因“禄米不足养，诸补外，不许，乃故抵轻法，贬温州长史”，为了外放，不惜犯些小错，好让自己贬到地方去。又如“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薛邕从左丞的高位贬去做歙州刺史，落差这么大，妻儿老小却兴高采烈，纷纷感叹说，哎呀，来了地方，才知道吃好穿好住好，

生活这么好，你咋不早点贬官？！

在那时，只要不是穷州小州，刺史的生活都非常美好。而比刺史收入更丰厚的，就是观察使呀。你看杜牧一年湖州刺史就能盖个大别墅，福建又何止一个3万户人口的福州？贵为观察史的李承昭，手里还管着建州，开元户数20800；泉州，开元户数50754；至于漳州和汀州，刚刚开始，户口以千计，暂时是个零头，但这五个州加起来，已经超过10万户啦。关键是他任职的那几年，福建既没啥战乱，也没啥天灾，人口很可能只增不减。作为福建观察使，李承昭管着辖下的五个州，有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以及中丞御史这三份收入，妥妥的超级高薪人士没跑了。

不知道是不是送了10个乐妓的缘故，从史料记录来看，高薪人士李承昭得以留任在福州足足10年，一直到公元771年，才被调回京城。最后也许是同僚和上司甚至皇帝都觉得他捞得太多，任职超期超得说不过去了，于是“授礼部尚书，出任华州刺史、镇国军使”，把同样是宗室的李椅从华州换到福州（看看李唐王朝，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把经历过安史之乱，“素有谋略”的李承昭叫回去打仗。这位李承昭倒也不负众望，大历十年（775），拜检校吏部尚书、相州刺史、昭义节度使，参与了收拾魏博藩镇的行动，把节度使田承嗣打得大败，自己以军功得封豳国公。

这样的完美收局，大概还拜“有福之州”的福气所赐吧。

## 鼓屏路口的秘密

冯 涛

福州鼓屏路与冶山路、钱塘巷的交界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路口，因为靠近北门和屏山两个市场，总是能看见依姆依伯们提着塑料袋穿行其间，一派闲适的市井风情。绝大多数的福州居民很难想象，日常经行的这个路口下埋藏着 2000 年前两个国家对攻争战的过往。

公元前 111 年，闽越国王余善在自己的王城里欣赏着一枚刻着“武帝”字样的印玺，他正准备起身为即将出征的闽越国将士授予“吞汉”的军号。前线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闽越国的军队跨过梅岭后，在白沙和武林（今江西地区）击败了汉朝的三位校尉。

要知道，这个时候汉军已经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阶段性胜利，就在余善反汉前后，坐镇长安的汉武帝“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汉武帝自以为功盖先祖，本想着封禅泰山，没想到福建地



白沙、武林等地点位置图（图片来源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

区的蕞尔小国闽越居然敢朝自己的头上泼凉水。

不只是汉武帝，闽越人几乎朝每一位秦汉帝王都泼过凉水。闽越国是在秦末至西汉时期统治闽江流域的区域性王国，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里的记载，这个国家由居住在闽地的



越国后人所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南征百越，闽地正是进军方向之一，然而席卷六国的秦军却在南向的道路上折戟沉沙。

据汉代刘安称，秦向南方派出五路大军，共计 50 万人，其中一军驻屯余干，余干地处江西进入福建的要道，这支秦军的目标即福建山地里的“百越”。秦朝的五路大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与越人战，但遭到越人的坚决抵抗，他们穿行在南方山地的广袤森林之中，“莫肯为秦虏”。

秦军苦战三年，连最高统帅屠睢也战死前

线，秦只得继续派兵遣将。即便如此，秦最终也没能真正控制包括福建在内的华南地区。秦虽在福建设置闽中郡，然而只是虚设，西汉人田蚡曾说闽中之地“自秦时弃之弗属”。自秦朝开始，闽越国的存在就令中原王朝十分头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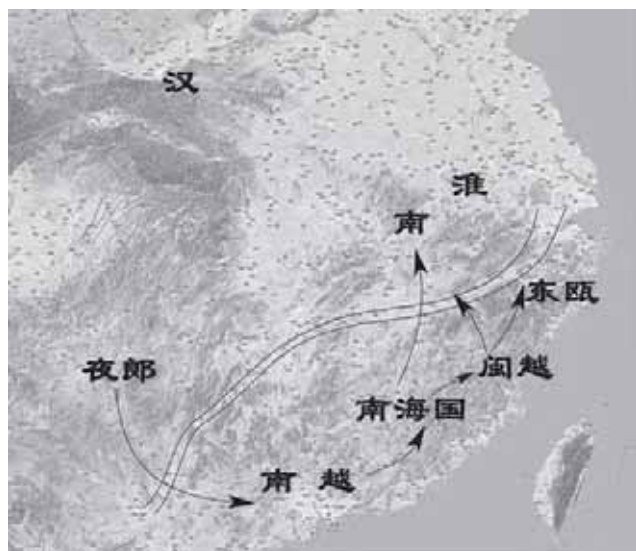
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一时间旧六国势力皆反秦，眼见秦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闽越领袖无诸顺势参与了反秦大起义，以图复位。秦果灭，但刚愎自用的西楚霸王项羽却不愿意封无诸为王，无诸立马转而效力项羽的对手刘邦。

事实证明，无诸的选择是正确的，刘邦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无诸受汉封为“闽越王”，统辖闽中郡旧地。在无诸的发家史里，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政治投机者的一面，而这一面几乎贯穿了闽越国的始终。

汉初闽越国的北边是驻扎浙南的东瓯国，南



秦闽中郡图（图片来源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



东瓯、闽越、南越地理关系示意图

边则是盘踞广东的南越国，它们都与汉朝建立臣属的关系，不能随意侵袭彼此。可是不安分的闽越国却总想得到南越与东瓯的领土。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反抗汉朝的主谋之一的子驹逃亡闽越，日夜劝说闽越攻击东瓯，闽越也想乘着汉朝国势虚弱之机谋得土地，便准备出兵攻打东瓯，孰料汉廷当即派出军队，闽越国也非常快速地收回军队。

之后不久，闽越王郢开始主政福建，又因攻打南越而开罪了汉朝。在汉朝大军即将临境之时，郢的弟弟余善集合自己的部下称：

（郢）擅发兵击南越，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

余善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闽越国的“基本国策”。闽越国立足于福建，地势险要，利于防守，如果想要扩充地盘，兼并邻国东瓯与南越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汉朝作为宗主国有保护这两个小国的义务，闽越就不得不掂量自己的“侵袭”会不会引发汉朝的介入，一旦汉朝介入，闽越就立刻收手。

闽越国经不住田土诱惑，想要伸手分蛋糕，却又担忧汉朝的鞭子抽将下来，于是在政治上表现得像一个投机者，在侵略与归顺之间变来变去，这种狡诈的生存方式给汉朝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汉朝时的长江以南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虽无冻饿之忧，亦无千金之家，经济上顶多

自足，没有余力可供中央调配，况且像福建这种多山地区，人口分散，风俗不类中原，这都会导致管理成本骤升，与其直接管辖，倒不如委任统治，即便闽越惹了一堆麻烦，最终也只能听之任之。

在余善杀了闽越王郢之后，汉朝就开始考虑抑制闽越国。余善本来就是闽越的领袖之一，又为汉武帝杀了郢，本应继承郢为国王，汉武帝却另立丑为越繇王。只是余善“威行国中，国民多属”，不得已汉武帝立其为东越王。闽越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国王，而且存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丑之后至少还有一位叫居股的越繇王。汉武帝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分而治之，可是余善并不买账。

当余善正高兴地坐在东越王位上时，邻国的南越却发生不小的内乱。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的宰相吕嘉发动叛乱，杀害了南越王赵兴。余善闻讯向汉廷提出合作，表示愿意出兵从海路进攻吕嘉。可是，大军才行进至闽广交界的揭阳，



公元前111年闽越与汉军交战示意图

余善就以海上风浪太大为由撤回军队，而暗地里却与南越取得联系。

余善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汉武帝对闽越的论调“数反复”。汉朝此次平定南越叛乱不同以往，并未再立一位南越王，而是直接在南越故土上建立起由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余善显然嗅到了危险的气味，在听说汉朝已经考虑灭亡闽越之后，很快地调动人马扼守入闽要道，这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闽越国的都城在“东冶”。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界对东冶具体位置提出了众多看法，不过从史料与最新的考古材料来看，东冶包含福州地区已经成为定论。秦汉时代的福州城大部分埋在福州古海湾里，只有北部的新店地区和冶山以北一小块陆地在海平面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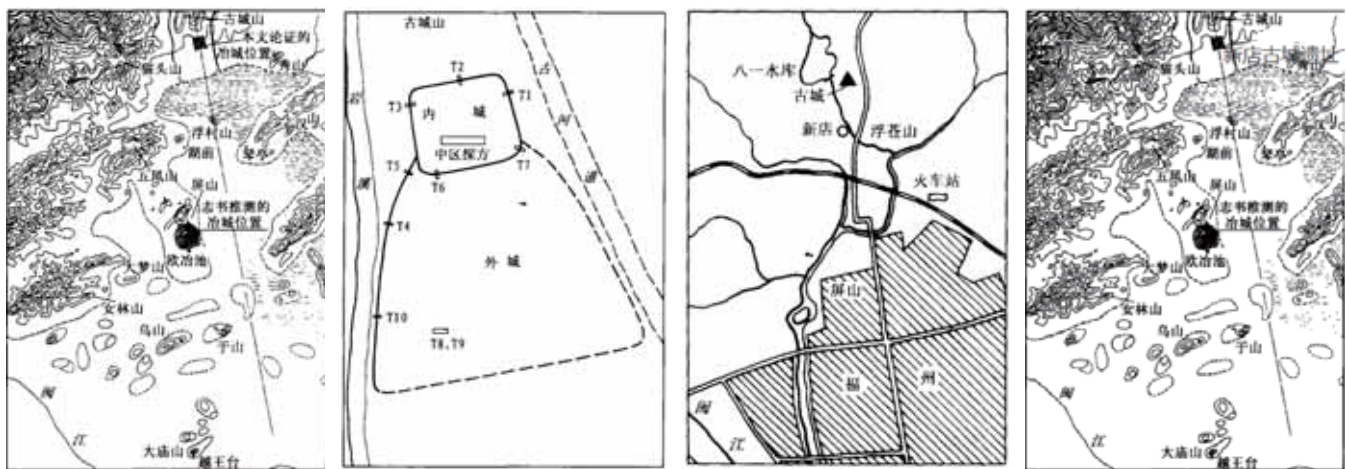
考古工作者们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发现了新店古城和屏山宫殿遗址，两者仍隔着一段距离，究

竟谁是都城尚无法定论，二者规格都很高，共同使用的时间相当长，应当都是闽越着力经营的城市据点。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当时的闽越国内部有不少的“邑”，屏山宫殿遗址与新店古城遗址至少都属“邑”这一级别。当汉朝大军临近，感到危险的余善，选择迁移至“泉山之南”，泉山指的正是福州屏山。当时的屏山东侧插入海中，西侧濒临海岸，形成一处天然的关口，屏山宫殿遗址所在的冶山地区在秦汉时期正处于三面环海、一面临山的地理位置中，十分利于防守，即文献中称余善“居保泉山”。

余善选择反汉的时间点在元鼎五年（前111），此时汉廷刚刚与匈奴和南越交战，余善借汉朝“士卒劳倦”之机，果断地由武夷山地区向西出兵赣鄱平原，击败前来征讨的汉军，在陆路上取得不小的胜利。

在海面上，由横海将军率领的汉家船队率先



新店古城示意图与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福建福州市新店古城发掘简报》，原载于《考古》2001年第3期） 冶城周边环境示意图（林汀水教授和郑力鹏先生绘）

抵达了闽越的核心地带东冶。当闽越再一次陷入濒临灭亡的境地时，福建地区另一位当家人越繇王居股主动反叛东越王余善，联合汉使和宗族除掉了余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余善也是借汉军压境之机杀害郢，平息了天子之怒，“固一国完”，但汉武帝没有给越繇王居股继续称王的机会。

从秦末以来，闽越国凭着山多地险数次“反复”，令中原王朝颇为头疼，锐意进取的汉武帝实在不愿再忍受了。汉武帝前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已经让财政不堪重负，相比于福建，汉武帝更愿意把有限的资源放在经营西域上。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汉武帝已经打算封禅泰山，作为“天子”，其施政的目标即是“海内混一”，汉之天下再也没有闽越国的位置了。汉武帝遂下令将闽越居民集体迁移至江淮一带安置，并于福州设立冶县，福建开始被纳入华夏版图。

2015年，为了配合福州地铁的建设，福建省的考古工作者们在鼓屏一冶山路一带展开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包括瓦当、台基等大量西汉宫殿建筑遗存，并发现屏山宫殿遗址的台基和地面都有被人为大肆毁坏的痕迹。

无独有偶，福州北部的新店古城遗址、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也都在西汉时期被严重毁坏。显然，汉武帝为了根绝闽越王国，将这些历代闽越王修造的宫殿都付之一炬了，与建筑一同烧去的还有当时福建的社会基础。司马迁说，经余善一役，“闽地遂虚”，除了被强制迁移走的人



屏山遗址出土“长乐万岁”和卷云弓箭纹瓦当（图片来源于《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西汉遗存发掘简报》，原载于《福建文博》2015年第三期）

口之外，闽中百姓遁逃山海之间，终两汉之世，再无文献提及福建。

灭亡闽越的次年（前110），汉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在泰山上，他谦卑地说自己是以渺小的身躯继承至尊的事业。其实促成这至尊事业的正是渺小的东越王余善。在灭亡闽越之后，汉武帝对长江以南的版图拓展基本结束。福州的鼓屏路见证了汉武帝一统天下的野心，这个平常路口地下竟埋藏着一个小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和一个帝国“大一统”的功业。

# 水塘上的二落厝

张 茜

二落厝在树兜，立于水塘之上，300年了，宛若一朵瑰丽奇葩，耀眼榕城。

二落厝，人们也叫它程厝里、程府大院。

程家后人程先生对我讲：这宅子是二进，我们不叫一进二进，只叫它二落厝，是我的家，出生成长都在这里。



树兜村落图 程惠坚绘制

树兜现在是地名，前身为树兜村。倒回一个世纪，“树兜程氏，约三四十户，业弄。”《闽县侯官县乡土志》这样记载，表明程家人开辟了树兜，事实也是如此。

400年前，这户程姓人家来到福州盆地，落脚于城郊井关外的一片湿地。湿地野草萋萋，看似荒凉，地下却蕴含着温泉，竹竿子一插，即涌出滚烫的热汤。湿地旁的井关也人来人往，是进出福州东北边的关门。这位颇有头脑的程氏先祖，在荒草水泽间，寻一沙洲，盖起几间茅屋，带领家人开塘挖渠，聚水引水，种植水稻，养殖鱼虾，栽种果木。龙眼、黄皮果、柚子、榆树，围着河道，围着田园，蓊郁芬芳，人称树兜——周围都是树的地方，或树木兜着的地方。

井关外因了这片葳蕤而形成街市，卖蔬菜、药材、竹器，钉鞋、补衣，小吃店、杂货铺、理



程府大院俯视图



程府大院内的雕花牡丹



程府大院厅堂

发馆、小客栈、温泉汤池……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走过 70 多年，到了清康熙年代，也不知是哪一天，族谱没有记载，家长程尔善沿着树兜河走向，在三个相距数百米的 S 形转弯处，开挖水塘，在塘上建造三座坐北朝南、分别占地数亩的大厝，给三个儿子。也不知如此浩大的建筑群，在那样的年代施工了多久，族谱也无记载。如今只留下二落厝，隐没在繁华的高楼大厦丛林间，让后人，特别是我前面提到的程家三十世程先生，研究不已。他退休后的十多年，致力于了解

树兜村史，也就是自己的家族史，意在振兴乡村文化，让代代子孙不忘根源，爱村、爱族。

那个倒春寒的下午，程先生带着撰写的《树兜村历史杂谈》初稿，和我见面于正在修缮的二落厝。二落厝体量庞大，犹如巨型瑞兽，围着它的一幢幢楼房，一如子子孙孙，百世同堂。它发出老祖母般的神秘气息，正安静地接受着维修——被光阴染成墨色的雕花牡丹，夹在新鲜木块间，盛开得那样丰硕、温婉；云朵柔美，握在木匠手里，似乎要飘飘然游走……

二落厝，除了荣膺榕城最大单体古建筑外，

还有四个与众不同，一是建在水塘之上，二是立体建筑，三是用料之大实属福州罕见，四是宅子有着十个大门，前后各一，左右各四，十门相围，浩荡气派。

宅内天井、游廊，铺着厚重奇长的毛面灰石板，48间房屋和两个厅堂都相隔一层两寸厚木板，凌空水面1.5米之上，既不潮湿，又可自然调节室内温度，冬暖夏凉。地板下的水塘里养着胡子鱼，此鱼喜黑暗，昼伏夜出，是消灭蚊卵的好手。数百年下来，这大厝里不曾出现蚊子。程家人居住湿地70多年，化劣势为优势，摸索出如此生存之道。

夏夜里，吃过晚饭，各家孩子都搬出自己的竹板床、竹躺椅，放在大厅固定的位置，铺上草席。躺着、坐着，讲故事、唱儿歌，数星星。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巡游在孩子们之间。孩子们也调皮，悄无声息地伸手抢夺萤火虫，捉到了，放在拢住五指的手心里，胆大的萤火虫依然亮亮地发着光。玩儿累了，在凉风里正要睡着，却听见身子下的水里，胡子鱼扑棱棱的，在忙乎。胡子鱼是宅子的风水，大人们一代代交代。男孩子们闲来无事，掀起地上木板，垂下线钩，钓上鱼来，又放下去。即便在物质最匮乏的年代，也从来不曾想到要吃鱼。大人们说，吃了这鱼会肚子疼。手中缺乏零花钱时，长辈随便一句：到水塘里去找。胆大的孩子，就真下到水塘里。水深一米三四，清澈洁净，彪悍飙速的胡子鱼，在腿上撞来撞去，滑溜溜凉冰冰。憋口气，蹲下身子找

铜钱，摸摸塘底的石头柱础，摸摸浸得湿透的鼎力柱，犹如潜在大洋底。铜钱果真捡到不少，拿到收购站换了零钱。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趣事。木地板板块之间有点缝隙，祖宗掉下去的铜钱，代表着家族曾经的富有，连孩子们都懂得，领悟到要勤奋创业、谨慎守业。

我暗自思忖，这屋子下的水位该怎样控制？二落厝会告诉您，它一进二进呈立体状，二进高于一进两层台阶，也就是高了40多厘米。下雨时，屋下水位达到一进地面高度，就自然外流，流进排水沟，流出宅子，汇入门前的树兜河。

宅子立体建造，除了便于排出屋下水，还能引进阳光，照在二进阔深的厅堂里。两进厅堂，可摆酒席三四十桌。冬日里，老人孩子在厅堂里闲坐玩耍，多半厅的阳光，亮灿灿、暖烘烘。

宅子立体建造，也解决了平面大厝通风不良的问题。

擎天柱、通财石，是二落厝人至今津津乐道的话题和骄傲。擎天柱是房屋的柱子，二进高近9米，九九归一。游廊柱子是少见的方形，通直硕大，我一人搂不住。柱础也奇巧，宛若旧时旗人女子的鞋跟，小底细腰大方头，鲜明的清代符号，引人遐想。这方柱础、方柱子，审美、实用兼具，防长虫——蛇。湿地、田园，蛇虫自然较多，方柱础、方柱子，四棱突兀，阻挡蛇虫缠绕向上。当然，屋内的柱子是圆的。

通财石，说的是游廊上的铺地石，厚度40厘米，长达6米。这在福州乃至整个闽地古建筑

里，都不曾有。

不禁惊讶，二落厝的一块块巨大铺地石，一根根粗长的擎天柱，怎样而来？从闽北山区运来，仰仗树兜河。树兜河连接闽江。直至20世纪60年代，人们还在树兜河畔挖出数量不少的大石条、大圆木，由此可见早年程家之阔绰。

有文字显示，程尔善曾是福州四大土财之一。土财，言下之意就是土财主，以农为业，种田人。然而，在大兴土木之前，程家只是个家境殷实的农户。

关于程家突然暴富，后人口口相传至今，深信不疑——捡到了大量金子。

程先生就先祖捡拾金子发家之事，做过广泛调查。最后定论：属实，而并非传说。

2017年8月8日上午，在得贵路口大樟树下同寿园里，一位95岁、健康状况极好的琴亭村老人，亲口对程先生讲述了他家先祖拾金子的事。琴亭村紧邻树兜村，两村自古以来往密切，事事甚晓。

话说程尔善勤劳顾家、聪明谨慎、为人极为和善。祖宗开创井门外湿地70余载，传到他手上，田地鱼塘树木，有些积累，但他还是清晨下田，日落出田，路上手中不离粪筐。一日大清早，程尔善像往常一样，赶在别人出门前，上路拾粪去田里。到了田头积粪池，他掀开一块盖板，准备倾倒粪筐，突然发现粪坑一夜之间满了上来。昨晚并没下雨，粪坑如何满涨起来？事出蹊跷，程尔善手持拾粪夹子，往粪坑里试探，触

到了硬邦邦的东西，他努力夹起，黄澄澄、沉甸甸，定睛细瞧，是金子！他不能判断粪池里有多少金子。这粪池有四个八仙桌大呀。他环顾四周，空无一人，便迅速盖好粪池盖板，依旧下田劳作。这块田地，与树兜河隔着一条石板路。一天时光像流水一样走过，不见谁来寻物。

晚上回到家，程尔善召集老婆及三个儿子，找出家里所有箩筐、扁担，拿出粪桶尿勺，备好独轮车，半夜出门去粪坑挖东西。这种情况，自然不敢提灯，全家黑咕隆咚在粪坑里打捞。似乎是金币金锭和金条，装满多半个粪坑。一家人手脚神速，捞的捞，挑的挑，运的运，天亮前捡拾完毕。满屋子的金子哟！关起门来，清洗干净。

事后很长一段时间，程尔善及三个儿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听这些财宝的来历。后来得知，是一支谋反队伍，遭官府追剿，拉着军饷沿树兜河逃跑，跑到程家田头粪坑边时，弃掉军饷，轻装逃逸。那年头，官府不力，兵荒马乱，程尔善家人丁兴旺，就此发达。盖三座大厝，置千亩良田，规模扩至北峰。今天的程氏后人还说着：凡是鸡叫能听到的地方，都是我家农田。

三座大厝，二落厝尤为精美，为程尔善最偏爱的三儿子居住。三儿子也出息，多年寒窗苦读，使大厅升起了“文魁”镏金匾额。

300年斗转星移，二落厝如暮年老人，养育了一代代儿女，擎起了一座华宇——树兜村。

二落厝正在修缮，一榫一卯，一锤一锯，一笔一画，吟诵着史诗，延伸着文脉。



关于近代中国地矿的诸多论著，每每提及船政留欧群体中的首批本土矿冶工程师，称其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矿冶人才，为中国近代地矿事业的诞生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风从山谷吹过

——记池贞铨和他的同伴们

涧 水

## 1. 从船政学堂到巴黎矿业学院

清同治六年（1867），少年池贞铨从福州城门下董村迈进船政学堂时，肯定没有想到，他与几位同窗日后竟在中国近代矿业史上留下不可或缺的笔墨，成为承前启后的奠基人与先驱者。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20世纪60年代，电影《年青的一代》主题曲《勘探队员之歌》风靡一时，那些跋涉于崇山峻岭“为祖国寻找宝藏”的探矿者们，激发起国人深切的崇敬与向往。或者因为始终牵萦的这缕情结，使得我在瞄见池贞铨们的名录时，便难以挪移视线。

《勘探队员之歌》眼下是中国地质大学校歌，但在龙旗飘飘的同治年间，放眼神州，地矿



池贞铨

院校尚渺无踪影，船政学堂的驾驶与制造与矿业似乎也并不相干。光绪三年（1877）选送船政优秀毕业生前往欧洲留学之际，李鸿章与沈葆楨联合上呈《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所附清单特别指称：“制造驾驶两项学生之内，或此外另有学生愿学矿务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者，由监督会商挑选。”那是因为形势紧迫，近代化潮流席卷而来之

际，各式军事与民用工业相继开办，对煤、铁、铅等矿物的需求喷涌而出，手挖锄掘的传统方式显得捉襟见肘，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要活动之一。找矿开矿离不开矿师，先是聘用外籍工程师，但价高且良莠不齐，更难免受制于人，培养本土矿务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船政承载着满满的期望启航，抵达欧罗巴之初便有罗臻禄率先入读汕答佃矿务学堂，之后池贞铨、林庆昇、张金生、林日章等学子也迈进专攻矿务的行列，与罗臻禄一道转入巴黎矿务学堂（即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中国首次派遣的庞大赴欧留学团中，船政前学堂出身习法文、学制造者总共 15 人，迈进矿务学堂的便占三分之一，这比例不可谓不高。作为制造一届优秀生，几位学子毕业后均已留船政任职，此时的专业变更自是国之所需。

说起来清政府倒也倾力尽心，为留学团所选择的去处均属一流。池贞铨等 4 人原本研习于科鲁苏民厂，那可是当年排名欧洲第二、法国第一的大型钢铁厂，日后赴法勤工俭学的革命家邓小平等人也曾在此留下足迹。历史比汕答佃矿务学堂更悠久的巴黎矿务学堂，则由国王路易十六创办于 1783 年，至今仍是法国顶尖的精英工程师学府。

当年，采矿业还属于高科技工业，法国国王亲自创办的学府旨在培养“矿业人才的领袖”，连巴黎矿石博物馆也设置其间。光绪四年（1878）六月，几位东方宾客现身位于市中心第六区、与

卢森堡公园毗邻的旺多姆公馆，在巴黎地图局副总办并矿院总监督多布里、矿院总办杜邦的陪同下参观学堂。一行人的主角乃大清帝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随从包括罗臻禄，此行即为学子的转学前考察。处处惊艳，郭公使当晚便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所见所闻：门口堆砌而成的七尺高塔，铅块来自大洋洲；室内四壁绘有各国名山大川，承尘之上矿学家图像十余人；窗户嵌着翠玉片，有整玉片高二尺许者；陈设厅所藏五金矿产种类多达 25 万，“环地球所有矿产皆备”，包括化石、陨石……

数月之后，光绪四年（1878）冬至次日，5 位入读矿院的学子登门拜会，向郭公使汇报入读情况时已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他们不仅学习矿山开采技术，与之相关的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亦纳入课程。《留欧艺童课程表》《汕答佃矿务学堂课程表》所列内容琳琅满目：重学统论、材料配力之学、化学、铁路学、代数、积微学、格物学、矿学辨识、矿学开采、煎炼五金学、测量、画学、地学、营造、地图摹本、轮机制造法等。“期满大考，成绩以林庆昇、池贞铨为最优”。学子们且多往各地游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比如矿山荟萃、以开采之精称雄欧洲的德国哈次，也迎来东方帝国的留学生，“各该生与洋员研求淘洗、镕铁，均能得其要领……”光绪六年（1880），船政大臣黎兆棠为留学归来的学子们上奏请奖，5 位矿务学生的详细情况自在其中，称“各给堪胜矿务总监工官凭”。

潮起潮落，人事更迭，船政留学生的故事在欧洲久久流传。光绪十六年（1890），继郭嵩焘、曾纪泽等官员之后，又一位大使薛福成走马上任，抵欧之初的见闻使他深感“近年出洋学生，试于书院，常列高等，彼亦知华人之才力不后西人也”。新大使善于调研，时时“查旧卷”，留学洋监督斯恭赛格在光绪十二年（1886）向曾纪泽提交的一份报告，被他尽录于日记之中。报告详细介绍了船政留学生情况，言“池贞铨、罗臻禄、可派查看地势、制造木炭并设厂炼铁。林庆昇、张金生可派管理铁厂，并添设钢厂。林日章可派管铁厂之化学学堂”。

那一年，学成归国的池贞铨和同伴们，早已行遍九州，大展拳脚……

## 2. 从左宗棠的一份奏折说起

光绪七年（1881），28岁的“海归”青年池贞铨，踏上了在福州周边勘探煤铁矿之路，相伴而行者还有林庆昇、林日章、游学诗等一拨船政同人。他们终日跋涉于山峦野外，并最终在闽侯、闽清、永泰三县交界处，寻觅到穆源铁矿。

探寻池贞铨们的往事时，“穆源”的身影屡屡出现。比如左宗棠那份成为新一轮海防之议先声的奏折。

清光绪十年（1884）年底，钦差大臣左宗棠抵达福建督办军务，此时距他离开船政已近20年。马江海战之后，对于船政乃至洋务运动的考

察与修正亟须进行，清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二十五日，他会同穆图善、杨昌濬向朝廷呈上《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窃维海防以船炮为先，船炮以自制为便，此一定不易之理也。”开宗明义之后的“自行开矿冶炼”等诸多建议，皆“因于船政局旧班出洋学生内询考制炮大略”。左大臣查问得仔细，学子们应答得详尽，诸如欧洲法华士、克虏伯等4家军工厂，哪家用的是精钢或者熟钢、铸铁，以及性价比等。学子们且进一步提出“制炮之铁与常用铁器炼法不同，必须另开大矿，添机冶炼，始免向外洋购铁”。何处另开？其中便有穆源铁矿，“矿苜甚旺”，“若用以制炮，取之甚便”。

左钦差递交奏折之后，李鸿章亦上《仿造西法创设武备学堂折》，朝廷随即发出“海防筹议”上谕，并将两折一并抄录转发，督抚们纷纷遵旨具奏，各抒己见。这是继同光之交“海防筹议”后的又一次大“筹议”。船政学子们的见识已然勾连国之大策，或者他们的名字，也开始渐渐传播？

上达天听的奏折中，“穆源”和“出洋学生”的字眼不仅于此。官至邮传部尚书兼政务大臣的陈璧，曾多次建言朝廷整顿和发展船政事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他在奏折中称：“查穆源铁矿，近在省治百里，小轮船一日可达。前督办臣黎兆棠派员履勘，提炼铁苗，皆称质冠东南。”他特别提到，煤铁矿办后可以接办铅矿，“查罗源县东面滨海，有西洋岛，向产铅苗极旺，前

经出洋学生勘验得实。此矿开成，不特铅弹可以自制，无须购自外洋；而福州装茶铅箱，岁需银一百数十万两，并可取之内地……”

倒是第一次知晓，那年代运往世界各地的茶叶，竟是以铅箱密封，如此可令茶香不外泄。铅弹、铅箱，矿业之需不仅军工，而且民用。制作装茶铅箱所耗的巨大银两，也证明了其时福州作为世界茶港，何等繁荣兴盛。

“出洋学生”勘得的西洋岛铅矿有否开采不知道，但因政府与商人对出资的顾虑，机器开采穆源铁矿的开发计划终至流产。矿洞渐渐隐匿于岁月风尘，我几经打听，不明下落。百度搜得“全国地质资料馆”发布的一份1915年财政厅《福建省矿产分类图标》摘要，倒是瞧见“铁矿闽侯县西关外穆源鸿尾乡蛇仑山”的字样，指向即为“穆源铁矿”？可惜线上不得查看全文。

对于一个没有建成的铁矿如此上心，因为在我心目中，那似乎是留欧矿务学子们初露拳脚的象征。日后他们将大显身手，足迹遍布海峡两岸，厦门、邵武、石竹山……当然包括宝岛台湾。

提起台湾基隆煤矿——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煤矿，几位学子与其渊源早在赴欧之前。船政用煤起初来自国外，但洋煤太贵且逢世界煤荒发生，距马尾仅130多海里的基隆成为开采首选，那里明代民间便以土法挖掘优质烟煤。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同意沈葆楨等人的建议，批准在老寮坑一带创建基隆煤矿。光绪二年（1876）夏成立矿务局（后改为煤务局），池贞铨、林日



基隆清代官矿通风井遗址

章、林庆昇等人即赴台参与筹建。只不过选派首届赴欧留学生时，几位学子均入选；他们远赴异邦的次年，基隆煤矿正式建成投产。及至光绪七年（1881），学成回国的林日章、林庆昇、张金生等人再次登岛，踏遍山山水水勘探煤铁矿资源，完成了台湾的第一次矿源普查。

也在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上奏掀起海防之议的同一年，主持台煤的台湾道台刘璈“禀请裁撤”“外国煤师”，“另派煤务学生张金生为煤师”。不显山不显水的撤换之间，角色转换在悄然形成，本土人才渐渐站上舞台中央。

### 3. 土古堆村的春天

2020年4月，《鲁中晨报》的几位记者前往

山东淄川区寨里镇土古堆村采风。乡村振兴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的视线，这座建于明朝的古村便有不少看头，诸如炮楼遗址、清代牌匾、淄川铅矿等。春风轻拂田野，村子西北方向的麦地里，青色的麦苗已经出穗；草木掩映间赫然两个岩洞，那正是清代矿洞遗址，不少村民家中且收藏着晶亮的铅矿石。记者们撰文介绍道：“第一批留学生中，学成归来任五品守备的矿师池贞铨，在山东发现了登州铅矿、平度金矿和淄川铅矿，在山东巡抚张曜领导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在土古堆村进行开采，矿石冶炼后专供北洋水师舰队专用。”

池贞铨是在光绪八年（1882）夏季，从闽地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枪弹生产急需铅矿，因李鸿章丁忧离任而署理北洋大臣的张树声，饬令日后被称为“中国商父”的盛宣怀，带领池贞铨等人赴山东勘探寻觅。从7月中旬至8月底，一行人顶着酷暑转悠了40多天，勘得多处矿藏；随之将宁海、栖霞的矿石送天津制造局化验，招远的



淄川矿洞遗址

铜铅矿苗寄往外洋化验。盛宣怀回上海后，即将勘探情况与《试办山东滨海各铅矿章程》一并向上禀报，李鸿章批示加紧办理开采。当时的《申报》，也曾刊登文章介绍此番寻矿的前前后后。

与山东铅矿相逢相交的船政人员不仅有池贞铨，他的留学同窗林日章也曾任登州铅矿开采监工——早在光绪六年（1880）回国伊始，林日章便已参与勘探著名的开滦煤矿。那些年头，开矿找矿甚是热门，各省竞相向船政调员，船政矿业人才极为“抢手”，他们的名字常常紧随赫赫有名的洋务派大臣，更频频关联那些名闻遐迩的地矿企业。罗臻禄曾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聘为广东矿务委员，参加过粤晋陕豫等省矿产调查，此后还曾任山东省矿务督办，前往俄罗斯等地勘矿。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创办汉阳铁厂，那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最大钢铁企业。他“陆续访求外省通晓矿学之委员学生，资调应用”，其中即有张金生、池贞铨、游学诗等人。张金生、池贞铨到湖南邵阳、新华勘探煤矿；池贞铨在马鞍山“勘明煤层厚薄，煤度深浅，择定一处开挖煤井”；张金生至兴国大冶之百泉湾勘探铝矿；池贞铨到湖北省兴山千家平勘探铜矿……几年间“闽厂学生分赴衡州、宝庆、辰州、永州等府，暨毗连粤境之四川夔州、陕西之兴安、汉中等府，毗连湘境之江西萍乡、贵州青溪等县查勘煤铁，并委赴素产煤铁之山西省泽、路、平、孟等处采取煤铁各式样，以资比较考证”。如此广泛的矿源普查和勘探活动，在中国地质勘探史上实属第一！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三楼陈列的池贞铨遗物

不仅仅是找矿开矿，多才多能的他们建树广泛。冶炼必须耐火砖砌炉，其时国内尚无法自行烧制，池贞铨以连江白石粉烧制成功远胜洋货的耐火砖。林日章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法炼银的主持人，提出“开采、淘洗、锻炼、提银”四点计划。也不仅仅这几位矿务留学生，同年底赴欧研习矿冶的艺徒也取得良好成绩，“王桂芳、任照、吴学铿，可派入拉铁厂充当查工，或在机器局襄助，三人以王桂芳为领袖。”还有时不时可见名字的游学诗，基隆煤矿、穆源铁矿、大冶铁矿，处处见踪迹，他差一点还去了“宁古塔”——吉林拟调其“督办宁古塔等处”矿务事宜，后因调整基隆煤矿需要人（一说眼疾），未成行。

池贞铨逝于1915年，原本安葬在仓山。后因城建迁坟。2017年1月10日，他的12名后裔来到马尾，将先祖的骨灰缓缓撒入江中，回到他学习、成长并走向世界的出发地；他留学时带回的轮船“太平洋之星”纪念盘，以及用过的《辞海》、印章、香炉、洗笔池等，眼下被收藏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罗臻禄逝于1904年，当年他与七弟罗丰禄一道赴欧洲留学，罗家在福州属

名门，外交人才辈出。林庆昇、林日章、张金生“后事不详”。船政熠熠闪光的名册中，这些矿务人才似乎并不那么引世人瞩目，我有限的搜寻也没有找到太多详细记录。但在奏章、信件、日记、方志、村史中，又时常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宛若潜藏在大地的矿脉，不起眼却闪耀着若隐若现的晶莹。

公元1967年初，几位“步行串联”的女生从福州抵达江西瑞金，在909地质队一住多日，那是我此生距离勘探队员最近的时刻。即便是轰轰烈烈的年代，生产仍需进行，他们每天从简易的排屋出发，早出晚归。有一天也跟随着进山巡查，静静的山林间时不时扬起女孩们福州方言的说笑声。同行的两个江西籍队员，直夸福州话好听，好听得像小鸟在唱歌。那时候几个远道而来的女孩并不知道，遥远的清代光绪年间，有位名叫池贞铨的老乡也曾在赣南留下闽都腔调，他与沈瑜庆——船政大臣沈葆楨之子，创办了资本达20.8万元的赣州铜矿。

风从山谷吹过，早已吹走了遥远的乡音，却在岩层留下百态千姿……

# 沧桑世变话涛园

郑珊珊

福州古称“三山”，以城内有乌山、屏山、于山而得名。其中乌山最高，虽然海拔仅86米，但风景奇秀，人文气息浓厚。宋淳熙十年（1183），朱熹与郡守赵汝愚同登乌山并刻石以纪。后朱熹于山麓石室中讲学，并手书“石室清隐”镌于池畔（今不存）。自此以后，历代不少文人都偏爱在此结庐筑园，数百年来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乌山南麓的涛园承载了晚明邓氏、明清许氏、晚清沈氏三大文化世家的历史记忆，又几经沧桑世变，成为明清福州文化世家和园林文化的一个见证者。

## 一、石林与邓氏家族

涛园初名“石林”，大部分的文献记载都将其主人追溯到明末的许豸。细究史料，发现石林实为邓庆棠所初建。邓庆棠字道协，一作道叶，闽县竹屿人，明天启间国子生，曾任长芦都转运盐使（驻天津）。他还是“三山耆社”成员，著有《还山草》《荷薪集》《尘韵》《荔枝通谱》等。其《荷薪集》卷首有《石林》诗云：“曰余秉微尚，夙昔在丘樊。买山当乌石，僻地邻祗园。

编茅结垣宇，铲土成洞门。石多若林立，篆刻纪宋元。”可证，邓庆棠确是石林的创建者，“石多若林立”则当是石林得名之因。晚明诗人徐燏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写有两首七律：《题邓道协道山新园有清冷台霹雳岩古迹宋人题刻甚多》和《重过邓道协石林同观土中新开咸淳题刻》，可知山新园中有清冷台和霹雳岩（此两处景点至今犹存），那无疑就是石林。

邓氏家族自唐末起即世居福州城东竹屿村，历代名人辈出，簪缨不绝，有“书香传竹里，鼎族甲榕城”之誉。明洪武年间出现著名学者邓定，字子静，著有《耕隐集》。其七世孙邓迁（1504-1575）字世乔，号文岩，嘉靖七年（1528）举人，官嘉兴通判时筑城防倭，立有战功，工诗能文。四子邓原岳（1555-1604）字汝高，号翠屏，别号西楼居士，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为晚明闽中诗派巨擘，诗歌成就很高，著有《西楼全集》《闽诗正声》等。至今在竹屿村仍有一座木牌坊“父子贤良”，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是为表彰邓迁、邓原岳父子为官清廉而立。

邓原岳在仕途和文学上的得意，大大助益了



清冷台

邓氏家族的兴盛。其两个儿子“庆宣，郡廩生，娶杨国子生道华女。次庆棠，郡廩生，娶翰林院翁修撰正春女”。翁正春（1553-1626）字兆震，侯官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后因疏劾魏忠贤 24 条大罪被反劾，遂辞官归里，终老家中。崇祯初谥“文简”。邓氏与翁氏的联姻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邓庆棠生平可考的不多，可推想修筑石林时，邓氏家族正值人文鼎盛之时。后来，邓庆棠侨居南京，而将石林出售给了许豸。

## 二、涛园与许氏家族

到了崇祯年间，石林的主人换成了许豸，此后约 200 年，石林（涛园）都在许氏家族中代代相传。许豸，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权位于福州市郊竹屿村的邓氏家族木牌坊浒墅关）、宁绍道提学副使、浙江学政，



霹雳岩

颇有政绩。许豸有一定诗名，亦善书画。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有《许玉斧草书轴绢本》条云：“福州以许姓为文献世家，本朝瓯香、月溪、铁堂、雪村诸诗人皆衍其门风，累世擅三绝之誉，闺房亦工诗画，至于今未艾，风流文采，蔚于海滨，实以玉斧为开山手。”石林距许豸所居的光禄坊许厝里仅里许，许豸少时曾读书于此，喜爱其地幽胜，为官之后，以官俸买下，作为别墅。在清冷台、霹雳岩等旧名胜基础上，又新建了“半月池”“奇逸庵”等。许豸曾书“松岭”二字行书刻石，并草书诗一首：“荒畦随意构，爽垲顿开颜。缺径凭花补，回窗倩竹关。烟容凝石浅，山色到门闲。徙倚危阑畔，潮来浦几湾。”遗憾的是，许豸不久死于杭州任上，未及在园中居住。

许豸逝世后，其长子许友继承了石林。许友见松岭上长松峙立，清风吹过，松涛阵阵，遂将“石林”更名为“涛园”。他增建亭台，疏通泉



水，雕琢奇石，又作《石林自记》以纪念。改入门处的“奇逸庵”为“匏庵”，造登山“月廊”。

“松岭”旁修一“梵闻亭”，与隔壁的神光寺呼应。沿岭而上，有一大石，石上有一“阊阁”，阁旁即清冷台，有老榕一株，浓荫蔽日，清凉避暑。过半山桥可到园中最高处霹雳岩，岩下是幽静的“鸟迹轩”，再往下又一高阁“瞻云”，用以祠祀先人许将。阁右为天门，有两块天然的石头屹立相向，中间仅留一狭窄的容人侧身而过的缝隙。过天门后，则是一片空旷，直到山脚，又有古松数十株，依树搭“松棚”，可俯瞰江景。

石乃许友自镌“吞江汲云”，再过去则是索笑亭，亭旁植梅数百株，又有半月池泠泠清响，与隔岭松涛相和。当时涛园的景观颇具规模，有“当明末年，园之胜甲一郡”的美誉。许友常在此读书，也时邀友人前来社集、凭眺、饮酒、赋诗。清顺治五年（1648），他与时任福建按察使的周亮工订交，频繁往来，谈诗论画，情谊甚笃。

周亮工曾为涛园题撰楹联：“文献世家遗硕士，江山故国有涛园。”然而，明清世变的战火殃及涛园。清初的连年纷乱，使乌山一度成为驻军所在，树木被砍伐，房屋被拆毁。许多次子许宾其时虽官至御史，对此也无可奈何。许友曾作《秋日登凌霄台有感》云：“忽遭兵火蹂躏余，斩藤伐树青苍秃。颓残垣瓦三四家，间或更闻山下哭。”顺治十五年（1658），周亮工遭劾被逮入京，许友受株连亦被押入京。两年后许友返乡，家道已衰落。他给周亮工的信中道尽辛酸：“抵

家但余满面风尘。故乡城郭，已非向之翼然纒纒者。今则叠叠凌齿，兼以飓风之后，坊观庐舍，颓委殆尽。家人面如尘土，恸哭伤心，告诉债主凌辱、伍伯索饷，真如刀锯刻刻受也。近来朋友亲戚已绝往来，酒茗聚谈，竟若瑶池王母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前后左右已分数姓。友所自居者，仅此屋十之一，主人反为客矣。每常见炊烟相乱，鸡犬声闻，一屋竟成一村，嗟乎亦异哉！”这般萧条境况下，涛园更是无人经营。其孙许鼎后来在《石林倡和诗》自序中写道：“慨兵燹后为居民侵蚀三十余年，过之者不禁有沧海桑田之感。”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逐渐巩固，社会重现太平气象，许氏家业也有所恢复。康熙三十年（1691），许友长子许遇携两个儿子许鼎和许鼐开始重建涛园。许遇（1650-1719）字不弃，一字真意，号花农，又号月溪，顺治间岁贡生。“少倜傥，喜交游，户外之屦常满。”历任陈留、陈州、长洲知县，有惠政。许遇少学诗于王士禛，尤擅七绝，亦工画松竹梅石，著有《紫藤花庵诗钞》《养根集》等。许鼎字伯调，号梅崖，许遇长子，雍正元年（1723）与子良臣同举于乡，历任浙江上虞、遂昌知县，为政不苟。著有《少少集》《刺桐城纪游》。许鼐，生平不详。另外，许遇的第四子许均也在涛园留下了大量吟咏。许均字叔调，号雪村，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官至吏部郎中。雍正七年（1729），以荐出清查扬州亏空钱粮，不苛不纵，次年卒于任上。许均工

诗善书画，著有《玉琴书屋诗钞》《雪村集》。又编辑许氏家集《笃叙堂诗集》，收录许氏自许豸起五代七人的八部诗集。经过一番精心修复，涛园虽不能重现旧观，但也颇具规模。许遇于园中建许氏宗祠、匏庵、真意斋，许鼎修建瞻云堂、竹路、鸟巢、石床、独树坡、灵岩、流霞坞、天门、天光云影亭、梅坪、半泉（即半月池）、松冈（即松岭）、鹤涧、落珠岩诸胜，改匏庵为梦鹤寮。

巧石、清泉、岩洞、高阜，加上依山势而建的亭台廊榭，虽是人为，却似天然。许遇于《石林》诗中颇为欣慰地写道：“数椽聊遂先人志，万壑真留隐者心。”随着园林胜景的恢复，雅集、吟咏等渐渐展开，而涛园的盛名亦流布全国。不但林佶、黄任等当地著名文人在此流连，省外的许多名士也慕名前来游览。著名文人、学者潘耒（1646-1708）来闽参观涛园后，写下《涛园记》，赞道：“善为园者，莫许氏若也。”1698年，清初思想家王源游闽时，也应许遇之邀作《涛园记》。

1704年，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禛为许遇作诗《题许不弃画竹之陈留》：“石林手种竹万个，兴来自写千笈笥。”许豸六世孙许作屏，延请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张问陶（1764-1814）为涛园作画。涛园在许氏的精心经营下繁荣了百余年，被诸多文人雅士流连吟咏，留下了不少诗画风流的韵事。

嘉庆二十四年（1819），许作屏病逝之后，辉煌了200年的许氏家族渐渐衰落，而涛园也随之隐没。同治十二年（1873）左右，郭柏苍撰写

《乌石山志》和《竹间十日话》时提及，涛园及与之相邻的其他名人宅第、亭园，如阮弥之祠、韩锡榕庵、谢道承一枝山房等都荒废了，被人占为斋堂，辟为果园，并互相转卖。许多石刻没入土中，不能洗涤发掘，甚为遗憾。

### 三、涛园与沈氏家族

光绪六年（1880），沈瑜庆以240万钱的价格购得涛园，为其父沈葆楨修建专祠，即“沈文肃公祠”。沈瑜庆（1858-1918）字志雨，号爱苍，别号涛园，系林则徐外孙，沈葆楨第四子，林旭岳父，沈葆楨卒后恩赏为候补主事。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后官至贵州巡抚。清亡后以遗老自居。沈氏家族中多有晚清近代的重要人物，他们对涛园的经营让其重现风雅。沈瑜庆是同光体闽派的重要诗人，时常召诗友们在园中社集赋诗，涛园又一次在文学史上留下诸多风流影迹。1913年，林纾于北京为沈瑜庆画涛园并作《涛园记》。文中写道：“涛园旧名石林，为许有介先生别业也。先生明之遗老，隐居弗仕。”文中还将沈瑜庆与许友相比，遗憾沈瑜庆“久宦于外”，不能如许友一般常享涛园胜景，“祝其能归也”。沈瑜庆更以“涛园”为号，将自己的诗文集命名为《涛园集》。

沈氏后代亦有居涛园者，如沈永清。沈复（生卒年未详）谱名永清，字复轩，号墨藻，沈葆楨孙，沈玮庆的季子。著名诗人何振岱叙其生

平道：“官扬州盐大使，罢归居祖祠中，即许氏涛园旧址也。归数年又出游，卒于京师。有《养碧斋诗集》一卷。”

至今乌山上仍矗立着一方巨石，上面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旧涛园”。这三字乃晚清著名书法家郑虞臣手书。郑世恭字虞臣，咸丰间进士，是近代著名政治人物、诗人、书法家郑孝胥的叔祖。郑孝胥自幼从叔祖学习，书法和诗文都深受其影响。沈氏与郑氏都是晚清声名显赫的福州籍文化世家，交往颇多。除郑虞臣为沈氏涛园题字外，郑孝胥的母舅林葵曾为沈葆楨掌书记，郑孝胥后来还为沈瑜庆书写了墓志铭。

#### 四、余论

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衍携家眷由武昌回榕，曾借居涛园。1920年冬至，何振岱携长女何曦和弟子们游涛园。此后，涛园再次湮没在世



“旧涛园”石刻

变的风云中。

从上文的梳理可见，涛园是随着几个文化世家的兴衰而兴衰的，通过对涛园的文化记忆可看出明清时期福州园林文化的繁盛。乌山并不大，游览面积约25公顷，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清代乌山上的私家园林就有12座左右。园主一般是福州文化世家出身，大都将园林修得富有情调，不时召集诸多文人墨客雅集其中，使得园林成为文化胜地。对于文化世家而言，园林不仅仅是休憩和娱乐的所在，还是从事文学书写、文化社集的重要场所，具有文学艺术创作现场的意义。他们在园林中莳花弄草、读书作画、行吟坐咏、寻禅问道、宴饮酬唱……避居于园林中，宦海浮沉、世变沧桑、市井喧嚣都被隔绝在墙外，他们可以自在地栖居，享受诗意的生活。他们还热衷于用诗文画作来表达对园林的喜爱以及家族的自豪感。这样的园林生活为家族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也进一步提高了家族的文化声望。这样的园林文化成了明清福州文化世家的传统，代代相传，直至家族没落。

如今，涛园又改回“石林”的名字，一部分开放为公园，吸引大量游人前来赏玩。位于福州市政府大院内的沈葆楨祠堂仍保存完好。明清时期涛园的花木与亭台楼阁，大都随着历史尘烟而消失。与涛园有关的文化记忆，只在故纸堆中隐秘地存在着。“旧涛园”石刻和少数隐秘的许氏诸人题刻则仍存在于乌山之上，隐喻地传达着一些世变沧桑的讯息。

# 漫长的告别

——纪念罗孝建先生

于 丹

一个月来，我孜孜不倦地在寻找一个人。

屏幕上光点的每一次闪动带来的信息渐渐串联起来，越来越引发我的兴趣。终于，在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接力之后，一本自传穿越时空，从天而降，来到了我的电子邮箱。作者为美食家罗孝建先生（1913-1995），晚清著名外交家翻译家罗丰禄的嫡孙。

罗老先生曾于1986年4月回到家乡福州探访美食。但是，读完他的自传，却发现他的光芒不止在美食。他的人生犹如书名“生命的盛宴”，精彩纷呈。

1986年初夏，罗孝建带着家人，英国中餐俱乐部、餐饮协会以及香港厨师学校代表返乡。我们从珍贵的原始影像中看到他孜孜不倦介绍厦门郑成功像，那是他少年时的偶像；介绍泉州的镇国塔，解释“刺桐城”的含义；在福州他指出工业化前后的变化；在苏杭，他朗朗高诵“江南忆”；在北京他带友人探望未名湖北侧的德才兼

备四斋——燕京大学原来的男生宿舍；他四处寻觅自己的足迹。但是，春秋无痕，雪泥鸿爪——多少无可奈何？慰风尘唯美食而已。

他博闻强记，中国成语信手拈来。比如，他说：与英语不同，在汉语中，我们中国人形容动脑筋，说“搜索枯肠”；夸奖某人有学问，说他“满腹经纶”或“满腹文章”。总之都与肠胃相关。由于我们的肠胃，我们的古诗文简洁优美。所以，吃，很重要。

另一方面，针对西方文化中对于科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探讨，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崇拜，罗孝建的解说十分成功。艺术，使人实现肉体生命向精神生命的扩展。而艺术表现的感觉可以分为：视觉可见、听觉可听、嗅觉可试等。显然，中国的烹饪学能够最全面地诠释这一美学观念。

比如，北京烤鸭。在“全聚德”，鸭子宰杀后，要比英国的鸭子多挂2-3天，从侧面开一个小口，把鸭子的内脏取出来，然后，从这个小口

向里定时灌入滚水。借此，北京烤鸭制作时间可以缩短到40分钟。而在伦敦的饭店要烤一个半小时。另，炭火首选木材为苹果木。从前是枣木，但枣木生长期太长，所以现代改用苹果木。苹果木木质坚硬，燃烧时间长，热量高，是其他树木如松木、杨木等无法比拟的。而且，苹果木能将浓厚的果味释放到烤鸭上。那种味蕾的多层享受，是唐诗宋词才有的，原始社会的伐木歌无法比拟。如用教育来比喻，苹果木烤炉出来的烤鸭是“学霸”，而电烤炉的烤鸭是“学渣”。

哄堂大笑！从此之后，英伦的主妇们茅塞顿开：原来“厨品”值千金。

他也可以从先秦哲学家荀子的话开讲：“不全不粹不足以为之美。”而在“吃”的方面，离这个标准最近的就是中华美食。因为我们的菜讲究“吃的艺术，艺术地吃”。

“色香味形”固然重要，但，墨色与留白，才是绝高境界。如宋画只有墨色，山水是一片寂寥，连娇艳的牡丹和翠绿的芭蕉都是用墨画的。黑，看似无着落，其实它的意境便是“有处无无处有”，那才是真艺术。一旦摒弃了所有艳丽和复杂，生命的本真就彰显出来——福州美食即是，比如童年吃过的牡蛎蜆饭和线面。

福州牡蛎，个小而味鲜，几乎就是罗孝建童年记忆的代名词。从罗园下望，“白露后蛎门开”。当闽江上小艇送来新蛎，罗家的小弟兄们不但白天溜出到小店吃，夜间，疼爱他们的厨子一买就是近百只，他们在火上烤带壳牡蛎，然

后，将温暖的壳放在唇边，一大口鲜美的牡蛎连汁咕嘟咕嘟地落肚而去。那是福州寒夜最难忘的爱，打麻将的父母浑然不知。

我想，后来他在利物浦当领事时，费尽心机保护地位卑下的海员，一定有这冬夜牡蛎的情愫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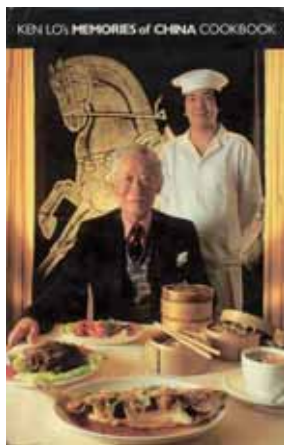
“蜆”，查词典没有。那只是闽人创造的方字。蜆：似螃蟹，但意与味大相径庭。古人说蟹之肥美，抵得上江山之美。“蜆”的味美又在蟹之上。红蜆更是其中极品，膏最足最饱满。蜆又温补，价格之高可以想象。所以，寻常家庭不得已时，才买1-2只红蜆，供病人食补或孩子解馋。

“蜆饭”是蜆盖着糯米饭蒸出来的，蜆的汁都流到糯米饭里。蒸笼开处，仙香扑面。在罗孝建的回忆里，每次大啖后，“往往，留下满桌的红色蜆腿”。

父亲罗忠诚把孝建兄弟的教育督导都交给大姑罗伯瑛和姑父负责。小弟兄们几乎就是姑妈的



《中国海员大西洋漂流记》，罗孝建著



原书名《忆华》，出版时改为《中华食谱》，罗孝建著

亲生儿子，他们与大姑妈的独生子陈岱孙一起长大。

除了生物学上的关联，表兄弟的个性，加上相似的家庭教育、名校熏陶，而呈现相似的天真烂漫、志趣相投。孝建、孝超与表哥陈岱孙之间的手足之情穿越时空，保持了终生。后来陈岱孙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一面大旗，新中国的几任总理都是他的学生。但他一直保持着清高出尘的本质。罗孝建对中国美食文化的传播，又何尝不成为远去的传说？

“蝓饭”的留白，应该是老杜的诗句：不舍不忍。

他怎么能够放进“忆华楼”的菜谱里？所以“忆华楼”的主厨师是山东人，菜谱里有山东菜、北京菜、四川菜和上海菜，唯独没有福州菜。

但是，“螃蟹宴”——别具一格的文化符号，是可以大谈特谈的。首先，人们吃螃蟹时，要“清场”的，即桌上不能有其他菜。因为它的味美独特，要避开其他食物之气。还要有高洁的菊花相伴。历来，吃蟹要吟诗作对，发“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之感叹。

因此，吃蟹赏菊作诗构成一套完整的仪式。无数赏菊吃蟹的诗句留在文学史上。苏东坡是大文豪，人人都想得到他的墨宝。而他创造了用一首小诗换两只蟹的韵事。同时，他还把得意之状用诗记载下来：“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螃蟹，古称尖团）。”

年复一年，岁月荏苒。只要团团肥肥的螃蟹



忆华楼开业的广告。左上角：地点，右上角开业日期：1980年7月4日。广告内容翻译：美食即外交

一上市，这些诗句又会重新被提起，如此这般，千百年来，螃蟹不绝，诗句不朽。直至今日，秋风起，菊花黄，吃螃蟹成为聚会的好借口。比如，人们如果需要请客，讲吃螃蟹，几乎无人谢绝，那会显得自己太俗太土。因为，“吃螃蟹”已经与“风雅”绑定了。这个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诗性仪式，居然在中国民间千年流传。听到这里，台下的观众大概都有一点小小的自惭吧。原来东方古老的文明如此富于诗情画意！

次日，当地的报纸报道的标题是“美食与诗歌”，副标题赫然写着“中国美食中的诗性品格”。

但是，现代烹饪中，不能只讲“诗性”。1983年，在伦敦教英伦主妇们做中餐的电视节目中，罗孝建再三强调了度量和速度，两大问题都



1954年5月16日罗孝建与安妮结婚

是现代主妇最关心的，因此创造出连续六周的高收视率。

他举福州线面为例。从钟鸣鼎食之家到平民百姓茅舍，都吃线面。但它只能做点心，因为每卷只有二两。如果超过二两，那就不是传统的福州线面了。

线面又是有个性的面，每锅水开只能煮一份。本来“远庖厨”的豪门公子哪里知道这个？所以，他闹过一个笑话。

1947年他结束了利物浦领事的工作，被调到曼彻斯特当领事。那也是一个中国海员聚居的港口。因此，他决定在到达的第一天，在当地的中國学生俱乐部中心举办一次聚餐会。晚餐是每人一份简单的鸡汤线面。他预先交代当地的一个爱尔兰朋友准备六只鸡。可是等到晚上他带着线面到达时，却发现那六只鸡都还活蹦乱跳的，而现场只有一个牙科医生带着一把小刀，他高举一

个竹筷，扑向可怜的母鸡们。手忙脚乱了两个半小时，才炖鸡汤。可是彼时，一大半客人已离开了。于是，他用学者的思路总结出：看起来“简单”的食物，并不简单。

商业饭店的菜谱要避免不可控因素。比如线面的“宽汤”，即汤多面少。

那是多“宽”？如何测定速度与汤量之比例？按照西式礼仪，如何眨眼之间吞下热汤热面？其次，线面伴侣唯有福州老酒或绍兴酒，酒入面时刻要精准，早一刻晚一刻都不可……

听众们当然佩服到五体投地。

罗孝建的知识储备来自他的教育背景：名门出身，名校毕业。

在他少年锦屋绣榻的记忆里，不止是英伦名校的规矩，不止是豪华轮船上特等舱的点心，不止是罗园的30间房间三大客厅，也不止是楼下10个厨工或轿夫、楼上15个贴身女仆用人。他还是燕京校园里的薄薄春衫少年，是剑桥网球场上的翩翩英俊公子。

剑桥大学本科生制度，采用独特的“导师制辅导”。即学生每上5-6小时的课，安排一小时的个别辅导。规矩是，不设固定内容不设主题，但要求学生提问题，能接上导师的话题继续聊。否则，导师便给评语“对本课程无兴趣，建议转学”。那是学术上的大大失败。因此，剑桥本科不但录取率低，淘汰率也是相当高。

在剑桥，论“GPA”，罗孝建的只是中等。但导师辅导制使他受益匪浅。每次，他按照约定的

时间到导师的房间，导师随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读几首诗，然后就瞎聊。渐渐地，罗孝建感觉到自己脑洞开放，思辨力提高。他不但能够接话，而且还能创造话题，见招拆招。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居然能够连续演讲一个半小时。很快，他被邀请到各种介绍中国文化的讲座演讲，成为英伦公众熟知的东方文化名人。

他的讲座，经常座无虚席。当然，每次活动后，华人中餐馆的生意就爆棚。看来，英国的男人女人还真吃不消罗孝建的魅力。

珍珠港事件后，BBC 邀请他做汉语播音员，每周一次向公众直播“二战”战事。所有的稿件都由他自己先用英文撰写，然后翻译成汉语。如此，他成为公众人物。这种身份也使得他在宣传中华美食上更加有公信力。

远在“忆华楼”开业之前，罗孝建早已经被公认为美食试味专家。很多新饭店开业都要请他“试味”，给出意见。自 1954 年始，他已经出版了 30 多本论中华烹饪的书，经久不衰，至今还是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比如法文版的《中国菜 100 种烹饪法》，德文版的《中国各省烹饪美食大全》。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一本《中国烹饪百科全书》，这本书交稿时是 650 页，12 万字。“百科全书”名字是出版社定的，其实，写作初衷是回顾他自己对于故国的热爱和记忆，所以，他最初定稿的名字是“忆华”。后来这个名字被他用于为自己的饭店命名。

1980 年 7 月 4 日，“忆华楼”在伦敦艾普利街 67-68 号开业。这地点的选择，远非世人猜想的离白金汉宫近，而是由于 1876 年 8 岁的莫扎特曾经在艾普利街 180 号住过一年，后来，这里成为莫扎特纪念馆，百年来，一直是伦敦知名的文化区。这地点的选择体现了罗孝建骨子里的浪漫情怀。直至今日，“忆华楼”还在原地，虽然易主，但仍属伦敦高端美食文化的一部分。

开业当天，罗孝建人在香港。夫人安妮打电话给罗孝建报喜，伦敦报纸的报道也是满篇点赞，“忆华楼”甚至被美国的评论家列为两个到伦敦必去的饭店之一。

比美食更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罗孝建担任利物浦领事的经历，这段史实证明了他的正义善良和对祖国的爱。

1941 年 12 月 17 日，珍珠港事件发生，英国也立即对日宣战。年轻的爱国者罗孝建马上写信给当时的中国驻英领事馆，要求加入战斗。在等待回信期间，他到英国海军基地做教官，每天两节课，对 800 名官兵介绍远东和教简单汉语。一周后，他接到领事馆通知，要派他到利物浦的领事馆工作，担任“见习领事”，任务是组织中国海员工会，保护他们的法律权益，以便配合盟军的运输。罗孝建一口答应。他认为，这是为祖国献身的机会。他告别剑桥的雅痞生活，义无反顾，来到利物浦。但就任之后，他就发现任务之艰巨。

海上运输线是英国和欧洲的命脉。为保障战争的需求，仅仅英国就动用了 100 多艘船只在海





2006年，在利物浦为中国海员立的纪念碑

洋上穿梭奔波，运送物资和人员。德国炮舰自然把它们当作主要目标。欧洲的主要港口大都被德军封锁，每次进港都牺牲惨重。所以雇佣远东的海员对盟军来说极其重要。

亚洲的水手，大部分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的贫苦家庭。据最保守的统计，先后总共有几万名雇佣水手，在远洋航线上为英国和欧洲运送物质和兵器。但是在纷飞的战火中中国海员牺牲惨重。截至1943年3月，英国船上的华人海员有831人殉职、254人失踪、14人永久致残、268人被俘，但是，所有的外籍海员却无法享受英籍公民同等的待遇和补偿。

他们拿到可怜的一点点薪酬后，不知第二天能否“有命花钱”。但是，如果躲起来不登船又是英国法律不容许的。他们会被当作非法移民关进监狱，交付巨额保释金。海员们出身贫寒，目不识丁，根本没有法律意识和手段来保护自己。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罗孝建。

在战乱的三年内，罗孝建花了无数心血让

水手中的帮派和解，联合成为工会。为他们草拟工会文件，团结起来向英国资方索要权益。他又无数次到监狱保释那些被关押起来的水手，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再把他们平安送回到船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顾及自己的官方身份，维护反法西斯联盟的最高宗旨。经常，他成为“夹层人”，其间的辛劳委屈一言难尽。

但是，罗孝建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与海员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凡劳资纠纷，或安抚牺牲的海员家属，只要他到场，矛盾都能迎刃而解。罗孝建特别记录下一件事：有一批新船员到来，他们用“官话”即普通话对他说话，他先是静静听完，然后用福州话回答他们。刹那间，泪花与欢笑齐飞。此时此刻，罗孝建写下：我想到了闽江，顿时，我也泪花涟涟。

1980年，他第一次回中国。刚过海关，他几乎双膝着地，跪下亲吻脚下的土地。

1986年，他回到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州，一路上只见他向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一切，但是，他到了台江的南台岛，只说了一句：闽江还在啊。这是“近乡情更怯”的翻版，千言万语都在其间。

经常有人问他：你觉得自己更像英国人呢还是更像中国人？睿智如他，却无法回答。

这一刻，几十年风烟在眼前飘过：父母逝去时，他没有来得及告别，当年离乡，也没来得及告别，半个世纪后再回到父母之邦，既是重逢，又是一次真正的告别……

## 黄培松家族后人与徐悲鸿

郑 和

近年来，因写清末最后一位武状元黄培松（1855—1925）的文章，与其四代孙黄承干相识，一个深冬的下午到他家中拜访。他说：“黄培松虽是武状元，但早年也习文，从他的书法可见一斑，后代也是英才辈出。”说着从卧室的高橱上取下一个档案袋，从中掏出一本发黄的书《黄曼士纪念文集（第一集）》。他郑重地说：“这本书已经是海内的孤本了。”从他严肃的表情中我感到其重要性，忙问：“黄曼士也是黄家后代吗？”他点点头。我翻开书，听他讲述书中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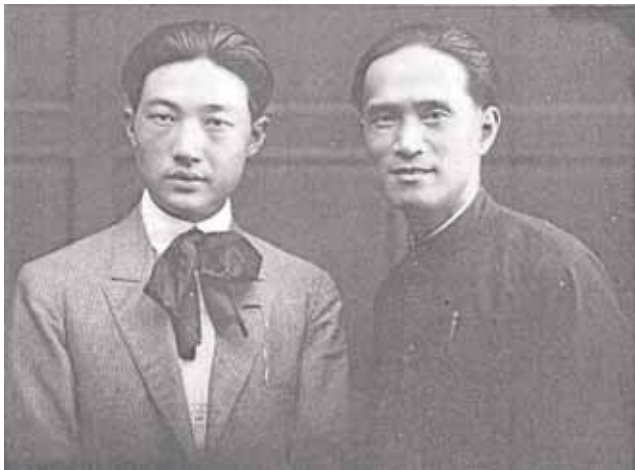
书中一幅幅徐悲鸿、齐白石、任伯年、丰子恺、石涛的画，吸引了我的眼球。我说：“书也是你祖传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黄曼士是培松将军的二侄子，他哥哥黄孟圭是民国时期的省教育厅厅长（1928年始任职）。黄承干说：“你把书带回家细读吧！不过，要保护好！”

该书系黄曼士先生逝世后，黄氏家族以黄曼士胞妹黄淑芬（新加坡华义中学校长）为代表的

一批美术家、文人为纪念他，征集文章编辑成的集子。黄望青等好友出资资助该书的出版。

黄曼士先生1890年8月8日生于福州台江中平路172号状元府第中，黄培松将军认为“将门之后不可无子弟习武”，黄曼士成年后，便把他送到广东陆军贵胄学堂（该校即后来的民国陆军大学）学习。后他因两腿得了风湿病，行走困难，寄居在广东的四舅父家，在表姐张葆琼悉心照料下病愈，两人产生感情结为夫妇。后黄曼士先生就任福建漳属的石码镇水警署署长，不久弃政从商，被南洋烟草总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聘为总经理。

黄曼士先生酷爱书法，自幼每天起早临摹碑帖，苦练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且爱收藏。在新加坡他修建了“江夏堂”，相当于黄氏宗亲在新加坡的祠堂。“江夏堂”按中式风格装修，陈列中国红木家具、古董文物，悬挂书法作品，栽种盆景、胡姬花等，大家在工余、节假日都前往相聚。



徐悲鸿（左）与黄曼士合影

黄氏宗亲在新加坡做生意、打工遇到了困难，黄曼士先生凭着在军、警、商界的人脉，为他们排忧解难。每每节假日，他组织聚餐会，餐前让文人、宗亲们吟诗作对，欣赏名人字画，观赏盆景、花卉。宗亲们一致推选他为宗亲代表。他热心教育事业，多次赞助新加坡弥陀学校，又是南洋学会的创始人，后被推任南洋学会会长多年。由他主办的《南洋学报》《南洋季刊》及丛书，内容翔实、考据充分，是当年很有分量的出版物。

据蒋碧微文章回忆，1925年，徐悲鸿与夫人蒋碧微在法国留学时，因政局动荡，断了经费来源，夫妇二人困居在法国巴黎，一筹莫展。徐悲鸿即写信给民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先生求救，赵即写信给时任福建教育厅厅长黄曼圭（字黄琬，1885—1965），他旋即写信给胞弟黄曼士，黄曼士得悉徐悲鸿先生的处境，即答应救济。当时黄曼圭恰在巴黎开展外事活动，随带徐悲鸿到



徐悲鸿题“百扇斋”

新加坡。在黄氏兄弟接风宴席上，徐悲鸿望着满桌的美味佳肴，不禁声泪俱下地说：“不知蒋碧微现在巴黎还有面包吃吗？可否帮我汇500法郎给她？”黄曼士先生立即带着徐悲鸿到附近海山街的银行电汇了800法郎给蒋碧微，还了债务又解了生活之困。此后，徐悲鸿就在江夏堂内住下，其间创作了大量作品，相当一部分是送给黄曼圭、黄曼士两兄弟。民国十六年（1927），徐、蒋回国途经新加坡，再次受到黄曼士先生的热情接待。可惜在日本军队占领新加坡的3年8个月中，一部分画作赠送友人，一部分典卖。留在福州武状元府第的茶箱中的部分画作又被洪水浸泡。目前，黄培松的三代侄孙女黄和珍、黄奕琳（住在香港）还保存了部分徐悲鸿等画家的作品。

据陈育松先生在文章中回忆，黄曼士先生还在江夏堂内创办了“百扇斋”，徐悲鸿亲自为其题写了画廊的门楣。斋中汇集了如徐悲鸿、齐白石、石涛等名家扇面画作300面以上，扇骨分湘竹、紫竹、棕榈、象牙、牛骨、光漆、雕漆、檀香、酸枝、紫檀等，他自号“百扇老人”，每每聚会时，分批展出。见有亲友爱不释手，黄曼士先生毫不吝嗇，拱手相送。

黄曼士先生不仅接济过徐悲鸿先生，还热心于新加坡的美术教育事业。南洋美术专门学校创立于1937年，据已故校长林学大回忆，黄曼士先生多次为其分担忧愁，四方张罗资金，解决校方各种困难，熬过被日军占领的3年8个月。

其兄黄曼圭也热衷教育文化事业。他早年师承林纾先生，1921年他受陈嘉庚和黄奕的资助，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硕士，毕业后赴法国巴黎考察教育。1928年，他应省主席杨树庄的邀请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曾多次邀请蔡元培、胡适、黄炎培、黄孟圭（时兼任厦门十三中学校长）共同商议创办厦大之事。黄曼圭在任时，曾邀徐悲鸿夫妇及8个月的孩子徐伯阳到中平路状元府为蔡公时烈士作巨幅油画（蔡在济南与日本人交涉不平等条约时被日本人杀害），同时筹办福建省美术展览会，黄曼圭还邀请陈子奋为徐悲鸿篆刻印章。

黄曼士对海外求学的贫家子弟也一样予以资助。萨镇冰（1859—1952）与黄培松、黄曼士深交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萨镇冰任福建省主席，凡有慈善、福利、募捐之事，第一个就是找黄曼士，他每每应承，从不推辞。如资助福州的佛教医院增建病房，赞助平民医院建院5万元，开元寺装修，鼓山涌泉寺的老人堂、延寿堂的维修；喝水岩边墙的维修，都由他与当时的财政厅厅长陈培锷慷慨捐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内学生上街游行，呼吁抵制日货、购买国货，黄曼士与新加坡商会



黄曼圭与黄曼士合影

积极响应，促成国内厂家与新加坡市场的对接。

1938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华侨协会被某些亲日分子把控，黄曼士先生大名被刊登在《昭南日报》的协会名单内，黄曼士先生异常愤怒，立志蓄须，闭门不去伪华侨协会，不与汉奸合流。亲朋好友会餐，如有汉奸、亲日分子在场，他也坚辞不去。在日寇占领期间，无收入的艰难日子里，他依然资助乡亲、画友，不求回报。

1939年，徐悲鸿再次南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个人画展，筹资抗日。展出的巨幅画作有《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壮士》《广西三杰》《九方皋》《六朝人物画及诗意》等，还有当时新加坡总督汤玛斯爵士的巨幅全身戎装油画像，部分画作即在黄曼士“百扇斋”写生而成。所募资金汇往抗战前线，得到国内舆论的一致好评。

# 乌山有祠祭壮愍

危砖黄

乌石山中部山顶的罗浮岭景区，一座“清王壮愍公祠”，经过重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座祠矗立在山头，规模不算大，却显得很是醒目、壮观。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座王壮愍公祠？王壮愍公又是何人？

简言之，王壮愍即王有龄（1810—1861），字英九，号雪轩，福州人。他在浙江巡抚任上，

抵御太平军的围城，死守杭州两个多月，最终城陷，自杀殉难，是年为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第二年（同治元年），清廷予谥“壮愍”，赐祭葬，入祀昭忠祠，又先后命浙江与福建建专祠。于是，在王有龄殉难约两年后，即同治二年（1863），地方官府于福州乌石山巅中部，兴建王壮愍公祠，坐西朝东，只有一进。

一份出自清人何绍基之手的《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御赐祭葬予谥壮愍浙江巡抚雪轩王公墓表》这样写道：

雪轩王公，以盐尹起家，服官廿余载，兴利除弊，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为之必力。咸丰十年，由吴藩擢浙抚。是时杭垣甫经兵燹，公莅任未一月，贼陷苏城，顺流南下，必欲取杭。公迭次开关迎敌，大挫贼锋。嗣绍绅某挟私阻挠，不容宁、绍设防，于是宁、绍陷，杭垣之餉道绝。然犹望大兵踵至可解城围，乃相持七十日，大小数十



拍摄于20世纪初期的乌山图，顶上为王壮愍公祠

战，城中兵民至草根树皮采食俱尽，外援无一来者。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公督同亲兵血战，力竭捐躯。呜呼！公之一身足千古矣。顾瞻时事，不禁痛哭流涕长太息也。绍基与公相知最深，谨撮崖略以纪之曰：

我中丞公，抚浙西东。

粮尽援穷，星殒军中。

惟帝褒忠，赫赫隆隆。

浩气横空，上薄苍穹。

节烈英风，嵩岳隆峻。

赐进士出身前四川学政己亥科福建正考官翰林院编修世愚弟何绍基顿首拜撰并书

何绍基这份《表》，收录在王有龄之长子王喬云编的《侯官王壮愍公年谱》之中，概括地叙述了杭州被围、内无粮饷、外无援军的极端处境下王有龄在杭州血战守城、力竭殉难的悲壮事迹。

王喬云所编《侯官王壮愍公年谱》，还收录了四篇关于王有龄的传记，其一为《国史馆列传（卷四十三）·王有龄》，其二为《清史列传（一百八十二）》，其三为《浙江忠义录·王有龄传》（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张景祁撰），其四为《王壮愍公传》（闽县王崧辰撰）。

其中，闽县王崧辰撰《王壮愍公传》稍为详细一点：“公姓王氏，讳有龄，字英九，号雪轩，福建侯官县人，系出河南光州固始县。始祖忠懿王审知，唐时以节度使入闽，遂世为闽人。先世积德不曜，父燮，始举孝廉，官至甘肃平凉府知

府。母刘氏，诞公时有黑虎入帷之异，及坠地，啼声甚巨，躯干倍常童。平凉公喜曰：是儿必亢吾宗。稍长，入塾读书，倜傥有奇气，不屑为章句之学。丁亥，年十八，随平凉公之官滇中。乙未，丁内艰，哭泣之哀，两目流血，其忠孝之性盖天成也。平凉公，故循吏，所至有政声，公随侍前后凡十四年，抱负殊凡，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

该传中所记“诞公时有黑虎入帷之异”云云，《年谱》上则说“二月二十七日午时，府君生于里第，先一夕，祖妣刘太夫人梦黑虎入帷，次日异香满室而育府君”，此权当家族传言。但传记中“倜傥有奇气”“抱负殊凡，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等语，确乎可见其人胸次。

《年谱》载，王有龄四岁时能认字，“日识三十余字”。五岁入塾就读，十二岁参加童子试，县府俱列前茅，“府君既喜经济之学，又好古文辞，所学益大进”，“福州府雷太守常言此生日后名位未可量”。后来他随父历练，见识和才干果然不一般。

王有龄之父王燮，举人出身，官至云南知府。“昆明何桂清乡试出其门，有龄与之相善也，长以盐大使官浙江，历升至知府。咸丰初，桂清巡抚浙江，以有龄知杭州府事，才练过人，遇事有为，桂清甚倚之。”（见《浙江忠义录·王有龄传》）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堂弟李世贤率太平军长驱南下，杭州失陷。曾任杭州知府的江苏

布政使王有龄忧心如焚，谋划救援，“思建里外夹击之计”。这个时候，四川籍名将张玉良率军自江南大营援浙，过境江苏，王有龄借机跟他见面，“密授机宜，促令赴援，许以十万两犒师”（据王崧辰《王壮愨公传》）。张玉良至杭后，依王有龄之计，亲率精锐发动突袭，大败太平军并收复杭州城。杭州克复后，张玉良晋升广西提督，王有龄则被擢升为浙江巡抚。

1861年，是王有龄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杭州守城之战，对王有龄来说是最为艰苦卓绝的岁月，这也是《侯官王壮愨公年谱》和几篇传记的核心内容。

《年谱》：

九月以前，剿办李世贤一股，兵力已觉不敷，兹又骤添悍贼李秀成等数十余万，即使我军以一当百，亦觉众寡悬殊。府君乃奏请专派左京堂宗棠督办全浙军务，浙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府君深悉左京堂体用兼优、才识洞达、韬略素裕、纪律严明，所部尽皆劲旅，以前业经迭次奏请援浙，至此更望切解悬盖，舍此万难挽回危局。奈左帅东南军务虽甚得手，仍未一律肃清，无由拔队前来……

这就是说，李秀成亲率大军前来围城，而王有龄所奏请的最强援军（左宗棠）没有来，最后的指望破灭了。《年谱》上还说，团练大臣王履谦竟携带家属辎重逃至宁波，航海奔闽，这使杭州防御雪上加霜。

王崧辰《王壮愨公传》：

浙自杭沪隔绝，衢处被扰，金华告陷，严州又失，饷源一线系于宁、绍二郡。绍兴失，杭城孤危愈甚。贼既得绍兴，十月朔日攻陷卖鱼桥。公日夜乘城督战，冀通江路。贼筑土城，凿眼置枪以御，粮道遂绝。张玉良亲逼贼营，血战中炮阵亡。时望江候潮门外贼营林立，公简死士张如龙等阴带火具混入贼营，乘夜放火焚火药房，贼营大乱，声若潮涌，公促饶廷选率兵踰营，行未半，大雨倾盆，火皆灭，我军亦衣甲淋漓不能进。呜呼，岂非天哉！城围既久，十一月食尽，升米值银一两，饥民哀号满道路，浮萍、蕉叶、草根、树皮、雀鼠皆尽，煮新旧皮箱为食……方粮将绝时，公以羸师不能为战，乃刺血作书四出乞援，各路统帅握重兵者相环，卒无一旅至者。公先所托道员李元度募安越军六千人，久已抵浙，亦迟徊衢州不果来。公登城楼，日夜望援师，两目尽肿，以针刺之，血出始能视。入夜，循堞周视，惟以忠义激励士卒，风高霜严，神色惨沮。初十以后，城外各营尽陷，城中六十余万人死亡逾半。公与将军瑞昌相响哭，仰天呼负国不已。遂草遗疏遣亲军冒重围至上海，托苏抚代奏，有“杭城不守，由王履谦贻误大局，臣死不瞑目”之语。延至二十八日，守兵已不食数日，渐饥踣已刻。贼由各门纷纷梯城入，城遂陷。公下城至清军桥驿馆，从

容殉节，年五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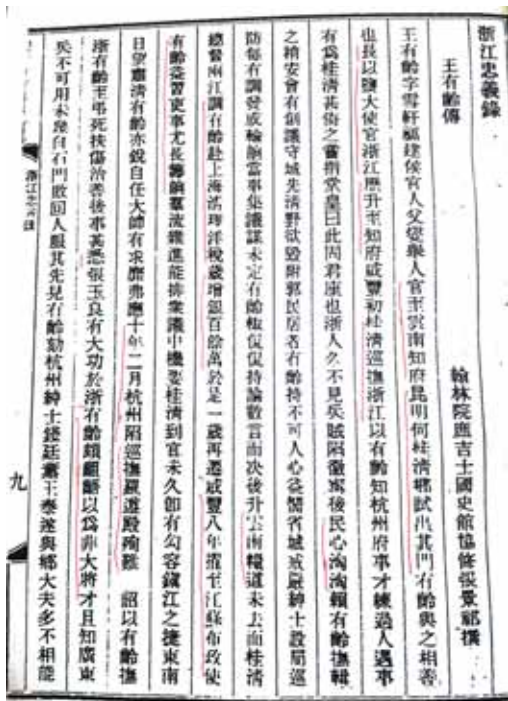
“浮萍、蕉叶、草根、树皮、雀鼠皆尽，煮新旧皮箱为食”“城中六十余人死亡逾半”，这就是说，城破之前，杭州已陷绝境。杭州城破，并非攻破，实乃“饿破”。以敢死队趁夜潜入敌营放火偷袭，已成垂死一搏。“公登城楼，日夜望援师，两目尽肿”，王有龄奔波劳碌、鞠躬尽瘁的形象，如在眼前。

张景祁《浙江忠义录·王有龄传》：

二十八日，贼破城入，有龄尚在城垣，闻报，左右尽散，即服毒，不死，回署缢阁。后李秀成见之，率众罗拜，具衣冠良材敛之。

王有龄的死难日为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城陷落之际，王有龄先是在城墙上服毒，没死成，回到巡抚衙门即自缢而亡。和他一起自杀的，有在杭的浙江省各大小官员以及王有龄的家眷，集体自杀，场面定是惨烈之至。“后李秀成见之，率众罗拜，具衣冠良材敛之”，王有龄是一个让对手都敬拜的英雄。据说，李秀成特意安排有龄亲兵五百，护送有龄棺木，并将太平天国王爵才能穿的黄绫龙袍充作入殓的寿衣。若果真如此，王有龄就成为唯一一位身穿太平天国龙袍下葬的清朝封疆大吏。

王有龄死后，杭州学者谭献（字修忠）作挽联曰：“裹创饮血，百战此孤城，痛鼠雀已无，云坏睢阳，方远乞贺兰破敌；循吏忠臣，一朝自千古，恨犬羊未尽，潮悲浙水，更谁生茹草遗民。”



《浙江忠义录·王有龄传》，张景祁著

这副挽联，被朱应镛记录在《楹联新话》里。

清廷给王有龄的谥号为何是“壮愍”，而不是“壮勇”“壮毅”之类？愍者，悯也。王有龄身上，有着官场之中最可宝贵的体恤民生的精神和情怀。

王有龄为官，向来较为清正，且能体察民生民情，颇有作为。据王崧辰《王壮愍公传》，他出任浙江巡抚之前，曾任新昌县令、慈溪县令、湖州知府、杭州知府、江苏布政使、兼署盐运使等职。他一到任新昌县，即断结积案百余起。这个地方向来多有盗贼出没，已成民患，当地官吏请求增加役捕力量。王有龄说：“勿尔，彼迫于饥寒，救死耳。”他只令在交通要道贴出告示：“归



田者不问，再犯弗赦。”告示一出，群盗皆散。在慈溪县，他一举解决粮田灌溉问题。慈溪县城有两个湖，杜湖和白湖，县城北乡粮田万顷，全赖湖水灌溉，可是当地土豪奸绅争相堵塞水道，圈湖为私田，致粮田荒芜。王有龄下令开掘围湖的私堤，恢复水流，废田得以恢复种收。他出任湖州府的时候，太平军由安庆陷金陵，战报传来，人心震骇。湖州驻军作战兵力虽然很少，但他加紧组织修浚城濠，依靠民团，积极备战，加上当地名绅赵景贤（谥忠节）自募精锐守城，所以湖州得以平安渡过这次战乱，“湖民感公入骨”。

王有龄对书画情有独钟，他在出任杭州知府及浙江巡抚期间，曾两次聘请嘉兴府海盐当时有名的花卉画家周可宗“馆其所署”。郭白阳《竹间续话》载：公喜极，就署建楼度之，名曰“黄楼”。未几，太平天国陷杭州，知公清白，戒下“勿取抚署物，违者斩”。渠师入署，公已殉难。即将遗物封识，觅其家还之，并加礼葬。探公怀，得此纸，知为公生平所珍爱者，遂并归焉，历传数世不失。王有龄的夫人蔡石润（字玉卿）亦能诗善画，“书法学先生，造次不能辨”。太平军之“知公清白，戒下‘勿取抚署物，违者斩’”，这是王有龄为官清正的一个佐证。

同治元年（1862）正月和五月，清廷先后下旨，“着再加恩入祀昭忠祠，殉难地方建立专祠以慰忠魂”，“王有龄予谥壮愍”。同治二年（1863）五月，清廷再下旨，“着照所请，准其于福建省城建立专祠”。按照旨令，当年杭州应是建有一座



乌山顶修复后的王壮愍公祠

王壮愍公祠的，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迹可寻。

福州乌石山王壮愍公祠落成之后，郭柏荫为之题联云：“一门忠孝人皆仰；两字功名此最难。”（据朱应镛《楹联新话》）

乌山王壮愍公祠门前，高大的樟树枝叶伸展。树干长满寄生的蕨草，给人一种沧桑感。有风拂过，枝叶轻摇，仿佛抖落历史的尘埃。从祠前走过的人们，面带微笑，享受着城市的安宁。他们可知，这里祀奉的是一位忠义爱民、年方五旬即殉难的一省巡抚，是一位出自福州的“体魄魁伟，才量过人”的血性男儿。

# 走近洪业先生

鹿野

洪业是谁？恐怕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都是一脸问号，学界也甚少人知道其人其事。胡适在给司徒雷登自传作序的时候专门提到一个人，说他在担任燕大教务长期间对于提升燕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人就是洪业。余英时在《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一文中说：“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决不逊于顾先生……尤其 1946 年去美国之后专心于学术研究，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著……”

## 一、学霸的闪光时刻

“客人还没到以前，洪业就在桌子上搁好了砚台、纸、笔，几本有关典故的参考书，然后在相对的墙上贴了纸。一边是七个平声的字，另一边是七个仄声的字，写好一条一条，从下面把它卷上来，沾上点糨糊贴起来便看不见了。



洪业先生像

差不多下午三四点钟客人都来了，各带了一布袋的铜板，一般有十来个人，下雨天就少几个。诗钟开始时，洪业请客人在一边墙上贴的纸中随便抽一张，再请另一客人在对面墙上贴的纸张中也挑一张，洪业把被挑的两张纸揭开，大家便见到两个平仄相对的字。譬如平声字是天，仄声字是马，那大家就开始吟诗作对，头一个字不是天就是马，要是用天，那第二句的头一个字就得用马。大概 20 分钟后，洪业当啷当啷地摇铃

了，大家便放下笔来。有些做得快的这时已经做出几对联子来了。洪业把联子都放到小篮子里，分派给各人看，各人很快地把认为好的搁在一边，抄下来。有的给一个铜板、两个铜板，真的就给五个，最多给七个，都不知道是谁写的，看完了就递给下面一个人，这样轮流评判，可是看到自己的联子便悄悄地递下去。过了十分钟，洪业又摇铃了，那时人人面前都有个小单子，表明哪首诗给多少个铜板，头一个人就高声朗诵，那个联子的作者就站起来了，鞠个小躬，跑过去收铜板。有时候有人读了上联，别人便和声读下联，因为他们也取了那首诗。那作者就得意了，站起来围着桌子跑一圈，一边跑一边收铜板，大家拍手恭喜他。”

这是洪业小时候随父亲到山东赴任期间参与诗钟的场景。彼时父亲洪曦被派往山东鱼台做候补县令，洪业也跟随父亲从福州到了山东。

得益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洪业小小年纪便展示了诗文上的天才。在旁观父亲和世伯们诗钟游戏的时候，他偶尔也做个对子投进去。有一次以平声“妍”和仄声“减”作对，洪业技痒，写下“花未开时香不减，春虽老去色犹妍”投进评选的对子中，没想到参加的客人们都选了这一联为当日最佳。揭晓是少年洪业所做，大家都惊讶不已。

诗钟是一种明清时期在福建非常流行的文字游戏，既有点像规定时间的命题作文比赛，又有点像文学研讨会，而且因为是盲评，所以对子好

坏，高下立判。诗钟不仅在福建流行，慢慢地也随着闽籍官员走向全国，像洪业的父亲到了山东做官，闲暇之时最惬意的时刻便是跟同乡玩诗钟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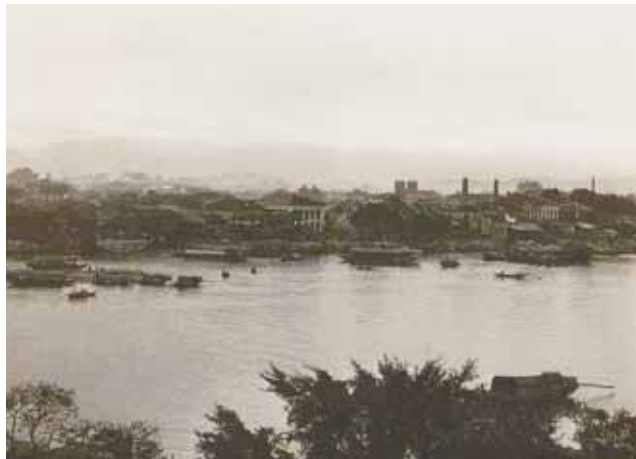
洪业自小就展露出来诗文上的天赋，原本以为也会与父亲一样走上读书致仕的道路，但是1905年，洪业12岁的时候，在古老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和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洪业对于未来陷入了迷茫。加上父亲洪曦病重，全家人搬到济南一条小巷里租房居住，作为长子的洪业便中断了学习，在家伺候父亲。等父亲病渐渐好转以后，洪业准备投考山东师范附属中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洪业此前没有上过正式的新式学堂，他自己从一本美国传教士写的《笔算数学》学习了代数，英语则是父亲替他请的一位老师每天下午来上课，加上自己在济南刚刚开设的第一间公共图书馆的严格自习，入学考试的时候洪业竟然考了第一名。

师范附中毕业之后，洪业想到上海投考海军学校，不料坐船从青岛至上海的途中遇到大风浪，延期了两三天，到上海误了考期。同行的母亲，提议洪业去拜访一下他父亲的朋友——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高梦旦，高梦旦建议洪业回福州上美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院，将来可以从事外交，同样可以报国。

洪业听从了高梦旦的建议，回到幼时生活过的闽江边的南台岛上。在南台岛经营茶行的外祖父慷慨地接纳他们一家，洪业住进了从前那间伸



1929年拍摄的福州南台江中岛



1939年的南台苍霞洲

手就可以摘到荔枝的二楼客房里。他每天往返于仓山和南台岛之间，从家到学校要经过两座桥，一座是万寿桥，一座小桥，然后爬上仓前山长长的阶梯，英华书院便在那高高的可以俯瞰闽江的仓前山上。

## 二、命运的转折

在英华学习期间，洪业成绩优异，但是长期受到的儒家思想教育与学校教会传播的基督教思想在他内心产生冲突。洪业常常将《圣经》上他认为有违儒家的一些教义说法抄下来，批注上自己的看法，贴到学校的公告栏里。此举引起了学校教会领导的不满，有传教士提议开除洪业，但是校长高智先生的夫人（Mrs. Gowdy）非常看重洪业，她说学校不能因宗教原因开除一个学业优良的学生。她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爱护着这个个子高高的勤于思考的孩子，以她的宽容慈爱感染了



英华书院校长高智赴任协和大学校长时合影

洪业，使洪业后来也成为基督教徒。

在英华临近毕业的时候，洪业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彼时父亲洪曦已经去世，他作为长子，不能一直依靠外祖父家，于是去考了海关和盐政的事务员，另一方面又想到北京从事报业。正在这时候，代理校长转给洪业一封来自美国的电报，问他是否有意到美国深造，对方可以负担一切费用。这位叫作汉福德·克劳福德的先生是



洪业（左一）、司徒雷登（左三）、刘廷芳（左四）等人合影

英华中学的捐助者，每年捐献 1000 美元给英华中学。洪业像做梦一般，受到命运的又一次垂青。但是他担心远渡重洋之后母亲和弟弟们该如何生活，没想到回去征求母亲和外祖父的意见，他们都非常支持他出国深造，开茶行的外祖父替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1915 年，22 岁的洪业乘船横渡大西洋，开启了他的异国求学之旅。到美国见到了资助他的汉福德·克劳福德先生，他是当地最大的百货商人，有一年旅行至中国，到他资助的英华书院旁听一节历史课时，听到洪业回答老师关于拿破仑为何战败的问题，洪业的思考和表达令他印象深刻。事后他与校长交谈，了解到洪业是英华书院开办以来最具天赋的学生，因为家贫不能继续深造。克劳福德先生慷慨地资助了洪业在美国的学业。在他的帮助下，洪业入读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插入三年级，主修化学和数学两科。在那里

洪业度过他生命中最为自由和快乐的时期，此前没有接触过的人和事物，令他大开眼界，儒家君子内敛谦和的性格也渐渐开朗外放，加上他修长伟岸的身姿，同学们都喜欢上这个来自东方的“快乐洪”。

1919 年洪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硕士课程，1920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神学院。这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洪业走上了职业演说家的道路。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他去了不少地方，他伟岸高挑的身材和流利优美的英语，以及出众的风度使他成为广受欢迎的演说家，所到之处，当地的报纸都予以报道。恰在这时，洪业英华中学的同学，同样在美留学的刘廷芳来信，介绍司徒雷登与洪业认识。司徒雷登刚在北京创立燕京大学，他对洪业的学识和风度颇为欣赏，便聘请洪业到燕京大学担任历史学助理教授。但回国之前，司徒雷登希望洪业在美国多留一年时间，以协助燕大副校长为学校募款。洪业便与燕京大学的副校长相伴在美国各城市之间演说，向美国人介绍古老东方帝国的辉煌历史文化和可爱的人民。短短一年半时间，募得 200 万美元，作为燕大创建之初的办学经费。

1923 年，洪业在离开家乡 8 年之后回到中国协助司徒雷登创办燕大。他除了担任燕大历史系代理主任，教授历史和宗教史的课程以外，还一直致力于改进燕大图书馆。洪业发挥他在美国时期的募捐和演说能力，向美国的好友、商人以及主教们写信求助，获得捐款，作为购书经费，广

泛搜罗图书资料充实燕大图书馆。燕大图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可以说洪业功不可没。这也是为什么胡适一再强调洪业对于燕大的贡献的原因，他在晚年给司徒雷登的自传作序时说“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洪业在燕大任教务长期间，取消预科，替文理科创办了研究院，在师生的聘用和考核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但是在1927年，洪业辞去了教务长的职位，一方面他意识到搞校务对他来说牺牲太多学术上的时间，另一方面，动荡不安的局势和学生当中暗涌的对于政治的不同派别斗争也是他想要离开的原因。他说他作为燕大教务长，花在营救学生出狱上的时间比在处理学校事务上的时间更多。他在行事上的美国化、机械化，专讲效率而不通人情的方面也受到司徒雷登的微词。

1930年春，洪业自燕大休假一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借以暂时逃离令他头痛的学校政务。他以讲师名义每学期教几门课，都有关汉学及远东历史。在哈佛的图书馆，洪业得以浏览到不少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新资料。

这段时间洪业把更多的心力转向国学与考证。《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等重要的成果都是在这时期写就。其中《春秋经传引得序》有力地证实了《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史录，而非凭空杜撰。因为

《春秋》当中提到的37个日食都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如果说35岁之前的洪业更多地致力于对外交流与社会活动的话，那么35岁之后他更多地转向自我内在的精神求索。在西方文化中游历了一圈以后，再度回到儒家的典籍中寻找人生的答案。“修身、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中轮回，他再度回到起点，从古诗文中去修炼自身。他把这一切寄托在对杜甫诗歌的考证与研究之上，用一种西方思维和视角来诠释和解读杜甫，通过撰写杜甫传记，中西文化在他身上统一融合。

### 三、儒家血脉

作为长子，洪业与父亲感情极深厚，他以儒家的为人行事给予洪业深深的影响。因为照顾病中的父亲，二人又可做更多成年男人间的交流。父亲教导他做人要有公德，不要重财，又要有私德，不能贪色。父亲虽不是基督徒，但懂得一个人一生应该对上帝负责。大概一生以娶富商之女为愧，父亲告诫洪业，穷是读书人的本分，希望他将来不要做官，也不要娶富家女儿，所谓君子固穷，要守住读书人的本色，希望他保持自身的清洁，“守身如玉，执志如金”，要立志做圣贤。

父亲在山东鱼台做官时，因为在很多事情上秉公办理，当时一县人都叫他洪青天。一县知县也是当地读书人的老师，很多年后，还有自称是

他父亲学生的人来拜访。当洪业在英华毕业之后陷入对前途的迷茫之时，远在山东的士绅们听说洪曦大公子学成毕业了，竟然写了信来推举他到父亲当过知县的地方当县长。父亲这些言行都深深地刻进洪业的身心成长过程当中。

从父亲那里，他接触到了伟大的诗人、甚至可以称为其精神之父的诗圣杜甫，后半生都致力于对杜诗的研究，尤其在他三十出头留洋回国，对于世界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体会之后再看杜诗，理解又更加深了。他在《杜诗引得》的长序中说，得力于前人钱谦益等人的努力，又有了引得、图表等工具，再加上国外学者的翻译讨论与启发，他也开始认真地研究杜诗，于是有了这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这本用英语写就的传记里，洪业整理了能找到的所有的杜甫诗作，从诗中流露的线索梳理了诗人一生从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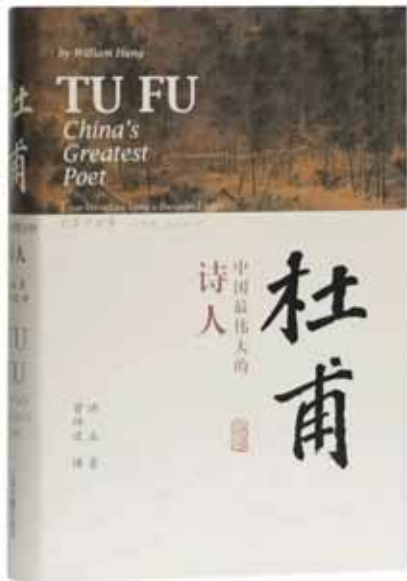
的天才到中年变故的人生经历，还原了诗人动荡波折的一生。行文简素易读，里面渗透作者对于诗人深深的感情。

1946年，经历了战争、被日本人囚禁、燕大南迁等变故之后的洪业再次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并为重建燕大募款。原本打算做短暂的休息与放逐，再回到燕大教书，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人期待的和平时期并没有到来，洪业只能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他也没有想到此后半生再也没能回到中国。

#### 四、梦回南台

洪业1946年之后一直留在美国，直到1980年去世。1948年福州协和大学曾经请洪业回去做校长，彼时国内正在闹学潮，校方希望能有一位如洪业这般有声望的人士来领导协和大学。洪业接到聘书有些犹豫，他最后还是谢绝了。一方面对于校务感到厌倦，想要好好投入精力在学术中，另一方面也有着对未来局势的不可把握。

晚年的洪业用退休金在剑桥附近买了一栋老房子，靠收一点租金贴补家用，除了新朋旧友不时来访，他的生活就是纯粹研究与写作，义务辅导学生。好几代哈佛研究中国文学历史的学生从他身上获得帮助与指导。但是他又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国内的一切，人与事。一旦有人从国内去拜访他，他便追着问这问那，问那些故交的下落，问他在燕大的房子，问他心系的文物与古书如何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洪业著

如何。

1980年12月，87岁的洪业突然神志昏迷，向身边的孙儿讲起福州话。入院后，他拒绝医生为他插上各种管子。几天后的12月22日，洪业在家中去世。

他去国离乡三十余载，时时怀念故土，怀念燕大南园半角的故园，那叠叠藤萝、一窗山景、万卷尘书，也怀念那个到处生长着榕树、龙眼、荔枝和闽江流经的故乡，怀念疼爱他的外祖母和娇惯他的奶妈。

洪家祖上原本也是一个殷实的地主之家，在太平天国时期受到影响，洪业的祖父早逝、家族败落之后，一家人从闽侯浚浦迁到福州城里，多数时间是租房住。洪业回忆小时候经常跟着伯父祖母等一大家子人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居无定所。

母亲林家是富裕的茶商，家中有着宽阔的院子，两层楼的高墙大院，雇佣二三十个女工拣茶叶，还有伙计、账房等。外祖父之所以把女儿嫁给一个穷书生是因为看重洪曦的学问和人品，但是结婚之后女儿跟随洪曦一生颠沛流离，是他没有想到的，因此，第二个女儿坚决不再许配给读书人，而是嫁给了一位开当铺的商人。

因为父亲洪曦致力于考取功名，1891年中举后上京城殿试，洪业5岁时他就到山东做官去了。洪业童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母亲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家在南台岛即如今台江的上下杭一带，那里自古是福州商业的聚集点，无数的商帮会所云集其间。洪业外祖父的“永吉茶行”面

对着闽江的一条支流，他住的客房窗外有三棵荔枝树，他可以从窗户伸出手去摘荔枝吃。天井里有大大的水缸，里面养着荷花和金鱼。房屋上层绕着走廊，屋顶盖着青瓦，屋脊上有陶制的小人以及龟鹤、蝙蝠等吉祥图案。门前一天到晚有兜售各种零食的小贩经过，他们各自有好听的叫卖声。送水的，磨刀的，弹棉被的，卖鱼丸肉燕的，还有摇着铃把麦芽糖吹成小人小狗的。他小时候常常在茶行前面的河里捉螃蟹，看人家在河边打水洗衣服，看船夫用竹竿撑船，“三条簪”妇女踏着水车，唱着山歌。

这个从小就聪颖好学的洪家依弟，花了大半生的努力，学会了地道的官话、流利的英语，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那曾经令他被人嘲笑的带着地瓜腔的福州乡音却一直萦绕梦中，挥之不去。弥留之际，他还是用乡音呼唤自己的童年，在异国的冷风中重回了儿时榕荫处处、叫卖声声的南台岛。



洪业童年记忆中的江边妇女



# 洪业在抗日战争中

洪松生

洪业（1893—1980），祖籍闽侯县甘蔗街道洽浦村，曾就读于福州英华书院，1915年留学美国，192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曾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等职。

日本侵华期间，燕京大学因有美国背景而在北京（北平）得以立足。作为燕京大学的知名教授，洪业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他在坚持教书育人的同时，尽其所能为抗日出力，体现了知识分子深切的爱国情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直逼华北。10月12日，洪业与容庚、顾颉刚、吴文藻、郭绍虞等人，在第一时间发起成立燕京大学“抗日十人团”，并讨论订立了抗日誓词：“在日本军队未离开中国疆土，赔偿其所给予我国一切损失以前，凡我团员绝对不为日人利用，不应日人要求，不买卖日人货物，并各自努力于抗日有效之种种工作。”每位成员都郑重地在

誓词上签名，显示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的抗日决心。这是燕京大学自发的、最早的抗日组织。此后，校内很快就模仿“抗日十人团”的形式，成立抗日团至第十团。

1931年10月13日，燕京大学成立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选举洪业、容庚、黄子通等人为委员。洪业担任宣传组组长，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和捐钱捐物等活动。1933年初，他与担任宣传干事的顾颉刚等人，多次开会讨论加强宣传抗日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以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和学生抗日会的名义，共同发起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征集以抗日为主要内容、北方民众喜闻乐见的大鼓词。1933年5月，洪业与顾颉刚、马鉴、郭绍虞、郑德坤等人，对征集来的40多篇大鼓词稿件进行评定，公布了获奖名次。通过大鼓词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后，抗日会又陆续出版多种小册子宣传抗日，为宣传抗日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193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洪业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他还鼓励学生侯仁之等人积极参与。在洪业当时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文末还特意标上了：“1935年12月28日，燕大学生罢



鹤龄英华书院旧照

课之十九日。”

1936年10月，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推动下，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会首先发出宣言，开展签名运动，并得到平津文化界的大力支持。由此，签名活动范围扩大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天津高校和一些文化部门，后来形成了著名的104位平津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的《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声明》。声明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八项要求，其中包括“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中日交涉绝对公开”等内容，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体现了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洪业是签名人之一，名列于第九位。此外签名人还有顾颉刚、钱玄同、梅贻宝、冯友兰、张奚若、容庚、钱穆、张荫麟、蔡一锷、朱光潜、郭绍虞、齐思和、沈从文、朱自清、萨本铁、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容肇祖、雷洁琼、杨秀峰、聂崇岐、邓嗣禹、侯仁之等著名教授、学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京高校为保证学校和学生安全，纷纷内迁。燕京大学一部分教师来到四川，在成都成立了后方的燕京大学。洪业不顾危险，与一批教授决定留在北京燕京大学工作。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于12月8日凌晨占领了燕京大学，封闭了整个校园。洪业等15名教师和11名学生先后被捕。此时人们不禁想起，去年洪业还应邀赴美国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接受该大学授予他的文学博士学位。

那时日美关系已日趋紧张，不少人劝洪业暂时留在美国避险，但他却坚持重返燕园，与全校师生共渡难关。

洪业在狱中毫不畏惧，与日寇进行了不屈斗争。在敌人审讯中，他勇敢面对，慷慨陈词。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设法递纸条给侯仁之等狱友，告知过堂时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并提醒侯仁之，无论遇到什么严重情况，都要咬紧牙关，严守秘密，尽可能保护自己人，与敌人展开斗争。他鄙视侵略者，苦中作乐，独自构思乌托邦小说，平日里常和赵紫宸狱友诗词相和。洪业在狱中坚守民族气节，坚定抗日立场，直到1942年6月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洪业仍受到敌人的监视。面对敌伪人员不断的威逼利诱，洪业始终信念坚定，不为敌人做任何事情。这一期间，他生活非常艰苦，靠节衣缩食、变卖家中的物品维持生活。他曾发誓，只要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辈子不上讲台。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书，也证实了洪业的坚定立场。洪业还教育他的学生侯仁之等人不要受敌人引诱、收买，不要上敌人网罗人才、给安排工作等圈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开始复校。洪业、陆志伟等人主持复校工作。他们商定，凡是在北平沦陷期间与日伪合作的燕京大学教授，复校后一律不予聘用，而在沦陷期间坚持民族气节的人员，则一律复职。这延续了洪业一贯的爱国立场。

# 秋阳下的银杏树

林思翔

连江马鼻镇北面有个村庄，名叫“半田下”，房屋一半隐在山腰竹林里，一半建在山脚田地上，村虽不大，却绿树掩映、错落有致，风光独特。特别是山坡上那棵近500年的银杏树，华盖如盘，荫披大地，仲秋时节叶色如金，熠熠闪光，成了远近闻名的一处网红打卡点，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村顶上有座大厝，三进三落，四扇五间，歇山式建筑，占地面积达1048平方米，为清代陈姓人家迁来时的祖厝。后随着房屋的老化和人口的繁衍，陈姓人家陆续搬出。只有少数经济拮据的人留住其中。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翁陈云飞，就是留住在大厝的少数住户之一。在大厝进门的边上，至今仍保留的两间破旧房间就是他的住家。

陈云飞，曾名陈明斌，1915年就出生在这里。

陈云飞青少年时期，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



半田下村

生。家境困难的陈云飞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辍学，13岁来到马鼻镇当一名学徒。他自幼聪颖好学，活泼敏捷。接触了进步思想后，便萌生了参加革命、为穷人谋幸福的念头。1931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6月参加闽中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亦称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经过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严峻考验，于1933年经组织批



云飞大厝天井



陈云飞出生的房间



云飞大厝门楼



云飞大厝内景

准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游击队一名活跃的宣传员。1934年1月，游击队扩编为闽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云飞担任团政治处宣传员、宣传队长、游击总队政治指导员。8月，代表中共连江县委往潘渡贵安接应粟裕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同年10月当选为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

此时，正值连江红军十三独立团上调宁德，与福安红二团及寿宁的闽东红军独立营在支提寺

会师，成立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连江苏区面临国民党二五九旅及省保安团等一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清剿”。而连罗苏区红军主力仅剩三四百人，且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弱。中共连江县委于是决定“扩红”，从各地苏区秘密抽调赤卫队、肃反队集中下宫乡，将连江独立营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西南团”，杨采衡为团长，政委陶仁官。云飞积极配合县委，宣传鼓动苏区群

众参加红军，扩大武装队伍，建立西南团，开展反“围剿”斗争。

西南团拥有500多人枪，编为马、克、思、列、宁五个连，陈云飞任连长（其他4位连长分别由张家衡、张家武、何明才、魏向春担任）。面对敌人重兵压境，红军西南团毫无畏缩，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坚决镇压密谋叛变者和内奸特务，密切和苏区群众的关系，从而稳住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1935年1月下旬，敌八十七师一个连、常备队一个排、水警队和兵舰2艘，由黄岐出发“清剿”奇达乡苏。西南团英勇反击，激战5小时后向下宫、粗芦方向转移。这时，西南团给养断绝，海上交通线也被国民党军舰封锁，与中共闽东特委的联系也中断。在这危急关头，1月31日，中共连江县委在下屿召开县委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部队向罗源山区撤退。但就在开会的翌日清晨，部队突遭敌人重兵包围。西南团与敌人展开激战，双方都有较大伤亡。西南团分两路突出重围。此后西南团队伍分为两部分活动，一部分由杨采衡、陈云飞率领转移到连罗沿海地区活动，另一部分由政委陶仁官率领转战于连罗山区。

杨采衡、陈云飞等率领的这部分西南团队伍，坚持在沿海地区与“围剿”的敌军打了几次遭遇战，部队损失较大，在连罗沿海岛屿难以立足。在这紧要关头，他们试图联合西洋岛的柯成贵游击队，并获柯的同意。于是，杨采衡、陈云

飞等率领百余人队员，乘船前往西洋岛（今属霞浦县）。由于在途中又遭敌人追击，为了避免大部暴露，杨采衡、陈云飞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只挑送陈咸恒、何于金、陈春古、郑瑞英、黄如佺等24位骨干，于2月18日乘着夜色，秘密登上西洋岛。

但这一行动很快被敌军发现。2月19日拂晓，敌军即出动两架侦察机到西洋岛上空侦察，随后出动三艘兵舰封锁西洋岛海面，并向岛上开炮。还出动国民党兵和反动民团千余人，由渔霸林元良带路，数次登上西洋岛，企图将西南团指战员和霞浦海上游击队一网打尽。

在这危急时刻，柯成贵先是派人引导西南团骨干转移到北澳后山的山洞里，接着又转移到后山地势较高的柯成贵郭姓表弟的一座独立房屋住下。而后又担心此地不可靠，又在朦胧夜色中将西南团骨干再次转移到浮鹰岛尼姑屿一个更为隐秘的岩洞里隐藏起来。这个岩洞内高外低，涨潮时，海水可漫过洞口，十分隐秘。西南团骨干白天隐藏在洞内，晚上就沿着陡峭山路移步至半山腰的石洞中取暖。由于柯成贵的周密安排，敌人在西洋岛扑了个空。

2月20日拂晓，柯成贵带着两名队员，借着夜色掩护，驾着一条小舢板，向尼姑屿方向驶去，亲自给西南团红军送食粮。这时敌人已在岛上密布明岗暗哨，柯成贵小舢板一驶近就被抓获。柯成贵被转至福州，关在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在狱中，柯成贵受尽酷刑，但他宁

死不屈，绝不向敌人透露任何西南团的消息。穷凶极恶的敌人遂于1935年5月1日将柯成贵枪杀于福州鸡角弄。

柯成贵被捕的2月23日深夜，西洋岛海上游击队李春财带着8名敢死队员驾船到尼姑屿岩洞，将这些红军一一接出，并突破海上敌人重围，驶往福清。在福清县委书记黄孝敏的安排下，安全到达目的地，加入福清游击大队。陈云飞出任中共福（清）长（乐）特别支部书记，在福清、长乐、永泰交界的镜洋一带开展秘密活动，担负起为福清革命寻找落脚点的任务。

位于福清、永泰交界的罗汉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土匪常年出没，国民党统治鞭长莫及。1935年2月，福清中心县委派陈云飞到罗汉里附近的集镇琯口了解情况，开展工作，伺机进入罗汉里。

陈云飞经过一位叫钟来顺的老汉的引领，进入罗汉里，与被国民党追捕的土匪头刘春水的叔叔刘阿和见面。

陈云飞独闯龙潭，首先生对刘阿和开诚布公表明身份，并循循善诱以革命道理。刘深受感动，愿与陈云飞结为兄弟，并欢迎把福清地下党游击队接到罗汉里，自己也加入其中。在刘阿和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开辟了方圆50多平方公里的罗汉里游击根据地。

1935年夏，中共福清、莆田两个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闽中特委，福清、莆田游击大队整编为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

同时，成立永泰县工委，陈云飞出任书记。工委的成立，加强了党对根据地外围地区的工作。在特委统一领导下，以罗汉里和常太为根据地，依靠群众，发展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随后，中心县委又派陈云飞打进刘春水余部盘踞的半岭、双坑等地，策动刘春水的遗孀何兰英等十多人携枪加入游击队，加强了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至此，罗汉里周边的三股土匪都得以清除。

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警察、保安队到罗汉里大肆抓捕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1936年5月上旬，游击队突出重围，离开罗汉里，转移到莆田广业山区，开始新的征程。陈云飞带领十多位连罗籍的战士翻山越岭过闽江，撤往宁德山区。

罗汉里根据地自1935年春到1936年夏，一年多时间里，经历比较重要的战斗就有奔袭大洋田赋分柜、东山寨战斗、袭击大义乡民团、攻打扈屿镇、河村桥伏击战等五次，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地主土豪的反动势力。罗汉里根据地是闽中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闽中地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陈云飞为新四军驻闽东留守处主任。1938年2月，闽东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陈云飞随军北上，奔赴抗日前线，曾任新四军教导队区队长、新四军教导总队队列科干事。1940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陈云飞随部队突围到皖北，相继担任突击部队副主任、新四军第七师五十七团政治处主任、中共安徽省繁昌县委

书记兼县游击大队政委、中共安徽省芜湖县委书记兼游击总队政委、新四军团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飞先后担任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政委、第六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十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开封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等。陈云飞戎马一生，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八一勋章等，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飞任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抗美援朝期间，陈云飞随部队赴朝，任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其部队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等战斗。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阶段，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此役我志愿军歼敌 5.3 万人，将韩国军 4 个师打残，收复阵地 160 余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金城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志愿军对坚固设防之敌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60 年，陈云飞转业地方，先后担任葫芦山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连江县委书记、福建省水产局局长、福建省民政厅厅长、福建省老干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终因积劳成疾，于 1985 年 8 月病逝福州。

陈云飞同志的光辉人生，亦如村头上那棵秋阳下的银杏树一样，熠熠闪光，永远为人们所景仰！



## 阳桃树在诉说

林朝晖

—

有月亮的夜晚，我坐在鄢家花厅一隅，泡杯红茶。

红茶如酒，润进喉咙，直抵肺腑，身体很快有了温热感。前方那棵阳桃树枝壮叶绿，裹着一层清冷的月光，有一种别样的美。

轻风拂过，阳桃摇摇曳曳，它在向我诉说它的故事。

这棵杨桃树成长于三坊七巷的鄢家花厅。三坊七巷是福州这个千年古城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这里深宅云集、大院比肩，是精雕细琢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展示地，素有“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之说。而鄢家花厅就浓缩在这半部中国近代史之中，它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为纪念鄢氏入闽始祖，三明建宁溪枫的鄢氏与福州永泰麟阳的鄢氏合买此地的民房，建起了这座“鄢氏太澄公宗祠”，各地鄢氏族亲来福州大多数都居住于此。鄢家花厅内有天井、厅房。天井宽







阔，连接三面走廊。厅堂 28 根大木柱支撑。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木雕花果垂件，窗扇镶有图案字纹，门窗雕工卓绝，垂莲、雀替、斗拱、锯花造型各异。鄢家花厅的结构布局，堪称大笔勾勒，具体到厅里的每个建构，每处细部，无论是门窗还是一斗三升联拱等装饰构件，无不被雕饰得精妙绝伦。

西花厅是鄢家花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园林小筑，两座毗邻，走廊相通，坐南朝北，四面围墙。主座厅前廊有小门通西院花厅，厅前轩廊卷棚饰顶，轩廊前一对大柱础用青石打制，四面刻着蝙蝠。西墙设有两层石制的几案式花架，专供摆设花盆。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三个小型花篮式悬钟，花纹细腻，仿佛要把

普天下最瑰丽、最炫目的色彩，全部采撷过来装点它的雍容华贵。与木构半边亭遥遥相望的则是天井西侧的那株阳桃树。

据园林专家考证，福州在宋朝就开始种植阳桃。南宋词人辛弃疾在福州任职期间，曾写下“忆醉三山芳树下，几曾风韵忘怀。黄金颜色五花开，味如卢桔熟，贵似荔枝来”的词句。福州百年以上的阳桃树极少，鄢家花厅这株 200 多年的阳桃树就显得尤为金贵。

一年四季，时间这位伟大的画师都会为阳桃树勾勒出一幅幅绝美画卷：春天的粉红色小花；夏天的枝繁叶茂；秋天翩翩起舞的落叶；冬天酸甜多汁的亮黄色阳桃。

阳桃树给寂寥的鄢家花厅增添了几分绚丽、

几分生气，并见证了鄢家在变幻莫测的近代风云里发生的诸多故事。

明洪武年间，鄢氏始祖鄢识敕封奉议大夫，洪武皇帝朱元璋赐“五马开基”（即外出可乘五匹骏马拉的车之意）。时因倭寇骚扰浙江金华邻地，朱元璋以为鄢识履职不力，究其责任，谪戍抵闽延津（今福建南平）。后经查实，方知那是个天大的冤案，朱元璋请鄢识再次出山，官复原职。但此时鄢识早就对腐败的官场心灰意冷，他以生病请辞，得到朱元璋恩准之后，于永乐年间迁居永泰县大洋镇麟阳村。

鄢家杰出代表有三位：一位是抗倭英雄鄢俊，他为人耿直，办事果断。1561年倭寇入侵永泰，官兵组织围剿，粮食供应不上，鄢俊独自捐送粮饷支援。第二年倭寇又集结二十八都，鄢俊当即决定散发家财，招募勇士600多人，自请击贼，杀死倭寇几十人，不幸被残寇偷刺，遇害牺牲。一位是明崇祯年间御试进士鄢廷海。其任河南登封知县期间遇李自成兵临登封县境，他疏散百姓，独自在公堂见李自成。李自成给予十万两银子，拜托廷海公代修东岳庙，廷海公将钱用于救济百姓买粮度荒，李自成闻之大怒。为免波及百姓，鄢廷海只身闯帐，尽揽罪责，拔剑自刎，忠义保民。一位是明末英雄兵科给事中鄢正畿。明朝灭亡后，他誓死抗清复明，清兵迫其投降受职，正畿哭拜前皇及祖祠，赋诗明志，从容自刎于家祠。

因为鄢氏家族人才辈出，清道光年间，曾任

湖广总督、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的陈若霖为鄢氏太澄公宗祠题联“三山毓秀绵旧德，闽水储英继流光”。历任大清海军统制（总司令）、民国海军上将总长、民国代理国务总理、民国福建省省长的萨镇冰先生题联“事来无求品自高，人能知足心常乐”。

在鄢家花厅里行走，我似乎能够感受到鄢家花厅昔日的繁华，那里的每一个宅院、每一条小径、每一个屋子、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深藏着悠远跌宕的历史；每一级台阶、每一堵石墙、每一扇门都仿佛在倾诉着那段如烟如雾的往事。

## 二

我第一次见到这棵阳桃树是在2017年初春。我走进西花厅，发现朝阳下的阳桃树枝叶婆娑，树上形如五角星的阳桃青中带黄，黄中泛青，它们在微风下轻轻地摆动，像一个个喜气的小灯笼。顺手摘下一个，轻咬一口，酸中带甜，甜里带酸。

在鄢家花厅工作之后，我开始了与这棵阳桃树的亲密接触。

清晨的阳桃树，温柔且多情。我走进西花厅，享受着阳桃树枝间漏下的温软如玉的阳光，看绿叶在微凉的风中摇晃，心里涌满了柔情。

午后的阳桃树，宁静安逸。我在西花厅里闲逛，阳桃树散发出的香味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的头顶、衣袖、衣襟到处都是淡淡的清香。



黄昏的阳桃树，稳重并干练。夕阳落在阳桃树上时，手拿一本古书，斜倚阳桃树，高声朗读几句古诗，心胸便溢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忘我境界。

夜晚的阳桃树，诗意又浪漫。漫步在西花厅，树影、人影、屋影，恍惚在白色的月光下，耳边响起鸟儿和虫子的吟唱，这种月光流水的意境让我浮想联翩。

树犹人。世间万物皆有性情。我在鄢家花厅工作久了，终于悟出了当年庄子愿做深山一棵树的缘由，那棵阳桃树成了我亲密的朋友，它是鄢家花厅的灵魂。平日，深情遥望的半边亭，给了阳桃树海立云垂般的奔放；凝固在轩廊建筑上的艺术品，给了阳桃树玉树临风的典雅；天井的飞霞流云，给了阳桃树出水芙蓉般的洁美；巷坊间那戛金敲玉的鸟鸣，给了阳桃树如梦如幻的空灵……我甚至觉得，阳桃树就是精灵的化身。

阳桃树在花开花落中成长，它所处的三坊七巷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人才辈出，林则徐、沈

葆楨、严复、林旭、林觉民等一大批中国近现代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从这里涌现，他们的故事流传至今，就像这棵阳桃树茂盛的枝叶，庇荫后世，绵延不绝。

在那个星星之火燎原大地的岁月，阳桃树所处的安民巷，革命的种子已经悄然播下。1926年，中共福州地委联络处设在安民巷立本弄，地委书记徐琛及其妻余哲贞住在那里的一间老屋。1927年4月，他俩在开展革命活动时被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徐琛和余哲贞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便于6月2日将徐琛和余哲贞等共产党人押赴福州西洪路鸡脚弄刑场。到了刑场，余哲贞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红围巾围在自己的颈脖上，然后也为徐琛围上一条湛蓝色围巾，从容地说：“我和徐琛同志虽然结婚了，却从未举行过婚礼。今天，我们庄重地宣布，让敌人的隆隆枪声成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声吧……”

那年，徐琛23岁，余哲贞20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了便于福建的统战工作，中共东南分局委派新四军副军长、参谋长张云逸和党代表叶飞，率徐平羽、马骏等人从南昌来到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进行谈判，提出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翌年2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设在安民巷53号。这里成为发动群众，联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据点。1938年5月，日军侵占闽江口，新四军办事处迁往南平。

风云激荡的岁月，安民巷留下了共产党员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这声音透过厚厚的石板，撞击着阳桃树的心扉，阳桃树用抖动的树枝欢迎这些走进鄢家花厅的英雄们。

阳桃树一年又一年地成长，一年又一年地老去，它虽不能言语，却用充满睿智的目光注视着那个时代，并与鄢家花厅里走出的英雄人物进行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对话。

历史长河缓缓向前，阳桃树在等待。

这种等待终于变成了现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历经清王朝、民国的阳桃树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它那出墙的枝头就像小孩子好奇的目光，打探着这个新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福州天翻地覆、龙腾虎跃。普通市民衣食住行的“进化”是这部鸿篇巨制中最亲切感人的一章。从黑灰“的确良”到时尚个性的服饰，从果腹到舌尖上的享受，从蜗居到广厦千万，从难得出远门到说走就走的旅行，穿过物质文明的历史长廊，响起的每个足音，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生巨变的回应。

在西花厅的天井上空，阳桃树开始极目远眺。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看祖国的崇高与巍峨；看祖国的繁荣与巨变。它把这些场景尽收眼底，用伸出天井

的枝头颂扬祖国，用沉甸甸的阳桃祝福祖国，用青翠的绿叶歌唱祖国。

时光如水，奔流不息。

当改革开放春风拂来之时，阳桃树时刻陪伴的三坊七巷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人口增加，三坊七巷原来的古建筑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口，生活方式的转变也让这片文化街区不堪重负，而后的旧城改造则使三坊七巷再次面临可能被破坏的命运。

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片记载着城市传承的历史街区三坊七巷开始日渐衰败，历史建筑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三坊七巷面临着衰败、特色消亡的严峻问题。

2005年，福州市与开发商经过艰苦的谈判，讨回了三坊七巷的开发权，已有千年历史的三坊七巷迎来了春天。处在死亡边缘的阳桃树，经过人们实施除草增土施肥等抢救措施，以及环境的综合整治，重新恢复往日的生机。到了2006年，福建省、福州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三坊七巷进行改造，并在经济、政策上给予支持。三坊七巷的古建筑终于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了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全国少有的古建筑遗存。同年，鄢家花厅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获得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荣誉称号。

好事接踵而来，2010年，经专家认定，鄢家花厅这棵阳桃树被认定为福州市城市古树名木。

2015年，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批准三坊七巷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福州市首个5A级景区。2013年，鄢家花厅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涅槃重生后的阳桃树开始年年开花结果。鄢家花厅阳光明媚，水分充足，土地肥沃，阳桃树长得自由舒展，鸟雀翔集，从它的心灵深处长出的一颗颗金黄色果实正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 三

2017年，鄢家花厅在福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正式调拨给市文联，命名为福州文艺家之家。鄢家花厅作为福州市文艺家创作、交流和作品展示的场所，文艺家之间联系的桥梁，传承、弘扬闽都文化的重要窗口，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2017年6月15日，福州文艺家之家在三坊七巷鄢家花厅揭牌，福州文学院也同时入驻鄢家花厅。

文艺凝聚民心，是城市气质的表达，是提振精神的动力。2021年，在福州市文物局牵头下，福州市文联遵照国家、省市古建筑保护修复工程相关管理规定，提升了文艺家之家整体灯光照明、空调制冷等功能，并将鄢家花厅的前世今生、鄢氏溯源、建筑介绍等内容制作上墙，增加花厅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底蕴，增加了游客游览的体验和对建筑的了解，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和



参观内容。

未来的日子，福州市文联将邀请更多的闽籍名家到福州文艺家之家开展“闽籍名家话闽都系列讲座”，深入挖掘闽都文化的底蕴和内涵，促进闽都文化学术研究交流，扩大闽都文化影响，助力打造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如今，鄢家花厅是三坊七巷的一个旅游观光景点，来往游客络绎不绝，而阳桃树就像一块缀在鄢家花厅衣襟上的翡翠，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 共同守护中华秋沙鸭

陈家恬

因工作需要，永泰全县 255 个村庄，我每个至少到过两遍，但像今天这样，仅仅为一群鸟、一座寨而专程探访的，尚属首次。

从嵩口镇区驱车，大约 15 分钟，进入梧埕村。同行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黎先生建议停车，先看看路下溪流的风光。但见丰满而清澈的溪水，爱心似的萦绕，还有画屏般的翠竹，棉花状的白鹭……

水泥路尽头，两位身着迷彩服的“外人”，站在越野车旁，令我感觉似乎到了某边防检查站。然而，他们却是迎候我们的“主人”。其中一位正是我无比敬佩却未曾谋面的“名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著名野生动物

摄影师（荣获 2021 年“中国十大生态摄影师”称号），绰号“军长”的陈林先生。雨还在淅淅沥沥，前方约 3 公里的道路小而陡，易打滑，不敢开车。我们接受陈林先生的建议，换上雨靴步行。

攀谈中得知，这里早已成了陈林先生的“另一个家”——甚至更上心，单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第一只中华秋沙鸭从长白山飞抵嵩口开始，几乎每天，他要么从福州启程，要么从本地驻点大喜村白鹇聚集地“鹇来谷”出发，前来守护“远方来客”，就有 110 次。即使偶尔分身乏术，他也要通过手机或电台过问“贵宾”的饮食起居或冷暖喜忧。“贵宾”早已钟情这里。这份情结，知情者有的说始于 2002 年，有的说始于 2009 年。“军



陈林摄影作品《中华秋沙鸭》

长”自从2010年底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他的痴情就像溪畔翠竹一样扎下根来，念兹在兹，满心满怀，须臾不离这些“飞来的大熊猫”。

我们来到位于长口坂的二号观鸟棚——“棚”字似乎是陈林先生假借的，毕竟，除了茂密的竹林，头上是黑色遮阳布，眼前也是——凭借遮阳布上那些如同电影放映室的窗口，鳞次栉比的斗笠大的圆孔，尽可临水观赏“国家级明星”的精彩表演。另加几张靠背椅或小方桌，便是天南地北观鸟者优哉游哉的天堂了。诚如陈林先生的自嘲——这可能是全国最简陋、最原始、最热闹的观鸟棚，好在客人非但不嫌弃，反而很迷恋，一而再，再而三，有的还呼朋引类，结伴而来，好比这群中华秋沙鸭，越来越多了。

中华秋沙鸭，珍稀野鸟，诞生于第三纪冰川期，距今约1000万年，堪称动物活化石。全球存活不到3000只，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胁羽黑色鱼鳞状斑纹成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火炬祥云设计的灵感来源。



它们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本省现有两个越冬栖息地，一个在建瓯市，一个在嵩口镇梧埕村。梧埕种群现有29只，来自长白山，可能是国内单群数量最多的，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说明生态持续向好。许多观鸟者远道而来，既缘于中华秋沙鸭，又缘于梧埕村独特的摄影背景，这里水清、岸绿、景美，两岸丘陵植被丰饶，能随季节变化而呈现多层次的迷人色彩，既可观花又能赏叶，能让每一位观鸟者获得堪比诗经里那位“静女”的青睐与偏爱，“自牧归荇，洵美且异”——只此青绿，独树一帜。走运的话，还可以邂逅诸如白腹隼雕、食蟹獾、白鹇等珍稀动物……真是“水作琵琶不用弹，山为屏风何须画”！

我听到了一个新颖的名词：百日护飞。“军长”是这样解读的：“候鸟护飞”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委员会倡导的。对这群中华秋沙鸭的关注已有数年，而实际行动始于2020年。前年10月26日，他和同人来到梧埕，发现了第一只，11月1日又发现3只。他既激动又担忧，



陈林摄影作品《中华秋沙鸭》

担忧它们在这里越冬是否安全。于是，他一面密切注视它们的行踪，一面向镇里县里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报告，寻求支持。首先为了它们的安全，请求杜绝栖息区域内任何方式的捕鱼，同时自掏腰包，在当地雇请3名看护员，每人月薪5000元；其次考虑它们的食物问题，也是自掏腰包，购买小鱼投喂，每天约需300元。现在，每天都有20多只中华秋沙鸭在视野内优游。许多人慕名而来。为此“军长”出资搭建观鸟棚，添置观鸟设备和区内通信工具。其中一位看护员原先以捕鱼为生，收入不稳定，安全也欠保障。转为看护员之后，没了后顾之忧，其妻跑来向他道谢。同时“军长”却招致不少“抱怨”，既有来自私营企业代理人的恳求——“老板，我们这边一大堆事情，你不能不管啊”，又有来自家人的热盼——“姥爷，我好想您呀，您什么时候回来呀”……然而，那一辆早已为当地人所熟悉的越野车，仍旧经常出现在永泰嵩口的山村——大喜（白鹇栖息地）、梧埕（中华秋沙鸭栖息地）这两个村，几乎每天都成一线，穿梭奔走，乐此不疲……

聆听了“军长”爱鸟护鸟的传奇故事，不禁被他的情怀、智慧、毅力与奉献深深地感动了。脱口而出：人与自然，与植物、动物的友好相处，是人类诗意栖居的最高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世界是同构的，万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与它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只是感应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当它们觉得我们



陈林摄影作品《中华秋沙鸭》

是善人的时候，它们就会格外亲近，不存戒心，以诚相待，慷慨施惠；水知道答案，清澈的水源无时无刻不在静静地指引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河（溪）流正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若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只要观察那里的水系就可以了，清澈意味着文明，反之即为蒙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其实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就是保护当代，就是保护未来。

中华秋沙鸭能够垂青这里，将此处作为它们在本国最南端的越冬栖息地，是这片大地与众生的幸运，也是对我们坚持不懈地保护生态的奖赏，继续改善它们的栖息条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我决心加持，呼吁各方共同努力，确保让这里成为它们最温馨的家园（越冬近半年），成为它们最流连的地方（亦如“王谢堂前燕，秋风又送归”），成为永泰生态文明最亮丽的名片的时候，“军长”表示赞赏。

生态有多好，且看中华秋沙鸭！但凡提及中华秋沙鸭，其他有关生态的任何表白，都是多余的，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 连江石马岩题刻之谜

苏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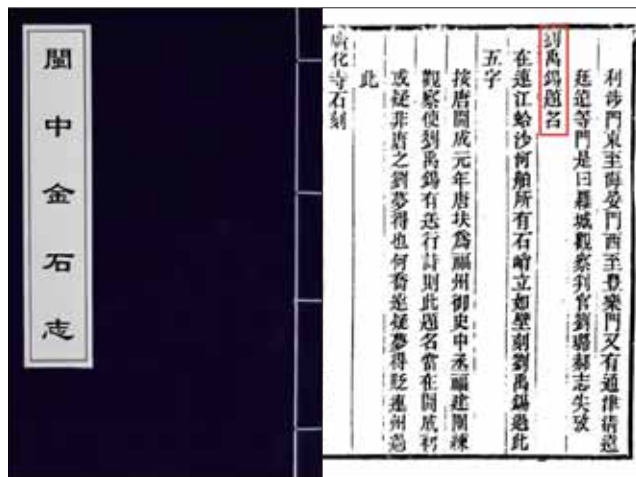
蛤沙，别称“金沙”，唐末时就已建村，负山拥海，位于敖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洪武十六年（1383），蛤沙始置河泊所，开征渔税。不久设镇，置巡检司，建城堡，一时舟楫穿梭，商贾云集，一片繁华。

蛤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石马岩上曾有“刘禹锡过此”五字石刻。《福州郡志》则云“疑后人姓名相同”。

宋梁克家所著的《淳熙三山志》记载：东汉时（约58—124），黄香七世孙黄助与弟泛舟自海南归，中途遇风，兄弟俱溺亡。尸首漂至亭角（今定海）后沙滩。乡人建大小亭庙祀之。同时，还记载有：崇德里桑屿、东路，上、下竿塘（在海中），关岭、蛤沙、北交（旧有镇，今废），大、小亭山……说明蛤沙当时已有人烟。这里的“上、下竿塘”即今日的南竿塘、北竿塘，为马祖列岛的组成部分，“关岭”即浦口镇官岭村，“北

交”即苔藓镇北茭村。

清代冯登府所作的《闽中金石志》收录了周、汉代以来闽中金石文献，70—80%属于福州，其中《闽中金石志》卷五对石马岩石刻也有记载，标题为《刘禹锡题名》，文曰：“在连江蛤沙，河舶所有石峭立如壁，刻‘刘禹锡过此’五字。”



《闽中金石志》及所载的“刘禹锡题名”

还有按语：“唐开成元年，唐扶为福州御史中丞，福建团练观察使刘禹锡有送行诗，则此题名当在开成初。或疑非唐之刘梦得也，何乔远疑梦得贬连州过此。”唐开成元年，即公元836年，迄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

清道光举人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六亦载，“连江县蛤沙河舶所石马岩，高数十丈。峭立如壁，镌‘刘禹锡过此’五字。开成元年唐扶为福州刺史，刘禹锡有送行诗，因疑题名当在开成初。或曰非唐之刘梦得。《闽书》疑梦得贬连州过此。”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号庐山人，洛阳人。因是汉代中山王刘胜后代，又称刘中山，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唐贞元九年（793），禹锡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

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后刘禹锡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卒于任上，享年70岁，赠户部尚书。刘禹锡诗文俱佳，有“诗豪”之称。其诗涉猎题材十分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著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及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还著有《刘梦得文集》，存世作品则有《刘宾客集》等。

蛤沙石马岩上的“刘禹锡过此”，是否就是唐代的刘禹锡呢？《竹间十日话》卷六中也有关于“蛤沙河舶所石马岩”题刻词条的描述，还有



郭柏苍的按语：“唐以前书史中不见有刘禹锡。唐以后不识刘梦得者，即与刘梦得同名姓，亦决其不题名谪宦。题名多不署年月名姓，以避缺望。明丰熙以谏大礼，廷杖谪戍福州，寓小西湖。其题墨池诗，不署年月名姓。才翁所赏树石，亦不署年月。梦得没于会昌间，开成以前，安知其不会入闽，称‘过此’二字，则非宦、非客，明矣！”可以看出，郭柏苍也是持怀疑态度。

不过，唐顺宗时，刘禹锡参加“二王刘柳”集团，与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失败后，他与柳宗元等八人多次被贬，颠沛流离。十年之后，他奉诏还京，作《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因“语涉讥刺”，被贬到更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任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唐代诗人殷尧藩有《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遐荒迢递五羊城，归兴浓消客里情。家近似忘山路险，土甘殊觉瘴烟轻。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此去定知偿隐趣，石田春雨读书耕。”殷尧藩（780—855），浙江嘉兴人。唐元和九年（814）进士，历任永乐县令、福州从事，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也有往来。殷尧藩担任

的福州从事，为古代官名，即从史史，亦称从事掾，系汉刺史的佐吏。

刘禹锡本人也有《夜燕福建卢侍郎宅因送之镇》一诗：“暂驻旌旗洛水堤，绮筵红烛醉兰闺。美人美酒长相逐，莫怕猿声发建溪。”还有《洛中酬福建陈判官见赠》：“潦倒声名拥肿材，一生多故苦遭回。南宫旧籍遥相管，东洛闲门昼未开。静对道流论药石，偶逢词客与琼瑰。怪君近日文锋利，新向延平看剑来。”而且，冯登府《闽中金石志》中“刘禹锡题名”按语写得非常明白：“唐开成元年，唐扶为福州御史中丞，福建团练观察使刘禹锡有送行诗。”

历史上，蛤沙虽僻居海滨一隅，但作为县内的古驿道，也是南来北往的主要通道之一。身为福建团练观察使的刘禹锡莅临蛤沙，或过道蛤沙前往福州，或从福州借道蛤沙北上，在此留下摩崖题刻也并非没有可能。同时，刘禹锡多次被贬，颠沛流离，曾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借道蛤沙前往福州，再赴广东连州任职，留下“刘禹锡过此”题刻也并非空穴来风。可惜的是，石马岩题刻毁于清代兵荒马乱时期，如今只留下这个没有答案的“千年之谜”……



## 晋安寻“福”

吴恒之

“福”代表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寄托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福”字命名的省会城市，“福”文化已经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成为福州最显著的文化标识。晋安区是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福”文化底蕴。

### 崇 福

象峰崇福寺，位于晋安区新店镇象峰南麓的状元岭古道旁，为福州五大禅林之一。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旧称崇福院，后废。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福州鼓山曹洞宗名僧永觉元贤弟子跬存禅师云游而至，与师弟谛详禅师筹建养母堂。清理地基时，得一刻有“崇福禅院”的石额，方知为古崇福院故址，遂誓愿重兴。1992年列为福州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开放寺院。



象峰崇福寺

明崇祯二年（1629），寺僧超然禅师东渡日本，于长崎圣寿山创建崇福寺，其后数代住持多为福建人。日本僧侣因此尊福州象峰崇福寺为祖庭。长崎崇福寺故又被称为“福州寺”。

所谓“崇福”，积善求福也。象峰崇福寺将中华“福”文化的理念精髓与内涵，带出国门，远渡重洋，并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是闽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 尚 福

赵轩波故居，位于晋安区新店镇战峰村下篁自然村，建于清代。古厝坐北朝南，四面风火墙，布局基本保留完整。厅堂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看架正中的卷书弯枋上镌刻一个楷书“福”字，字体工整端庄。

赵轩波，字永建，号颐山，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与林则徐、梁章钜等同窗，为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的得意门生。殿试当日，因染疾而被抑置三甲，以知县铨选，但未补缺，乃回乡。道光六年（1826），闽浙总督孙尔准建越山书院，赵轩波为首任山长。铨选期至，以父母年老为由，坚决辞绝。父母逝世后，哀恸万分，友人劝其赴选，赵轩波回应：“父母在，可求禄；今既无，何必求禄呢？”于是终生执教越山书院，



赵轩波故居厅堂看架“福”字

主讲15年，直至病逝。越山书院也培养出了浙江大学创始人林启、一代儒医黄光厚等福州近代名人。

赵轩波主动放弃个人仕途而献身教育事业，为更多人谋求福祉的高尚追求，与林觉民“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有着同样境界。而随后林启、黄光厚等人接过接力棒，又在各自领域继续传承实践。

## 祈 福

林纾墓，位于晋安区新店镇益凤村，始建于民国年间，1991年列为福建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呈如意形，三合土夯筑，转角石柱镌刻有隶书对联：“著述饶沾东越传，功名早淡北山文。”山墙正中书一大“福”字。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近代文学家、翻译



林纾墓山墙正中书一大“福”字



林纾像

家。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与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两年后在福州由畏庐刊行，之后，又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王寿昌、陈家麟等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对于翻译生涯中唯一一部柯南·道尔侦探小说《歇洛克奇案开场》，林纾沿用前人经验，将“Holmes”音译为“福尔摩斯”。他的那些带有“福州烙印”的成功译作，对当时的社会和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实现了自己所许“著述徬沾东越传”的福愿。

## 盼 福

上洋象洋境，位于晋安区鼓山镇上洋村，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清光绪六年



鼓山象洋境

（1880）重建。境南外墙处存有清代《上洋铺路碑》，北外墙处有清代《上洋重修路径碑》。象洋境主祀的琉球金将军，曾办过国民小学和上洋小学，是中琉友好往来和闽都文化国际化的见证。现与两方碑记为晋安区文物点。境的屏门正中，红底金字书有一大“福”字。

境者，福州城乡之社庙，类似现在的社区，但实际作用更为多样。除祭祀、游神、龙舟会等民俗活动外，还有启蒙教育、乡里议事、调解纠纷等功能，具有闽都文化“包容并举”鲜明特征，为传承优秀乡规民约和家风家训提供场所。

象洋境靠近鼓山，土地肥沃，面临闽江，水源充足，故福州有民谚：“买田要买远洋鼓山边。”屏门上的“福”字，道出了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淳朴愿望，那就是希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平安长寿，无灾无患。这些美好的期盼，最终都融于“福”文化之中。



鼓山·灵源洞“福寿”



灵源洞“福”字



鼓山·石门“福地重游”



鼓山·“福城东际”

## 晋安，福字摩崖石刻博物馆

晋安区名胜古迹众多，是闽都文化的一座“富矿”，其中尤以摩崖石刻为最，仅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就有鼓山摩崖石刻、鱗溪摩崖石刻、升山摩崖石刻、象山摩崖石刻、森林公园摩崖石刻、独屏盾山摩崖石刻、芙蓉山摩崖石刻等7处。这些摩崖石刻保有相当数量的“福”字印迹，被誉为“福字摩崖石刻博物馆”。又以下列五处，最具代表性。

鼓山灵源洞“福寿”（清代·林开斌书）位于灵源洞西壁，东向。摩崖高120厘米，宽75厘米。楷书，纵2行，字高55厘米，宽46厘米；旁款字径8厘米。周代《尚书》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第一福即是“寿”。

鼓山灵源洞“福”字（清代·章寿彝书）位于灵源洞内，东向。正文行书，字径64厘米；旁款楷书，字径8厘米。

清光绪七年（1881）十月，清代画家章寿彝与长乐人游学诗、林春培，湖南宜章人黄华文，同乡张效宽游鼓山，向涌泉寺僧明本索书“福”字。此字流畅率意，生动活泼，在省内有很高知名度。

鼓山石门“福地重游”（清代·俊生书）位于石门，西向。摩崖高248厘米，宽150厘米。篆书，横1行，纵14行，正文字高54厘米，宽



新店·象山“福”字

51 厘米；旁款字径 9 厘米。

清光绪八年（1882）五月十一，浙江宁波人陈川华（字恒山）、李涛（字芸馥）、黄家鼎（字俊生）与江西南丰人刘再兴（字幼樵），同游鼓山，将勒石纪游，匆促不果。次年，李涛和黄家鼎偕浙江嘉兴人曹晋墀（字长卿）、宁波人杨式棠（字憩南）重游鼓山，于是刻下“福地重游”四字。

鼓山“福城东际”（清代·住持光耀书）位于更衣亭东侧石壁，南向。摩崖高 60 厘米，宽 275 厘米。楷书，横 1 行，纵 2 行，正文字径 54 厘米；旁款“咸丰甲寅，住山光耀”，字径 8.5 厘米。

光耀，名天明，咸丰甲寅（1854）时为鼓山住持。榕郡有二绝，曰“左旗右鼓”，鼓山遂为东际。今鼓山脚下院有东际桥，始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1162），明崇祯十一年（1638）闽剧始

祖曹学佺重修，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店象山“福”字（北宋·槐京书），位于象山南麓的宝华山溪东侧，南向。有“福”“禄”“庆”三大字。其中“福”字径达 253 厘米，“禄”字径有 273 厘米，“庆”字径 270 厘米。旁款“槐京包帚书”。

槐京，安徽青阳人，北宋天圣五年（1027）与其兄槐奕一起高中进士，官至尚书郎，“有文名，善大书”。包帚，则非一般毛笔，或扎帚而书。用笔壮实饱满而避让有致，撇捺带弧形，勾转力重而不滞。槐京扎帚所书“福”字大榜书，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是为福州已发现最大的古代摩崖“福”字。

## 晋安是福

晋太康三年（282），晋武帝分建安郡地设晋安郡，郡治设今福州市，严高为首任太守。此为福州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央王朝管辖设立的州郡，时福州称为晋安。作为一个拥有 1700 多年历史的地名，“晋安”二字本身就含有深刻的“福”文化内涵。

《说文》有云：“晋，进也。日出万物进。”基本义是前进、向上，故有“晋级”“晋升”之说。越来越好，此为福也。《说文》又云：“安，静也。”由此引申出静止、舒适、稳妥、没有危险、乐意等含义。越来越稳，此亦为福也。故此，晋是福，安是福，晋安是福。